

重庆市人民政府 主管 重庆行政学院 主办

重庆行政

CHONGQING ADMINISTRATION

聚焦重庆发展 研究行政规律 服务政府决策

重庆行政

第六期 总第210期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2023
第24卷

6

重庆行政

CHONGQING ADMINISTRATION

主管 重庆市人民政府
主办 重庆行政学院
总编 宋英俊
副总编 张波
编辑出版 重庆行政杂志社
社址 重庆市渝州路160号
邮编 400041
电话传真 (023)68583005
电子邮箱 cqxz1999@163.com
网址 cqxz.cbpt.cnki.net
创刊日期 1999年2月
出版日期 双月18日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8-402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1207/D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011588
发行代号 78-126
国内发行 重庆市邮政管理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399号信箱)
印刷单位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行政》杂志编委会

顾问:胡衡华 主任:陈鸣波 副主任:罗清泉 谢金峰 黎勇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洪 丁中平 万容 万隆 王中 王雯 王茂春 邓莉 左军 冉华章 付嘉康
代小红 巩义胜 刘忠 刘贵忠 刘晏兵 江夏 江志斌 许仁安 阮路 李顺 李成群
李庆 李茂涛 李洪义 杨光 杨琳 杨通胜 肖庆华 余国东 宋平 张涛 张炳华
张维斌 陈地龙 陈孟文 陈清松 陈道彬 明炬 罗成 岳顺 周波 周文盛 周恩海
郑平 胡明朗 胡珍强 种及灵 施崇刚 姜国杰 姜雪松 聂红焰 贾晖 钱永培 徐晓勇
徐海波 高健 郭小萍 唐慎 唐大军 唐守渊 唐英瑜 陶世祥 黄红 黄祖英 曹春华
常晓勇 章勇武 扈万泰 彭志辉 董奕锋 曾菁华 谢东 谢礼国 蓝庆华 廖红军 谭雪峰
黎勇 戴希 戴明

行政资讯 ●●●

10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强调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

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11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温暖过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求真务实、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抓紧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应急管理体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0月18日至20日，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城口县、开州区、忠县和垫江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山区库区强县富民和现代化。

10月23日，重庆市委召开区县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例会，交流经验做法，查找短板不足，进一步激发全市上下干事创业动力，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目标、持续发力，以决战决胜姿态冲刺四季度、打好收官战，奋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确保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好局、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起好步。

10月25日，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紧扣数字重庆建设实践，加强顶层设计，激励基层创新，总结典型应用，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10月31日，重庆市委召开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数字重庆“1361”整体构架，紧盯“一年形成重点能力”目标，加快点上攻坚突破、面上整体推进，努力打造重点领域实用实战成果。

（张波）

目录

CONTENTS

执行编辑 胡越 美编 胡越

○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 04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气象新作为 / 李媛媛
- 0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努力开创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 宋英俊
- 08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传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路径创新 / 粟超

○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 10 高质量干好“一号工程”展现大区大担当新作为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 王志杰
- 13 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新忠县建设新局面 / 李电
- 16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加快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 / 张果
- 19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引领 加快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新巫山 / 曹邦兴
- 22 全域全领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奋力打造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巫溪范例 / 李卫东

○ 乡村振兴

- 25 迭代升级“五大”领域 都市农业“双高”发展 / 左川
- 27 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理路 / 宗成峰 李翌
- 32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数字乡村建设的案例研究 / 郝妙
江成程

○ 公共行政

- 36 以数字化变革引领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 黄朝永
- 41 数字重庆建设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分析及应对 / 肖军 陈林培
- 46 实现价值共创：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的新理念与新路径 / 张鸣

○ 治理现代化

- 53 以“数字救助”改革构建地方社会救助新格局 / 冯永生

- ★ AMI 综合评价 (A 刊) 扩展期刊
- ★ 中国党政系列专业期刊
- ★ 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 CNKI 系列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期刊
- ★ 龙源电子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 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声明

本刊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致电负责调换: (023) 66244056。

- 56 社会工作介入信访工作的路径探索 / 李云波 周 灵
- 58 促进重庆市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前沿展望 / 谭江蓉 向艳妮
- 62 养老风险精准识别的问题与化解 / 舒 梅 李 颖

○ 法治纵横

- 67 重庆市地方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以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为视角 / 王 焱
- 71 村规民约的研究综述及其治理重构 / 周铁涛
- 75 金融强国视阈下“代理退保”耦合协同金融诈骗犯罪及打击方法研究 / 李大鹏

○ 党的建设

- 79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养女性干部的历史经验探析 / 李金蓓 吴碧清 张志勇
- 84 军民融合提升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研究 / 贾 燕
- 88 “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经验 / 董小玲
梅 浩

○ 文旅视野

- 92 红岩精神耀新华——“纪念《新华日报》移渝发刊 85 周年暨第一届红岩精神与《新华日报》学术研讨会”
综述 / 蔡 斐 李鑫斓
- 97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研究 / 臧建业 周 师

○ 智库观察

- 102 “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的发展展望 / 郭 伟
- 105 关于推动重庆战略科技力量提质强能的建议 / 王宗德 郑 洁
- 107 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 陈学彬
- 110 从璧山区一典型农村看破解重庆乡村振兴难题的重要路径 / 谢 强 李 红 曾 永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气象新作为

李媛媛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正本清源,把准方向,厘清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在党的事业中居于关键性、战略性、全局性的位置,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文明体系构建。这一原则,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属性与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精准概括,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确立下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为新形势下守正创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装的党,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改造世界的历史。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重要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百年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垮台是从思想领域的混乱开始的。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引,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淖,甚至威胁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20世纪末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苏共在二十大之后,开始放任指导思想多元化,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西方在苏联社会内部培养意识形态专家,形成不同政见者体系,并在大众传媒领域发起进攻,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导致当时苏联社会的思想混乱,人心涣散,党组织无法发挥作用,军队也不在党的领导之下,最终苏共垮台、苏联彻底解体。苏联的教训说明,如果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发挥主心骨作用,将会导致不可挽回的政治后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出来的。近代以来,在中国遭遇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的艰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支持和行动力量,中国政治史和文明史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1]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品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在文化建设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不断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

律,洞察时代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在把握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大趋势中不断推进文明进步与文化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无可比拟的群众基础。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加速演进与深度互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外部条件、内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呈现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活跃,形成思想争锋,迫切需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统领,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全党全社会在思想上统一,行动上一致,能够最大程度地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攻坚克难、开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也能够引领社会思潮、稳定社会秩序、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共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开放性、发展性的理论,其最鲜明的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7版《序言》中都强调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和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而理论不断完善也在更深层次上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强大认识论基础。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拓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标志着党的理论创新的新境界,不仅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承续中华文明道统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需要以“两个结合”为立足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运用到研究中国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去,总结历史经验、契合时代要求、揭示发展规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思路 and 有效办法。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之间深度耦合与互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和战略机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需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不断丰富这一科学理论的内涵,不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EB/OL]. 新华网(2017-9-2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3.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粟 超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努力开创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宋英俊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时代新征程,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开创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一、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始终坚持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就要旗帜鲜明坚持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一是要始终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二是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要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把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三是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新闻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四是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五是要引领新闻宣传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切实维护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明确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为我们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制度。党的二十大又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新闻舆论是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内在的思想性、深刻的影响性。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文化生态更加复杂,先进的落后的相互交织,积极的消极的相互激荡,民族的外来的相互碰撞。新闻媒体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最前沿,做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是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将其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贯穿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层层把关、人人负责,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贯彻落实到

新闻舆论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三是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加强新闻舆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现出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让党的旗帜始终在新闻舆论工作战线高高飘扬,引领时代前进方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职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最鲜明的特色,是新闻舆论工作者最光荣的任务。一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新闻舆论可以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心态走向、精神面貌。新闻舆论工作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二是聚焦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全面准确生动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生动的事实引导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新闻舆论工作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讲明白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及其演进;讲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讲明白为什么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讲明白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深深植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党和人民关系相统一决定了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新闻舆论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渠道,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呼声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服务人民,贴近人民,团结人民,激励人民,满足人民群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同时,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把满足群众需求与提高群众素养相结合,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二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新闻舆论工作要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精神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事迹和人物,让人民群众唱主角、发强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三是坚持在新闻宣传报道中,将团结鼓劲稳定相结合。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光荣传统,是新闻舆论工作最神圣的职责使命,要多宣传报道经济社会发展亮点,多宣传报道时代发展的主流面貌,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重庆行政杂志社主编
责任编辑:粟超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传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路径创新

粟 超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鲜明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宣传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既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平台,要把宣传好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当下一项重要任务,要科学有效地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入脑入心。

一、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特征,是全面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的有机统一。

(一) 讲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

要讲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人民、凝心聚魂的人民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二) 讲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

要讲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实践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具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实践观点内在有机地融合了起来,具有强大思想伟力。

(三) 讲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性

要讲好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发展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继承发展党成立以来领导文化建设探索成果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从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九个坚持”概括了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到党的二十大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设工作;从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明确强调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到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

二、着力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融合转化

做好话语表达的融合创新是宣传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前提。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转化,要做到以政治话语引领生活话语,以生活话语活化政治话语,以多元叙事主体构建共同话语空间,不断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一) 坚守话语的政治属性:以政治话语引领生活话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两个结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标识性概念构建了一幅内涵深刻的语言画卷,高度凝练、适用范围广、稳定性强、指向明确。在涉及意识形态安全、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地采取政治话语的表达,切实发挥政治话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二)推动话语融通形式创新:以生活话语活化政治话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入“寻常百姓家”,需要用生活话语对政治话语进行转换和阐释,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表达方式,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如讲故事、评书、小短剧等形式,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话语生活化并非毫无底线的生活化,推动话语融通和形式创新,既要抵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又要避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三)注重群众接受反馈:以多元叙事主体拓宽话语空间

要树立大宣传理念,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从全局视野和百姓视角寻找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民生民利的契合点,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人民群众的互动,深入理解目标受众的不同观念、不同看法、不同感受,通过情感共鸣、思想交流构建“复调共识”的共同话语空间,以受众的多样性经验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发挥其传播效能的助推动力。

三、持续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宣传理念

有效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效能,需要以系统性、全局化观念推动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主体等协同发力,以百姓视角、百姓话语、百姓情怀使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百姓需求“零距离”“面对面”。

(一)根本立场: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讲好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需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深刻内涵,还需要在宣传理念上践行“以人为本”。习近平文化思想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要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价值认同,使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大众认同”和“大众话语”,更根本的在于利益认同,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目标,通过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创建、提供优质文化产品、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等,使人民切身感受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带来的重大实践价值和具体实惠,从思想上和行为上自觉主动接受习近平文化思想。

(二)重要原则:坚持协同创新理念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信息确定、传送、调控、预测、反馈等复杂环节,且这些环节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必须整体把握才能适应有效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要协调好三级实践平台、横向各部门、志愿者队伍等关系,统筹好共同发展目标,始终坚持“入人心”的传播效能导向,结合群众所思所盼所忧进行议程设置,以群众话语拉近距离,并且重视群众的接受反馈,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的宣讲经验,打造宣讲品牌。整合党政机关、高校、科研院所、宣传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多方力量,联动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军营等多种空间,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三)有力保障:坚持开放包容理念

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效传播,需要着力推动技术运用和手段创新,如综合利用新媒体、大数据、5G技术等各种新型平台,从技术上保障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融互通,将各种媒体形态通过不同手段、不同方式的组合创新,形成全新的传播空间和传播载体,通过构建新的宣传体系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宣传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和外在助力。

基金项目:202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研究”(项目批号:2023TBWT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重庆行政杂志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胡越

高质量干好“一号工程”展现大区大担当新作为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王志杰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要坚持‘川渝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等重要指示批示,为高水平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重庆市涪陵区认真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调研指示精神,围绕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立足经济大区、水运大区、产业承接转移大区、制造业大区、页岩气大区、文化大区“六个大区”优势,充分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市域辅枢纽、长江经济带沿江绿色发展轴重要节点、重庆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主力军“四大作用”,紧扣“六个大幅跃升”目标,深化落实全市“十项行动”,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科创、改革开放”三个高地和“城乡融合、绿色转型、高品质生活”三个示范区建设,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奋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力争 2027 年形成百亿企业 10 户以上、上市企业 10 户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 亿元以上,GDP2100 亿元以上,工业增加值 1000 亿元以上、工业产值 4000 亿元以上的“十百千”产业和经济量级,努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一、紧扣“城市能级大幅跃升”,加快推进战略支点城市建设

涪陵区深化落实全市“提升主城都市区极核引领行动”“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行动”,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发挥新型城镇化主战场作用,不断提升涪陵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坚决稳住经济大盘彰显大区大担当。持续抓项目、抓招商、抓服务、强主体、兴实业,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2 年,涪陵区以全市 3.6%的面积、3.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市 5.2%的 GDP、6.3%的辖区税收、7.4%的二产增加值、8.4%的工业增加值。2023 年前三季度实现 GDP1159.8 亿元、同比增长 7.6%,分别居全市区县第五和第四;二产增加值 668.5 亿元,居全市区县第一;规上工业总产值 1818.1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2 亿元、税收 39.3 亿元,均居全市区县第二,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 72.5%。推动产城融合增强人口和城市承载力。全面融入重庆都市圈,强化产业集聚、人口吸纳、职住平衡和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六人普”至“七人普”10 年间,涪陵区常住人口在重庆东部区县(含“两群”)增加最多。2022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111.5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81.8 万人,城镇化率 73.4%、中心城区外第一,城市建成区面积达 78.9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达 71.4 万人,区域中心城市承载力持续增强。构建区域公共服务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加快建设全市教育强区、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涪陵中心医院转隶为重庆大学附属涪陵医院、排名跃居全市三甲医院第六位,三级医院增至 3 家,浙涪友谊学校等 46 所学校与知名学校合作,在校学生区外生源占比 27.4%,就医人群区外占比 16%;江南城区、高新区两大百亿级商圈提档升级,前三季度全区实现社零总额 441.8 亿元、中心城区外第一。

二、紧扣“产业能级大幅跃升”，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高地和产业科创高地建设

涪陵区深化落实全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行动”“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行动”，突出抓好工业经济，加强链长、链主企业招商引资，大力推动协同创新，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更好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发挥工业对提升经济质效的主支撑作用。助力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发展，打造“2349”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积极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着力建设先进材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轻量化部件2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3个五百亿级、4个百亿级、9个“新星”产业集群。材料产业2022年在区县率先迈上千亿台阶，成功创建国家级高性能塑料及树脂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健全规上企业、亿元级专精特新企业、十亿级“小巨人”和链主企业、百亿级领军和龙头企业、千亿级旗舰型企业矩阵培育机制，培育年产值百亿级企业6户、全市工业“双百企业”34户、市级领军和链主企业10户，数量均居全市区县第一。2023年前三季度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2.2%、拉动GDP增长4.7个百分点。发挥产业科创对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主动力作用。紧扣全市“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以产业科创为主攻方向，迭代构建“1238”产业科创体系，推动涪陵高新区升级建设国家高新区，加快建设白涛新材料科技城、慧谷湖科创小镇，紧扣新材料及绿色低碳、生命健康、数智科技3个方向，围绕8个重点领域，建设一批以科创成果产业化为导向的企业研发中心。新引进理工清科、国仪量子等研发中心16个，相继攻克从页岩气中提取氦气、尼龙66用己二腈、碳减排催化剂等“卡脖子”技术及产品，全区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主城新区第二，获评重庆市企业创新奖15户、全市区县第一。美心翼申在北交所敲钟上市，打破2010年以来无新增A股上市企业的僵局，另有新铝时代在深交所成功过会。发挥数字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引擎作用。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建成智能工厂18个、数字化车间62个，总量居全市区县前列；入选全市智能建造示范区，入选全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6户、占全市的15%，3户企业入选全国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优秀场景）。2023年前三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17.4%，居全市区县第四。

三、紧扣“改革开放能级大幅跃升”，加快推进改革开放高地建设

涪陵区深化落实全市“勇当内陆省份改革探路先锋行动”“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行动”，深入推进以数字化变革为引领的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进数字重庆建设，争当数字化改革先行军。积极承接部署“1361”整体构架，加快推动三级中心贯通运行，深化运用六大应用系统，抓实核心业务梳理、数据归集和“一件事”谋划等，危化品运输车辆应急处置、榨菜“产业大脑”、服务企业、危岩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生产“两单两卡”智能监管、护学和“莎姐守未”等具有涪陵辨识度的“一件事”应用上线运行。持续深化央地合作、央地混改，扎实推动国资国企、开发区（园区）、“亩均论英雄”等重点改革，太极集团与国药集团“央地国企混改”和人行涪陵分行“重点农业产业链金融链长制试点”入选全市十大经济改革创新案例，全区制造业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估算达17.7万元、182.2万元。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市域辅枢纽。着力构建“八铁九高四港一空”综合交通格局，入选全市唯一的国家粮食物流核心枢纽承载城市（港口型），韵达物流全国最大智能分拣中心建成投产、日进出量超百万件，常态化开行铁海联运班列。2023年前三季度公路水路货运周转量430.8亿吨公里、占全市的16.4%，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发送集装箱4148标箱、增长20%。努力在区域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建好用好涪陵综保区、重庆自贸区涪陵联动创新区、全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持续叫响做亮“服（涪）到位、零（陵）距离”营商环境品牌，2021年以来全区累计签约项目220个，未来5年将新增工业产值2000亿元；承接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等地转移产业项目136个，其中攀华重庆基地年产值近500亿元、华峰重庆基地突破300亿元、重庆万凯超过100亿元。前三季度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31.1亿元、全市区县第六。

四、紧扣“基础设施能级大幅跃升”，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涪陵区深化落实全市“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行动”“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行动”，科学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大功能设施，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和乡村振兴。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主动承接

中心城区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长涪汇”城市会客厅、五桂堂历史文化商业街区等城市更新提升项目建成开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三年相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区、国家森林城市,是全市唯一同时拥有以上三个城市品牌的区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大乡村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获评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等称号;扎实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榨菜、中药材两大百亿级强村富民产业,种植面积分别超过73万亩、10万亩,综合产值分别达130亿元、115亿元。推动城市乡村美美与共。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燃气、垃圾收运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步伐,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居民安装天然气超过6万户,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8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100%,获评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等称号,正在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

五、紧扣“生态环境保护能级大幅跃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示范区建设

涪陵区深化落实全市“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加快建设美丽涪陵,努力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标杆,为重庆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发挥示范作用贡献涪陵力量。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长江、乌江两岸第一道山脊线内实现应绿尽绿,森林覆盖率达52%,持续开展“三排”“三乱”等专项整治,认真落实长江“十年禁渔”,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入选长江安澜见证之旅线路景点。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五年稳定在320天以上,长江、乌江涪陵段水质稳定为优,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达标率98.4%、全市第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模式入选全国案例,镇域土地综合整治入选全市首届生态保护修复十大案例。持续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新路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发挥“头部”企业作用,开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以“亩均论英雄”改革倒逼绿色转型,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6个、市级绿色工厂23个、市级绿色园区1个、国家级绿色产品2个,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成果居全市第三,涪陵区入选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名单。

六、紧扣“生活品质能级大幅跃升”,加快推进高品质生活示范区建设

涪陵区深化落实全市“高品质生活惠民富民行动”,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扎实推进重点民生实事。持续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实体经济,着力稳就业促增收,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超过2.5万人,2023年前三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453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4212元。有序实施市级、区级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实施2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面积408万平方米,惠及3.5万户居民,照亮城乡道路“安全夜光灯”、温暖环卫工人“豆花饭”、全国首个老年痴呆症智能守护平台“遗忘者”等成为涪陵民生暖心品牌。坚决防范化解安全稳定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综合债务率由“红”转“橙”并持续下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保交楼项目交付率100%。首创安全生产一线岗位“两单两卡”制度并在全市推广,连续49个月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持续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在主题教育中深入践行“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深入践行“枫桥经验”,强化党建统领,全面整合基层治理力量,推动“一中心四板块一网络”基层智治体系建设,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分散治理,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成功创建首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

作者: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书记

责任编辑:钟学丽

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新忠县建设新局面

李 电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重庆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是加快建设新时代新征程新忠县的重要战略机遇。重庆市忠县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城市,具有“联动大三峡、协同渝东南、服务大都市、承接川东北”的重要区位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全面融入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落实“1116”总体工作思路,制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项行动方案,细化十大领域重大项目包、十大重点改革任务清单,聚力做强一批重大平台、推进一批重大改革、抓实一批重大项目、实施一批重大政策,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忠县见效果”。

一、坚持生态优先,加快推进美丽忠县建设

努力把“绿水青山”的生态本底做大做优,把“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做通做实,巩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成果,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一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积极参与全市幸福河湖建设“百千行动”,提质建设“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接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让忠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理、科学治理、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一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乡,多层次立体化推进全域环境大整治。三是稳妥推进“双碳”工作。倡导绿色低碳循环生产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产业。巩固市级绿色园区成效,积极建设一批国家级、市级绿色工厂。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推动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深入开展绿色生活创建,引导和鼓励绿色低碳产品消费。

二、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紧紧围绕“七链协同”机制抓产业发展,加快打造三峡库区特色产业基地。一是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主动衔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循环利用、海南海药西部(忠县)医药产业基地、西部(重庆忠县)制冷空调设备产业园、年产1000万吨无机非金属环保功能材料项目建设。推动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做强做大新能源材料、化学医药2个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智能制造装备,装配式建筑部件、粮油加工、果蔬加工4个特色产业,打造国家级锂电新材料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化学药集中生产基地、国内先进的高端机床制造基地、市级绿色建材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加速形成具有全市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二是推动高效生态现代农业提速发展。积极参与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突出发展柑橘、笋竹、生猪“一主两辅”产业,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宜机化改造,打造竹纤维环保产业园,推动中国(重庆)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市级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努力在全市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行动中贡献忠县力量。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深入实施消费提振行动,推进万达广场如期开业,加快五洲国际商贸城、农批智慧城

等项目建设,做靓“爱尚忠州”消费品牌,打造渝东北高品质消费目的地。全面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忠县段)建设,唱响“三峡生态岛·千年忠义城”“三峡留城·忠州巷子”“三峡江村·首‘曲’一指”等“忠州八景”新景品牌。充分发挥沿江通道作用,提速建设新生港物流园区,加快农批智慧城市建设,推动现代物流业与制造业、商贸业融合发展,全力打造三峡库区现代商贸物流高地和市级物流网络节点。四是推动数字经济提能扩面。省部共建国家级(忠县)柑橘交易市场获批,三峡柑橘交易中心加快筹建。加快融入全市“一链一网一平台”,开展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引导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培育数字园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全面提升忠县制造业整体智治水平。

三、坚持改革求变,争当渝东北改革探路先锋

不断发挥改革的先导和突破作用,深入落实“三个一批”抓改革机制,推动关键领域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全面提升市场活力,激发发展潜力。一是推进以数字化变革为引领的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忠县推进数字重庆建设“1261”总体框架,以数字化推动各领域工作流程再造、系统重塑、整体跃升,围绕“牵一发动全身”改革、“小切口、大场景”改革、“协同性和标志性”改革,加快推进制造业亩均论英雄等十大重点改革,推动形成更多全局性、引领性、标志性改革成果。二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三会三员、两评两督”工作机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广应用“渝快办”“渝快政”,真正实现政务服务“一站一窗一次办、网上掌上马上办、两个团队帮代办、办不成事兜底办”。三是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落细落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二十五条措施,制定实施“走宣解”服务民营经济工作机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确保“真金白银”以最快速度直达企业。

四、坚持科技创新,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全面融入全市“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积极争取市级“一区(县)一平台”政策支持,加快创建国家创新型县、市级高新区。一是做大创新平台。加快引育锂电新能源产业研究院、国家(西部)空调设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计划,建好用好柑橘技术创新中心、中小企业集聚区等创新平台。二是推动科创转型。鼓励特瑞新能源、天地药业等企业建立法人化运行的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派森百橙汁、瑞竹纤维等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围绕上下游产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带动产品向中高端领域进军。三是转化科创成果。鼓励支持企业与重庆易智网成果转化平台合作,设立重庆易智网技术交易分中心。充分利用忠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忠州创业谷等孵化或服务平台,扎实开展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五、坚持扩大开放,着力打造三峡库区开放高地

实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五年行动方案,扩大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全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向开放节点。一是打造内畅外联开放通道。加快建设铁路大通道,开工建设渝万高铁及忠县站综合客运枢纽,推进黔忠万高铁等前期工作。积极融入全市高速公路网,推动建设梁忠石高速、沿江高速北线,推进长忠万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加大通用机场招商力度,建设地面集疏运体系。推动水运枢纽建设,打造新生港铁公水多式联运中心,建成西北、川东北、渝东北重要通江达海节点。二是建好全域多元开放平台。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新生港物流园区、数字产业小镇、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等开放平台建设,积极开拓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市场,探索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助力柑橘、笋竹、花椒等农特产品“走出去”。落实“三长一专员”招商工作机制,对接实施好国家和市级产业链关键环节产能储备和备份部署,大力承接重大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转移,成功引进空调装备产业园等重大项目,不断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三是构建便捷智慧开放体系。强化纵向合作共建和横向联动协同,主动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协商合作联席会议,争取在中新项目合作、口岸开放、通道建设等方面寻求市级部门支持。加快打造“一站式”通关中心,培育发展研发设计、物流

分拨、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保税+”新模式新业态。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六、坚持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乡融合示范建设

积极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加快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建设,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绘就城乡共美新画卷。一是实施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围绕“一江两岸四片区”城市格局,加快建设忠州老城历史文化核心区、水坪新城产教融合实践创新区、乌杨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临港新城临港产业集聚区和高端宜居住宅区,不断提升城市核心区承载能力,加快建设35平方公里、35万人“诗意山水·忠义之城”特色中等城市。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体系,构建以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长江沿线为轴带的小城镇群,完善小城镇联结城市和乡村的功能,提高小城镇服务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完善防止返贫精准监测帮扶机制,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长效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基本农田“非粮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底线。落实“四千行动”,加快实施“十百工程”、开展“示范社区”创建,推进以磨子土家族乡、独珠江村为重点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三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畅通城市人才、资本、技术入乡的制度性通道,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七、坚持人民至上,大力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量力而为、尽力而行,落实网上民生实事“七办”机制,滚动办好年度15件民生实事,健全常态化“三服务”工作机制。一是促进高质量就业增收。坚持把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健全覆盖城乡、服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开展高校毕业生服务、青年就业促进、就业创业扶持行动,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发展,统筹抓好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二是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县人民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创建。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支持重庆一中忠县分校持续深化办学合作,推动重庆数字产业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秋季正式招生开学。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民生保障、养老育幼等社会事业。三是扎实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施“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改革,加快推进“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建设,提升党建统领、经济生态、平安法治、公共服务工作体系运行质效,打造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升级版”。四是推动平安忠县建设。严格落实“五查四改月述考”工作机制,全力做好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治、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打、防、管、控、治”综合施策,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推进“黄赌毒”“食药环”专项整治,加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严防发生恶性事件和个人暴力犯罪案件。着力抓好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生态环境等安全工作,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

作者:中共重庆市忠县县委书记

责任编辑:钟学丽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加快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

张 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一以贯之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谋篇布局。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重庆市奉节县作为成渝地区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必经之地和重要节点,加快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既是重大政治责任,又是重要历史使命。奉节县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紧扣市委、市政府赋予的“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区和目的地、渝鄂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中心、全市现代山地特色产业示范区、‘中华诗城’和山水文化名城”定位,突出稳进增效、除险清患、改革求变、惠民有感工作导向,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聚焦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构建山地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城镇化、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四项重点任务”,保持奋进者姿态、激发创造性张力,真抓实干、唯实争先,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中展现奉节新作为。

一、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坚决站好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奉节岗哨

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奉节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力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一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落实河长制、林长制,抓好长江“十年禁渔”,保护好长江岸线,加快实施长江大保护PPP等项目,打造“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绿满夔州·花漾奉节”。二是推进污染防治。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无废城市”建设,突出抓好长江排污口整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打造静脉产业园,深化大气、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确保“一江五河”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年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50天以上。三是促进生态价值转换。聚焦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依托“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县”的自然禀赋,抢抓“双碳”机遇,培育气候、山上、水中、林下经济,打造医养结合、康养旅居产业链,打造渝东北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创建兴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绿水青山”变成更多“金山银山”。四是抓实危岩地灾防治。着力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强化监测预警预报、实施分类施策综合治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深化千名地灾员“驻镇进村”行动,充分利用“五色图”监测、“春耕码”查询等科技手段,实施“除险安居”三年行动,压实“县乡村企”四重责任,推动全县1547处地质灾害点、93处危岩实现“一处一策”,不断夯实山区库区发展的安全基础。

二、坚持“一县一策、一县一品”,加快构建山地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把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奉节县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立足山区库区实际,扬优势、补短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发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领作用,对标落实全市“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行动”,按照“种植成片、大户带动、加工增值、品牌促销、电商卖好、节会赋能”思路,大力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促进脐橙提质增效,推进中药材精深加工,打造肉兔全产业链,助推“种养加”“产供销”全面升级,实现标准化生产、组织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智慧化发展,全力构建以低山带脐橙、中山带经果

林、高山带中药材生态畜牧为主的“三带六特”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二是推动生态工业提速发展。实施生态工业倍增计划、企业“1020”三年成长计划,全力抓招商、抓项目、抓要素、抓服务,加快推进10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全力打造500亿级生态工业,围绕眼镜制造、清洁能源、农产品加工等主导产业,打造200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和眼镜、食品加工两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培育西部最大眼镜产业基地。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突出高科技性、高附加值性、集群性、新兴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推进商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富有山区库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高地。着力激活力、挖潜力,以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为目标,推进传统商圈数字化改造,加快万达广场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奉节味、三峡情的区域性消费中心;以培育渝陕鄂交界地区物流集散中心为抓手,打造物流区域节点、百度渝东北物联云仓,完善夔门港、白马物流园等基础设施配套,促进现代物流业扩容提质;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品质、引人流、促消费、延链条、增热度,深入实施“文化+”“旅游+”“康养+”战略,推出生态康养、民俗美食、自驾行摄、寻迹诗城、科考研学、竞技体育“六张名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打造长江三峡第一旅游目的地。四是推动数字经济集聚成势。抢抓数字重庆建设机遇,围绕“1361”系统构架,拓展国家首批创新型县创建成果,加快布局智慧农业、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等应用场景,围绕数据采集、数据标注、电子商务、短视频制作等领域,发挥百度、网易等头部企业带动效应,加快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奉节辨识度和全市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三、聚焦“小县大城、城乡互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关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奉节县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全力绘就城乡建设新画卷。一是扩大对外开放。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强化规划、政策、项目、平台协同,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建设菜籽坝抽水蓄能电站、陕煤入渝储煤基地等重大项目,放大通道、经贸、产业联动效应,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扩大奉节脐橙、奉节眼镜等产品出口规模,加快形成辨识度高、带动力强的标志性成果,打造成渝地区向东开放门户枢纽。二是提升城市品质。坚持产城景融合理念,聚焦生态、经济、服务、创新等四大功能,在优空间、补短板、拓功能、提品质上下功夫,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提升三年行动,推动高铁生态城、西部新城等五大片区串珠成链,加快推进体育场、诗歌剧院等民生项目,实施职住平衡三年行动,打造居者自豪、来者依恋、闻者向往的美丽奉节。三是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守住粮食安全、耕地用途管制、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三条底线”,实施“千万工程”,落实落细“四千行动”,大力推进产业提升、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深化“三变”改革、“三社”融合,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导科技、资金、人才进农村,推进数智赋能,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四是促进城乡融合。坚持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功能互补,统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布局,推进夔州长江大桥、公黄隧道等项目,实施“强镇带村”工程,建设5个中心集镇,助推南北两岸互动、城市乡村互促。

四、围绕“整体智治、高效协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奉节县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除险清患工作,着力提高基层治理精细化法治化智慧化水平。一是抓牢安全稳定。紧盯交通、建筑施工、食品药品、消防、危化品运输、公共卫生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走访大整治行动,堵住漏洞、补齐短板,建设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和南北两岸应急救援中心,推动实现本质安全、基础平安;及时有效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专班化解处置历史遗留问题,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二是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完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

源头治理、专项治理风险闭环管控机制,坚持条抓块统,突出权责清晰、扁平一体,完善“感知识别、研判预警、管控干预、评估反馈”闭环管理机制,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联调中心建设,构建镇街“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常态化开展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三服务”工作,迭代“四访”“民生之声”等治理品牌,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三是增进民生福祉。突出提质、上云,加强与西南大学、重庆八中等院校合作,探索集团化办学,提升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着力强基层、办专科,推进健康中国奉节行动,加快创成县人民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创建县中医院三级中医医院,深化与重医附二院等合作,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着力扩面、增效,推进养老服务全覆盖;着力拓岗位、畅渠道、搭平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针对外出务工群体开展“四门”活动,打造“夔州人”劳务品牌。

五、突出“党建统领、整体跃升”,打造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奉节范例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奉节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从思维理念、组织体系、能力本领、制度机制等方面发力,扎实推进组织工作现代化,努力把基层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一是完善政治铸魂体系。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抓实信念教育、政德教育、典型教育,抓好党员干部政治画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市委有要求,奉节见行动”;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县委常委会议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一主题、干部培训第一主课,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用好用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夔州宣讲”“青年院坝宣讲队”等宣讲品牌,厚植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思想动力。二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压紧压实党风廉政、意识形态、统一战线、政法维稳、党管武装等党建工作责任制,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数字重庆建设、美丽重庆建设、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等全市中心任务,健全县领导全面联系乡镇(街道)工作机制,推动党的领导全面覆盖、落到基层,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三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健全抓党建带全局工作机制,以多跨协同、系统集成为重点,加快推进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建设试点,建设数字党建大脑,加快未来社区建设,打造IOC未来治理、O2O未来服务等六大场景,创新“奉公办·更快捷”党建服务品牌,构建县域党建共同体;实施学先进学示范、促发展促提升的“双学双促”行动,常态化开展干部学习大讲堂活动,促进党员干部保持生成性学习、激发创造性张力,持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本领;抓实“八张报表”“八张问题清单”,深化“双晒双比、建功奉节”行动,开辟党建、招商、项目、民生、安全稳定等9条赛道,推行一线考察评估、具体事例评析、干群多维评价、综合分析研判“三评一判法”和“五色图”考核评估,树牢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营造唯实争先良好氛围。四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体系,常委会每年全覆盖听取乡镇(街道)和部门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巩固深化政治巡察,不断提升一体推进“三不腐”治理效能,推动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持续开展“作风兴县”行动,持续锻造优良党风政风,引领带动良好社风民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挖三国、诗词等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基因,加快建设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等阵地,持续开展家风助廉、青春倡廉、社区创廉等廉洁文化建设行动,打造“奉公守节”廉洁文化品牌。

作者:中共重庆市奉节县委书记

责任编辑:钟学丽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引领 加快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新巫山

曹邦兴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大局、统揽全局、引领变局、开拓新局,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重庆市委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一号工程”、作为全市工作总抓手,既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总牵引,也是一域服务全局的大战略,明确要求“全市域融入、全方位推进”。重庆市巫山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市委六届二次、三次全会工作部署,主动在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场景中谋划推进各项工作,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引领,坚持稳进增效、除险清患、改革求变、惠民有感的工作导向,重点抓好“两件大事”、打造具有巫山辨识度的“四张名片”,加快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新巫山。

一、着力推动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成为样板

巫山地处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这种独特的区位,决定了保护好长江“母亲河”、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是巫山最大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巫山将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守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最后一道关口。

(一)持续巩固拓展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成果

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构建“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生态品牌-生态效益”循环体系,“绿水青山”“颜值”不断提升,“金山银山”“价值”日益彰显。2022年巫山被评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巫山将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有效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培育构建以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康养、生态工业为主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加快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力争到2027年森林覆盖率72%以上,空气优良率98%以上,长江干支流水质稳定保持Ⅱ类。

(二)深入打好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攻坚战

一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乡,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质建设“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巩固发展以脆李、柑橘、核桃为主的百万亩经济林,以红叶为主的百万亩景观林,以提升三峡旅游品质的百万亩生态林。精心塑造最美岸线,高水平推进“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高质量打造一批岸绿、景美、亲水滨江公园。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巫峡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二、着力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巫山在脱贫攻坚战中,累计投入80余亿元,推动全县120个行政村、24640户89969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极大改善,涌现出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等为代表的先进典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上,巫山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落实“四千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一)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巫山将实施“稳粮扩油”工程,按照“粮进田、树上山”理念,大力推行轮套间作和林下种植,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加强土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加大撂荒地整治利用,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深入开展“大排查大走访大整改”行动,健全“线上监测+线下走访”动态监测机制,增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二)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围绕“百万亩生态种植、百万头生态养殖、百亿元综合产值”目标任务,做足“土特产”文章,合理布局粮油与特色经济作物,推动产业发展由重建设、重规模向重管护、重品质转变。持续壮大脆李、柑橘+核桃+烤

烟、中药材+蔬菜等“1+3+2”特色种植业,稳定发展以生猪、山羊、肉牛为主的生态畜牧养殖业。做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深化强村富民综合改革,发展“强村公司”,探索“村企联合”“民宿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提高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三)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

坚持尊重自然、彰显特色的建设定位,推广下庄村传统村落、光明村生态村落、权发村乡村驿站、安坪村和美家园等乡村建设新模式,坚决防止大拆大建,不搞盲目建设“堆盆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建设原则,大力实施“千村宜居”创建活动,抓好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一体推进农村路、水、电、通信和物流“五网”建设,打造小组团、微田园、生态化的巴渝和美乡村。

(四) 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

着力提升党建引领力,坚定不移加强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队伍建设,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总结提炼推广“下庄经验”。着力扩大群众参与度,推广官渡镇杨林村“七队治村、四家兴村、三员助村”等基层治理模式,让农民群众自己“说事、议事、办事、主事”。着力增强治理创新性,用好乡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深化“党建扎根·治理结网”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改革,推行乡村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激发乡村治理新效能。

三、着力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

巫山天生丽质,拥有长江三峡(巫峡)、神女峰、首批国家5A级景区小小三峡·小小三峡等世界级旅游资源,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吸引了李白、杜甫等无数文人墨客游览打卡,流传“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等名诗名赋6000余首,先后荣获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中国县城旅游品牌百强县。巫山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将旅游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加快建设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

(一) 完善旅游高质量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以五里坡世界自然遗产地和龙骨坡遗址公园2个世界遗产、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2个国家公园、巫峡神女景区和小三峡·小小三峡2个国家5A级景区、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和三峡港湾休闲旅游度假区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骨架的旅游产品体系,力争到2027年,年接待游客突破4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00亿元,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以上。

(二) 推动旅游全产业链条迭代升级

着眼国际范、中国风、巴蜀韵、三峡情,围绕现代游客需求,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条,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体验。加快打造以高端酒店、商务酒店、青年旅社、精品民宿为主的“长江宿集”体系,让游客住得舒心;内育“巫山美食”、外引“世界风味”,加快打造“三峡美食”体系,让游客“游在巫山、吃遍全球”;围绕巫山文化旅游IP形象,开发一批有纪念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文创产品,加快打造“巫山好礼”旅游商品体系。

(三) 推动“大三峡”旅游振兴

充分利用“水陆空铁”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加快打造“大三峡”游客集散中心,更好汇集四海宾客、八方友人。持续推出“三峡之光”大型长江情境夜游,高质量举办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神女杯艺术电影周、长江三峡(巫山)李花节、长江三峡国际越野赛等活动,提高“大三峡”旅游知名度。立足建设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核心区,携手推动三峡旅游区点、线、面协调发展,做到文化互动、游客互推、政策互享,共同打造大库区、大武陵、大移民世界级品牌,推进“大三峡”旅游一体化发展。

四、着力打造全国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地

巫山地处神奇的北纬30°,适宜的气候、良好的生态孕育了众多独特的生态产品。巫山将抢抓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机遇,推动更多生态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 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区

生态农产品是巫山最有优势、最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巫山脆李产值达18亿元,通过邮政航空专机卖向全国各地、出口新加坡,备受市场青睐。依托巫山脆李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做强做优巫山恋橙、巫山庙党、巫山蔬菜、巫山茶叶等产品,全力打造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地理标志农产品核心基地,让更多“山里货”变成“抢手货”。

(二) 加快打造高品质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

以摩天岭为中心的康养旅游度假区夏季平均气温23℃,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可览大江大河的奔涌,可观巫山云雨的壮丽,可赏巫山红叶的灿烂,是天然的旅游度假胜地。巫山将以摩天岭康养旅游度假区为重点,整合资源、扩大供给,加快完善多层次康养旅游度假体系。突出高端康养旅游度假定位,深入探索“康

养+”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康养+医疗”“康养+运动”等产品,创新发展独具三峡魅力、回归自然本真、引人修身养性的生态康养产业,唱响“云端三峡·康养巫山”品牌。

(三) 加快创建绿色低碳发展创新试验区

持续发展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打造更多具有巫山辨识度的绿色低碳发展样板。加快开发风、光、水、生物质等清洁能源,建设三峡库区清洁能源基地。加快推动降碳协同增效,围绕碳汇交易,探索“两山银行”“两山基金”等新模式,打造低(零)碳试点镇村,积极开展碳达峰先行试点。加快启动林业绿色碳汇交易,促进区域生态价值转化。

五、着力打造产城景融合三峡港湾城

江在城中、城在山中,山水相映、峡江相拥的港湾城市形态,赋予巫山独特的江城风格、山城特色。巫山将进一步促进城市街区、产业园区、景点景区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城市产业聚集力、综合承载力、公共服务力,努力建设生态本底优越、核心特色突出、人民幸福宜居的产城景融合三峡港湾城。

(一) 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规律,合理布局城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统筹推进生态城市、旅游城市、公园城市、人文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有序推进老城区人口卸载,加快推动高唐政务中心区、龙江文旅示范区、工贸产城融合区、早阳交通枢纽区、南陵文化旅游街区和康养旅游度假区协同发展,打造山上生态康养区、山下三峡港湾城,推动县城向30平方公里30万人规模拓展。

(二) 统筹推进江城、江镇、江村协调发展

以推动县城国际化、区域中心乡镇枢纽化、其他乡镇特色化为目标,充分利用显山露水的独特风貌,江河沿线峡、湾、嘴、滩、半岛等特色空间,推进大昌、官渡、骡坪、庙宇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生态康养、商贸物流等特色村镇,着力构建江城江镇江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让城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 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宜业放在首位。巫山将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面提升经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让城市更干净、更有序、更美丽、更文明。扎实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县乡村统筹配置、合理布局,着力把城市建成市民引以为傲的幸福家园、游客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

六、着力打造多式联运商贸物流枢纽

巫山始终把交通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关键性工程来抓,全面建成“水陆空铁”综合交通枢纽。巫山将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交通优势,一体打造大通道、大枢纽、大物流,加快建设“立足渝东北、辐射渝鄂陕、融入经济圈、服务双循环”的山区库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一) 打造大通道

全力完善路网体系建设,围绕“井”字形高速路网,加快推进奉(巫)建高速、两巫高速(大昌至巫溪段)两条在建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积极推动铁路网建设,积极开展安张普速铁路、沿江铁路前期工作。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积极争取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构建“一江四河”高等级航道网和“四货三客”规模化作业区。持续推进航空运输发展,加强与周边机场战略合作,提高机场货运设施能力和利用率。

(二) 打造大枢纽

加快综合物流中心提能升级,加快边贸中心综合物流中心、早阳临铁物流中心、巫山东高速物流中心建设。加快港口码头提质增效,加快红石梁散货集散中心建设,开展长江东向出海大宗物资集拼分拨,打通西向万州港转西部陆海新通道线路。加快空港物流中心提速建设,联通库区至全国物流航线,开通库区至各地集装箱及大宗散货转运航线。

(三) 打造大物流

积极搭建县级物流运输指挥平台,统筹工业、商贸、农产品等货运资源归集。加快推动物流运输“一屏管控”,全面融入全市数字通道建设,推动数字融合、数据融合、技术融入,切实提效率、降成本、增效益。建设一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大力发展公铁联运、高铁快运、水水中转,促进多通道协同联通,更好服务资源要素“快进快出、直进直出”。

作者:中共重庆市巫山县委书记
责任编辑:钟学丽

全县域全领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奋力打造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巫溪范例

李卫东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重庆引领带动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必须扛起的重大使命,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重庆市巫溪县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把重庆市委“一号工程”作为全县工作的总抓手总牵引,主动把巫溪各项工作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来谋划、放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中来推进,加快推动同毗邻地区产业发展同联、生态环境同保、城乡发展同步、公共服务同享,以全县域全领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成效为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作出巫溪贡献。

一、全力推进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造渝陕鄂川边区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巫溪县是重庆市四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巫溪将抢抓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重大历史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协同推动“五个振兴”,着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加快建设渝陕鄂川边区乡村振兴示范标杆。一是扎实推进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决守牢规模性返贫底线,进一步健全和落实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纳入、帮扶机制,紧盯最低收入群体、避免平均数掩盖最低数,动态掌握脱贫人口和易返贫致贫人口基本情况,持续跟踪收支变动、“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有人管、管到位。聚焦“五个振兴”总体要求,迭代升级、用好用足重庆市“一县一策”帮扶措施,加快布局实施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发挥好市级乡村振兴重点、示范乡镇引领带动作用,一体推进“1+2+5+10”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打造。二是千方百计做好群众尤其是脱贫群众增收工作。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加强技能培训,做好劳务输出服务,强化稳岗就业,切实稳定工资性收入;努力促进农业增产,提高产品质量,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增加经营性收入;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规范村集体资产、项目管理,不断优化财产性收入;保持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农民转移性收入稳中有进。三是建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尊重现状、保留特色、因村施策,深入挖掘乡土产业、文化、资源、生态等优势,做精做特乡村。统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深入实施数字乡村、智慧乡村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开展“五清五建一评比”,整村推进“厕所革命”,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构建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计划用5年时间,创建百个宜居宜业和美家园。

二、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区

巫溪县生态优良、资源富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潜力巨大,后发优势明显。巫溪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持续在“好山好水变成好风景、良好生态变为生产力”上下功夫,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区。一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支柱产业。坚持旅游为龙头,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创建行动,全力推动红池坝景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及国家AAAAA级景区,推进“全域生态化、景区品牌化、城市景区化、乡镇景点化、乡村田园化”,持续唱响“天地灵气·逍遥巫溪”品牌;健全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县旅游产品协同创新、线路品牌共建共享机制,加快建设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区,将巫溪打造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消费目的地。实施“旅游+”融合发展行动,深入挖掘巫溪优秀传统文

化特别是巫文化、盐文化、药文化、康养文化、红色文化、烤鱼文化、老鹰茶文化、巴绣文化等,打造全国知名文旅IP,着力催生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快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传承创新区。二是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坚持农为基础,聚焦“土特产”,打好“三峡牌”,全面融入全市预制菜、柑橘、中药材3个500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加快马铃薯、中药材、青脆李、茶叶等特色产业扩规模、拓链条、建集群,立足“中国老鹰茶之乡”,积极开辟、全力引领“巫溪老鹰茶”新赛道,推动巫溪优质农产品高品质、高效益发展,努力将巫溪建设成双城经济圈优质农产品供应地。实施农作物品种培优、宜机化改造,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创建马铃薯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国道地有机中药材基地县。深化“接二连三”“产销贯通”,培育“巫溪加工”“巫溪臻品”农产品加工、销售公用品牌,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渝陕鄂特色农产品集散中心,推动形成“汇集周边、卖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生动局面。三是大力发展绿色工业。全面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实施“一主两辅”主导产业培育行动,主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着力构建“巫溪烤鱼”预制菜全产业链,大力发展休闲小吃、茶叶、中药材精深加工、清洁能源、现代医药等特色产业,加快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工业体系。提档升级产业园区,强化招商引资,加快形成“一园多组团”格局,推动绿色工业集中集约发展,切实建好国际烤鱼之乡、西部小吃之都以及重庆市绿色食品深加工、中药制药、重要清洁能源、环保建材、教育装备基地。

三、全力推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建设东向北向开放门户

巫溪位于祖国版图的中心,贯通南北、承东启西,是陕南、鄂西进入长江航道的重要节点,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创新中具有特殊区位优势、蕴含强大内生动力。巫溪将更加主动融入和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化与渝陕鄂川毗邻地区交流合作,努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向北向开放门户。一是着力推动以数字化变革为引领的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推动数字重庆建设为牵引,突出数字化改革引领作用,统筹加强各领域改革攻坚,全面落实好高水平市场化改革系列举措,着力深化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努力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系统性成果。持续营造亲商、爱商、安商、敬商的良好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做好做优“欢溪办”政务服务品牌,用好“渝快政”“渝快办”等服务平台,推动政府管理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清除各类隐性门槛和市场进入壁垒,让巫溪成为投资“洼地”、产业“高地”。二是着力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进秦巴山区、三峡库区协同发展,创新开放平台,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快构建背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东南亚、面向海外的对内对外开放格局。加快由单方面经济开放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开放转变,广泛开展教育、文化、卫生、旅游、体育、环保等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开放领域、提升开放能级。加快构建对外大通道,聚焦重庆市西部陆海新通道“七大交通走廊”建设,进一步发挥好渝陕首条直连高速—重庆巫溪至陕西镇坪高速公路通车带来的便利和优势,全力推进两巫、巫云开等高速公路建设,深化巫城、巫奉利高速前期工作,规划研究巫十(襄)高速建设,全力争取安张铁路、洛阳过十堰至万州铁路开建,积极开展达开巫襄、渝东北环线等铁路研究,力争到2026年基本建成与周边县城1小时、重庆主城2小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4小时交通圈,渝陕鄂边区综合交通枢纽初步形成。三是着力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计划,积极争取深空探测项目落地,有序推进马铃薯区域重点实验室、中药材野外科学观测站等科研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园区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争取更多科技成果在巫溪落地,打造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示范集聚区。

四、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重点生态屏障

巫溪最殷实家底是生态,最亮丽底色是绿色。巫溪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力推进美丽重庆建设,切实筑牢长江上游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生态屏障。一是全力保持生态底色不变。把共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迭代升级“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乡”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入落实河长制,高标准推进“五水共治”,深入实施河流突出水环境问题整治、污水零

直排、饮用水质量提升等系列行动,全面提高水质稳定性、系统性。深入落实林长制,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绿化提升工程;健全森林火灾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应急响应”全链条、全周期机制,织牢森林防火“安全网”。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地管理保护水平,持续推进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强化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理,坚决守牢生物安全底线。二是全力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联治同保。着眼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长江沿线区县共同建好长江生态廊道。推动建立长江沿线区县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推动实现工业污染、畜禽养殖、环境风险隐患点等协同管理。加强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加强区域环境联合执法,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共同护好“绿水青山”。推动与周边区县生态环境政策标准统一、规则统一、措施统一,认真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等,积极争取长江流域常态化横向生态补偿等政策,形成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合力。三是全力保持绿色发展方向不改。稳妥推进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兼顾解决气候治理与能源短缺两大难题。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非国有林生态赎买改革试点,探索开展横向森林补偿改革和林业碳汇交易试点,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财富。深入开展绿色生活创建,引导和鼓励绿色低碳产品消费,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扎实推进垃圾分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加快建立完善数字生态环保体系,推广数字生态环保重大应用,让数字赋能生态治理。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与司法衔接,激发生态文明建设活力。

五、全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好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巫溪县面积403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41.44%,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国家园林县城、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称号。巫溪将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力促进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扎实建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一是以绣花功夫建设生态宜居的“恋恋小城”。全面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求,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突出山水特色、传承历史文脉,优化城区空间布局,加快大宁古城保护开发、马镇坝品质提升、凤凰水城规划建设,打造美得自然、建得从容、过得幸福的“森林之城、宁静之城、灵动之城”,充分彰显“重庆最美县城”的特色与魅力。深入开展城市缓堵保畅行动,突出治理油烟、噪声等城市病。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国家园林县城创建成果,深化开展美丽县城、美丽城镇、美丽乡村一体化示范建设。二是加快特色城镇建设。增强县城对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城镇对县城的支撑能力,支持毗邻乡镇抱团发展、一体化发展,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覆盖,加快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努力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三是持续推动惠民有感增福祉。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强化困难群众就业兜底帮扶。深化“渝创新”创业促进行动,鼓励支持返乡创业,打造“巫溪烤鱼工”“巫溪绣娘”等劳务品牌。巩固拓展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成果,推动县内学校与成渝“双核”优质学校共建教育联合体,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加快建设重庆师范大学凤凰附中、附小等4所中小学,打造渝陕鄂川边区教育(职业教育)高地、重庆市特色优质教育县。推动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创建三级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创建二甲医院,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巫溪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打造渝陕鄂川边区医疗卫生高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把巫溪建设成为一座“传承历史文脉,涵养巫盐文化、树立时代新风”的文化强县。深化“枫桥经验”巫溪实践,持续开展平安乡镇(街道)、平安村(社区)示范创建活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联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统筹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强化实战演练和应急物资储备,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作者:中共重庆市巫溪县委书记

责任编辑:钟学丽

迭代升级“五大”领域 都市农业“双高”发展

左 川

近年来,重庆市巴南区抢抓重庆中心城区唯一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城郊区位优势,大力挖掘“土特产”,着力打好“都市牌”,走出了一条都市现代农业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发展“双高”之路,对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2023年前三季度,一产增加值43.4亿元,增速4.5%,增速超全市一产增速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55元,居全市第二名。

一、聚焦“精”字,打造都市品牌农业

聚焦“一主两辅”,走“小而美、小而精、有特色”都市农业品牌发展之路。一是做靓“精品花木”名片。打造“花木巴南”特色名片,成立成渝(巴南)花木产业化联合体,现有花木市场2个、花木企业350余家,产值超6亿元。在金澜众创、盘龙花间、界石新玉、“双石”田园观光旅游带、巴县老院子等地布局“花卉+”全产业链,依托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提升做靓定心茶园、沱茶产业园、月儿弯弯、原乡艺术园等旅游景点,成为周边地区休闲度假最佳选择地。二是打造“精品粮油”基地。开展水稻、玉米、油菜、甘薯等“百亩方技术集成大比拼”,打造40个技术集成示范点。实施贡米产业计划,依托“石滩大米”品牌,打造优质水稻生产基地5万亩,黑稻0.5万亩。强化新品种引进培育和技术攻关,引进水稻新品种,开展玉米品种对比试验,带动全区水稻增产2.56%、玉米增产3.72%。积极推广丘陵山区使用农机具,全区水稻机收率达90%。三是唱响“精品果蔬茶”品牌。全面优化替换品种,以中坝岛为核心打造设施蔬菜基地1万亩。引进麦麦科技集团投资1.5亿元,打造全市规模最大的工厂化设施蔬菜基地。引进深圳禾顺公司建设重庆最大豆芽设施农业基地,打造全市现代设施蔬菜引领区。做响“食黑姜家”“二圣梨”“巴南银针”“沱茶”“香又香泡菜”等品牌,打造中坝番茄、麦麦食用菌、诱导癌细胞凋亡的绿茶多酚(EGCG)等爆品。一品草莓、接龙蜜柚、鱼洞乌皮樱桃成为城郊采摘网红打卡地。

二、面向“数”字,打造都市智慧农业

一是打造数字农业“一张网”,夯实产业发展数字底座。巴南区正在开发建设全国首个服务农业全产业链的“耘间·农业产业互联网”服务平台,构建“1+4+N”模块体系。“1”即打造关键核心“耘底座”,实现登录统一、数据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线上线下服务统一;“4”即打造生产、营销、服务、监管4大数字化生产场景;“N”即围绕“三农”领域改革、需求、场景“三张清单”开发N个数字化应用。利用产业互联网数字引擎柔性配置能力,智能化快速组合,形成适配性强、性价比高的数字化集群解决方案,精准匹配不同农业产业链个性化需求。通过构建4大数字化生产场景:数字生产场景,通过数字化实现种植养殖和加工企业生产标准化、数字化;数字营销场景,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企业特色品牌”体系,实现销售多样化、供需匹配精准化;数字服务场景,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实现服务集成化、高效化、便捷化;数字监管场景,通过业务聚合和数据共建共享,实现抽样、执法、数据统计、地力补贴发放、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各类业务的监管数据化。通过不断拓展N个数字化应用,逐步形成品种培育、农事、农资、农机、加工、冷链、品牌、交易、营销、电商、直播、科技、金融等多项全方位数字化服务能力,并持续拓展、迭代升级。二是上线数字“云服务”,提供农业生产便捷服务。上线“耘农机”社会化服务平台和“耘农资”集采集配平台,“耘农机”平台致力于构建农事在线供需撮合、农机在线调度、作业在线监管及补贴等场景,借鉴“滴滴打车”模式实现农事社会化服务全流程数字化。全区已成立10余支农机社会化服务队伍,累计完成15万余亩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业,培育农机操作人才180余名。该平台已得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可,并在江津等区县推广应用。后续巴南区将按照数字重庆建设有关要求,立足农机服务一件事,梳理形成三张清单,逐步迭代升级农机购置、上牌、使用、报废全生命周期应用场景,持续推动耘农机的商用化。“耘农资”平台通过构建大宗集采批发商城、订单及销售管理、采购管理、供应商管理、仓库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场景,实现农资集中采购、集中配送,做到保农资质量、优农资价格,让利于民。目前,巴南区农资集采集配服务已覆盖33个农资经销网点,累计实现集采集配1.1万吨,成交4200余万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持。三是打造“耘农·我有+”,扩大产品销售渠道。围绕

“一主两辅”特色农业产业,着力打造“我有一亩田”“我有一棵树”等“耘农我有+”认养农业,构建“资本下乡、产品进城”云通道。销售端通过提供认养、监控、直播、商城、活动等功能,数字技术链接生产基地,让消费者实现“云视频”“云监督”。生产端通过对认养基地土壤、气象、虫灾、农事劳作、农残监测等实行数字化在线管理,消费者可以远程查看认养的地块或产品情况。通过生产端数字化和销售端网络化共同发力,打造“科技+营销”双赋能模式,助力产出高品质农产品和创造高价值、高附加值。截至目前,共吸引1万余人次参与,带动城市资金3000余万元下乡消费。

三、紧盯“融”字,打造都市集群农业

坚持补链、延链、强链,加快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一是打造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区。正在建设国际农产品加工园、东盟农产品集散中心、南彭(国家)公路物流基地、生物医药城,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产加销运”一体化服务。引进新发地、植恩中药等龙头企业,实现农产品、中药材“产加销”一体化。打造火锅、肉蛋奶、中药材、蔬菜产业集群,以重庆刘一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打造“重庆火锅第一村”,现有火锅产业链规上企业11家,综合产值15亿元,其中加工产值5亿元。新建年屠宰80万头生猪当量国家标准化生猪屠宰场,保障主城屠宰产品安全供给。建成高品质黄精、山茱萸、红豆杉、菊花、石斛、藏红花等6个中药材基地,会同国际生物城,引进植恩中药等龙头企业,探索发展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等中药产业。提升改造中坝万亩主城蔬菜保供基地,打造全市第一设施蔬菜基地。引进芽苗菜龙头企业,打造重庆最大豆芽设施农业基地,实现高品质蔬菜“从田间到餐桌”。二是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大格局。紧盯“一区五城”建设和五大产业集群发展,全面实施“强镇带村”“强村富民”工程和“一镇街一辨识度”“一村一品”项目,创建国家级、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34个。大力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工程,打响做靓“古镇、温泉、巴县老院子、美丽乡村”四大文旅品牌,建成4A级景区8个,居全市第二名,将巴南打造成近郊游、短途游首选地。三是大力发展都市休闲旅游业。围绕都市采摘、近城游玩等布局民宿旅游、石斛、盆栽等庭院经济,助力农户快速致富。例如,姜家镇蔡家寺村发展“黑”产业,形成“吃住游”一条龙,产值达1900万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2万元。圣灯山镇滩子口村铁皮石斛庭院产业已发展300亩产量3万斤,带动167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四、彰显“绿”字,打造都市生态农业

推进生态低碳农业建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一是大力发展“绿色畜牧”。推动打造ESG山地现代零碳农业园,建成标准化猪场17家,达到零排放,实现种养循环。建成全市首个唯一国家级“两病”无疫小区,为全市动物疫病净化树立了示范样本,净化技术在全市推广。二是加快发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积极推广稻经轮作、稻渔共生、稻禽协同为主的“稻+N”模式,稳定水产品产量2.3万吨左右。在17个新建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探索“畜禽粪污+土著微生物+秸秆”绿色种养循环模式,全区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9.77%。三是开启化肥农业减量模式。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区创建,深入推进“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行动,通过数字化防控监测、精准施肥施药、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有效降低化肥、农药、兽药等使用量。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93%以上,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52.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成功创建“第二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整建制推进县”。

五、突出“变”字,激活沉睡资源

充分利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优势,持续深化改革,打通城乡要素流通瓶颈。一是破解人才流动障碍。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让试点村村民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决定城市人才落户和权益享受。二圣镇集体村已落户1人,是中心城区首例以“城市人才”名义落户乡村的人才。二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实现突破。成功入市2宗,面积26.45亩,成交金额1801万元,带动社会资本1.2亿元投入乡村产业发展,实现村(社)集体增收693万元。三是成功试点进城农户“四权”退出。制定《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权益有偿退出1+3+1政策体系》,形成农村权益退出闭环管理,在二圣镇集体村、东温泉镇河岸村、惠民街道胜天村成功试点。四是在全市率先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化改革。成立巴南区农村产权流转服务有限公司、23个镇街工作站、198个村级服务网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81宗,面积17780亩,交易鉴证金额13971.88万元。

作者: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胡越

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逻辑理路

宗成峰 李 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实际工作的切入点,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政治保障。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乡村振兴工作部署的战斗堡垒,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引领。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重视乡村产业发展,激发农民奋斗力量,引领乡村产业振兴。

马克思、恩格斯把支部列为同盟组织之一,使支部在组织体系中的重要性得以彰显。马克思认为,农业经济是其他经济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必须经过根本改造从而迸发更强的生产力,为社会整体进步奠定物质基础。发挥马克思主义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经济的根本改造和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列宁提出党支部要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励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还强调了基层党组织深入群众,发挥革命事业、产业生产领导作用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强调基层党组织在革命事业中的引领地位,至今仍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逐步开始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民发挥农业经济功能,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业合作化,引导工农业生产关系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基础。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规定,“农村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要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要根据本地实际和群众的愿望,带领群众勤劳致富,守法致富”。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提高党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我国乡村产业振兴、“三农”工作的引领作用,“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

(二)实践逻辑:引领乡村产业振兴,关键在农村基层党组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乡村振兴战略放在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加以强调,高度重视乡村产业振兴这一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精神富足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前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乡村振兴的领导,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开辟发展新局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产业振兴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4月25日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由之路。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农业农村仍然是“四化”的短板,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五大振兴”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党的科学引领和坚强领导。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突出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经营增收,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庞大组织的神经末梢,是贯

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方略的“最后一公里”,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长跑目标的“最后一棒”,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引领作用,稳扎稳打地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性机遇与挑战

新征程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只有自信自立,才能够准确把握机遇,在新的发展阶段将党的事业推向前进;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守正创新,才能够科学准确地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时代机遇

步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乡村产业振兴迎来众多机遇。准确把握机遇,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科学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

1.“一肩挑”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奠定政治基础

为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性需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制度,明确指出“推动村党组织书记通过选举担任村委会主任”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治理模式,通过法定选举程序和流程,使村党组织书记同时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负责人,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的全面领导。

村支书党政经“一肩挑”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有效提升农村治理能力的实践创新,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水平大幅度跃升的生动表达,该模式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基层党组织加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村支书党政经“一肩挑”治理模式有利于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和引领农村发展的经济效能,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产业振兴奠定政治基础。

2.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乡村振兴事业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将保障农民利益作为产业发展的目标和落脚点,把产业发展成果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同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素质党员队伍及新型职业农民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必要条件。为加快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产业振兴的基础性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加重视提高农业经营水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农业综合经营效益,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完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为农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为发展壮大农村经济提供重要保障。

3.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贯彻乡村产业振兴政策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而抓住乡村产业振兴这一关键点,才算是夯实了农业强国建设的根基。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贯彻乡村产业振兴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后,部分农村的产业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农村经济发展不够稳定,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以及产业发展不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引领,立足于乡村产业发展优势和特点,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带头贯彻乡村产业振兴政策,是乡村产业振兴政策的最终实施者,是推动乡村产业有序发展的最佳引领者。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至关重要,要坚持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进路。

1.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各类人才不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才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内生活力和不竭动力,人才不足是制约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社会加速转型升级,城镇化程度加深,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总人口减少、农村基层党员数量减少,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制约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因素。

另外,乡村专业型人才资源较为匮乏也是发挥乡村人才牵引作用的又一重大挑战。农村基层党组织要

结合现实需要,有序扩充乡村产业振兴各类人才,提升人才培养工作实效,打造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补足乡村产业发展专业人才不足的短板,为乡村产业振兴奠定更为坚实的人才基础。

2. 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不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需求侧看,人民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增加,产品需求日益多样化。就农业而言,人民对“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就服务业和旅游业而言,人民对乡村休闲旅游、生态观光、绿色养生等需求增加。解决这一供需矛盾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是提升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必要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取得重大成就,乡村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仍然有待提高。推动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是解决产业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加快实现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引导、领航作用。

3.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基层执政能力和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越来越充实,但目前部分农村仍存在带头人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服务于村民的第一线,任务重、工作压力大,不健全欠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会减弱带头人队伍开展工作的积极性,拖慢乡村产业振兴事业的进度条。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健全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机制。不过,要发挥制度约束作用和人才激励政策的共同作用,处理好内部制度约束与外部群众监督之间的关系,规范带头人绩效奖励和职业晋升空间具体政策,形成鼓励带头人锐意创新和真抓实干的工作氛围,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党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四力”,是科学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举措。

(一)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政治领导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将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到产业振兴全过程之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产业发展过程的政治导向和引领作用。

1. 加强政治建设,把牢乡村产业振兴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几条重大原则,其中位于首位的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乡村产业要振兴,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把牢重大政治方向。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坚决把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贯穿至乡村产业振兴的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确保乡村产业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方向一致;在党员人才培养方面,必须增强农村基层党员的“四个意识”,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选拔党员要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着手打造一支符合乡村经济发展规律的、党和人民需要的、政治过硬的高素质党员队伍。

2. 坚持村支书“一肩挑”,巩固产业振兴领导力量

村支书党政经“一肩挑”模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是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成功密码。

村支书党政经“一肩挑”治理模式,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事业中充分提升领导力的科学长效机制。坚持村支书党政经“一肩挑”,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村支书党政经“一肩挑”不动摇,持续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巩固产业振兴领导核心,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发展多样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筑牢乡村产业振兴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思想引领力

针对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的水平不高以及部分党员存在的服务意识不足等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需结合乡村产业发展实际,加强思想建设,提升思想引领力。

1. 以常态化思想建设筑牢农村基层党员理想信念堤坝

受诸多因素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仍存在部分党员思想素质相对较低、创新意识不足、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须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并将其纳入组织生活以及党员日常教育活动之中,不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增强农村基层党员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巩固农村基层党员的

理论素养、理想信念;引导党员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乡村产业振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发挥其在乡村产业振兴事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须将“三会一课”开到生产一线,鼓励党员主动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并将党员的群众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纳入党员教育管理全过程之中,促进思想建设与农村产业发展的双向互动。

2. 培育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党员队伍

农村党员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决定、带领人民致富的“一线”人员,党关于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是否得以落实,关键要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提升现有党员的整体素质可以从农村党员的质上弥补量上的流失,实现农村基层党员“质”和“量”的有机转换。

下好乡村产业振兴这盘大棋,农村基层党组织须培育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党员队伍,培育既深刻掌握党的政策理论、乡村产业发展规律,又热爱乡村产业振兴事业的高素质党员队伍;注重理论教育的同时还可以开展实践教育活动,激励党员化身为广大农民的“贴心人”,当好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服务员”。

(三)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产业振兴的群众组织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有增强群众组织力,才能够提升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水平,构筑起血浓于水的党群联系网,汇聚起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长效机制和磅礴力量。

1. 坚持走群众路线,巩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将党的政治路线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不能只追求数据的增长,而是要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知跑出“加速度”。

要完善将群众评价纳入党员考核评价体系的工作体制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三农”工作的信任感、依赖感;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把握人民对生态旅游和服务业的需求,充分挖掘乡村生态资源,根据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天然禀赋,制定可持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存的旅游业、服务业发展模式,将乡村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农业创新性发展内生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和保障。结合乡村产业发展实际,培育职业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下的生动表达。

农村基层党组织应通过多样化方式宣传党的“三农”政策,提升农民自觉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推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互联网素养培训会、“党员—农民”一对多结对指导服务、智能手机及短视频APP科普教育等活动,使农民了解“互联网+”的各种新型产业发展模式,为其参与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奠定认识基础;还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适度规模提供政策指导,充分发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的作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四) 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产业振兴的社会号召力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增强社会号召力,科学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发力,汇聚乡村产业振兴的全社会合力。

1.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管理培育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特派员队伍是党‘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多予、少取、放活”的“三农”工作基本方针在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方面的具体体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贯彻落实科技特派员制度,围绕农村产业发展突出的疑难杂症,加快将科技特派员的科技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优势;加强对科技特派员的培育和引导,实现乡村产业禀赋与科技特派员技术能量的有机融合;组建党员队伍和科技特派员专职宣传工作组,结合农民的科学素养现实状况,采用乡村广播、派发传单、实地宣讲、技术实操等方式讲解党的“三农”政策以及科技产品的具体操作办法等,使党的“三农”政策和农科技术真正为农民所掌握。

2. 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增强全社会助力产业振兴积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各类型经济主体的集中统一领导,扩大党组织覆盖面,有利于增强全社会助力产业振兴的积极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引领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集体经济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减少“轻党建,重业务”的不良倾向,提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社会共识。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增强全社会助力产业振兴积极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基层党组织建设规律和乡村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社会号召力的必由之路。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疫情防控中提升北京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0KDB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罗蕾.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有效运行的实践路径[J]. 智慧农业导刊, 2022(23): 122-124.
- [2] 路新华. 后扶贫时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探析[J]. 农业经济, 2022(10): 71-73.
- [3] 王琳. 党建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核心要义、内生逻辑与实践策略[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05): 10-17.
- [4] 蒙慧, 姜跃辉. 乡村振兴背景下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2(04): 53-60.
- [5] 刘兴平. 基层党建引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J]. 人民论坛, 2022(16): 72-74.
- [6] 邓衡山, 孔丽萍, 廖小静.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与政策反思[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03): 32-48.
- [7] 赵培, 郭俊华.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产业振兴的困境与路径——基于三个典型乡村的案例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 2022(03): 169-177.
- [8] 韩广富, 辛远. 2020年后高质量减贫何以实现——兼论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3): 84-96.
- [9] 蔡文成, 朱荣康.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治理: 优势、内涵与路径[J]. 求实, 2022(03): 4-13+109.
- [10] 蔡文成, 朱荣康. 村支书“一肩挑”治理模式的创新及制度优化[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3): 49-56.
- [11] 韩鹏云. 党建引领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02): 99-107.
- [12] 韩鹏云.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实践类型与整合转型[J]. 探索, 2022(02): 116-127.
- [13] 姜长云. 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与乡村产业振兴[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 1-11+22.
- [14] 郭俊华, 王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政策优化调整研究[J]. 经济问题, 2022(01): 85-92.
- [15] 王艺明. 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力点和突破口[J]. 人民论坛, 2022(01): 22-25.
- [16] 张保军, 周锦涛.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J]. 学术探索, 2021(12): 92-101.
- [17] 闫书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遵循[J]. 学海, 2021(06): 18-23.
- [18] 张铮, 何琪. 从脱贫到振兴: 党建引领乡村治贫长效机制探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11): 37-42.
- [19] 臧雷振, 刘超. 科技特派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嵌入式发展路径探索——多案例比较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11): 115-122.
- [20] 刘铮, 魏传成.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难点及对策[J]. 经济纵横, 2021(10): 122-128.
- [21] 韩广富, 叶光宇.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战略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0): 136-143.
- [22] 夏银平, 汪勇. 以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内生逻辑与提升路径[J]. 理论视野, 2021(08): 80-85.
- [23]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J]. 农村工作通讯, 2021(10): 4-6.
- [24]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J]. 中国统计, 2021(05): 13.
- [25] 赵欢春, 丁忠甫.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01): 91-99.
- [26] 王书慧, 姚桓. 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革命性锻造[J]. 新视野, 2021(01): 86-90+97.
- [27] 宗成峰, 李明. 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基本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 理论视野, 2020(09): 81-85.

作者: 宗成峰,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革命老区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 翌,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胡 越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基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数字乡村建设的案例研究

郝 妙 江成程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嵌入乡村社会,农业农村获得新的发展基础和动力机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数字化生产力,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让乡村地区搭上数字经济顺风车,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明确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2021年,中央网信办等多个中央部委联合编写《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同时,由中央网信办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明确“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发展目标、保障措施。由此可见,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

一、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与现实困境

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代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需求。数字乡村建设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为依托,应用于生产、生活、生态和治理等各个领域,形成以交互性和群结构性为特征的交互式群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生产数据化、治理透明化、生活智能化和消费便捷化。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乡村振兴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广阔的赋能空间,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耦合、相互赋能。抓住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机遇,激发数据要素对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赋能作用,构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经济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步伐,是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重要途径。

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是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是助力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工作,能够将现代技术所释放的红利应用到现实的乡村建设,从而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如何激发和释放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能和倍增效应,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迫切需要引起学界的重点关注和深入探讨。

然而,长期以来,城市现代工业经济与农村传统小农经济分立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形成城乡“经济鸿沟”。作为经济和社会分化的结果,城乡居民在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程度、网络资源的获取机会、信息通信设备的支付能力、数字信息的应用意识和使用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距,形成城乡“数字鸿沟”,具体表现为农村居民在信息生产的可能性、信息接入的可及性、信息支付的可担性和信息使用的智能性等四个维度处于劣势地位。

当前,数字乡村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经济与乡村具体情境结合产生了数字鸿沟、产业瓶颈、治理赤字等多重实践窘境,面临数字乡村建设基础设施薄弱、应用水平较低、专业人才匮乏、政策供给不足、数据共享不充分等问题。从全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干部群众数字意识淡薄。当前,部分基层干部数字意识发展理念跟不上,认知片面、理解肤浅,少数企业家数字化意识不强,多数农村居民数字知识和基本训练相对匮乏,全社会数字化氛围相对薄弱。二是建设资金保障不充足。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涉及面广、任务重、周期长,回报率低的特点,建设投入资金需求量大,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不高,建设资金保障不及时、不充足。三是产业数字化程度较低。一方面,部分乡村产业单一,数字技术应用不强,市场竞争力不高;另一方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不足,各产业之间关联较少,生产效益较低。

二、兴文县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基于乡村的地方性、独特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目前地方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有一定差异。因此,需要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乡村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本研究以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为例,从县域视角阐释数字乡村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的实践探索。

兴文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川渝滇黔结合区域,幅员 1380 平方公里,辖 8 个镇、4 个苗族乡,总人口 50 万人,其中苗族人口 5.2 万人,是四川省最大的苗族聚居县。兴文县是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县、扩权强县试点县、革命老区县、乌蒙山区扶贫连片开发省级规划县、智慧城市试点县、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现行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和评价体系等民生领域亟须改革、转型、升级,农业及旅游产业发展需要数字化手段和措施来突破传统的思维与方法。兴文县提出新型智慧城乡建设,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将大数据打造成产业发展的“裂变器”,民生民本的“服务器”、基层治理的“监测器”、辅政决策的“咨询器”,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数据驱动智慧创新应用。一是创新改革体制机制,实现网络信息安全与数字乡村建设运营可持续;二是创新实施“五统一”,实现“智慧县城+数字乡村”发展可持续;三是创新探索县域政务“数网安全”防护体系建设与运营,强化数据与网络信息安全保障。2020 年兴文县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是四川省唯一入选《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代表性案例的试点地区。

(一)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保障智慧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

一是组织管理体制机制。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长的大数据创新发展领导小组、以县委书记任主任的网络信息安全和大数据发展委员会,组建现代智慧农业园区管委会、兴文县网络信息安全和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国有大数据公司等,推进兴文县智慧城乡建设。

二是责任落实机制。制定县监委、目标办、智慧办按月通报考核机制,建立定期会商、通报督办、测评反馈、奖惩问责等制度,每月数据分析、定期汇总、及时反馈各级各部门智慧化应用推进情况,对推进不力、应用较差的部门和人员,实行通报、约谈和问责,并纳入县委县政府综合目标考核,与奖惩挂钩。

三是技术支撑机制。成立全国首家由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各应用部门参与的县级智慧城乡研究会,聘请国家发改委、中科院、北京大学等国家部委、科研院所及高校的 43 名信息技术专家为科技顾问,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宜宾学院等高校共建电子商务数据应用联合实验室、数据信息安全联合实验室、博士工作站,组成强大的智库和技术支撑。同时,兴文县人民政府与四川省智慧城乡大数据应用研究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兴文县打造四川省智慧城乡建设应用研究基地。

(二)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全力消除网络孤岛

一是加强网络通信设施建设。兴文县先后投入近 5 亿元,用于改造、升级县域内的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全县 12 个乡镇 183 个村(社区)4G 网络全覆盖,县城区、重要乡镇及重点景区 5G 覆盖。兴文全县手机用户有 41.52 万人,广播电视接入 14.3 万户,农村固定宽带接入 10.12 万户,普及率达 91.68%。

二是建设县级云计算中心。兴文县先后投入 8000 余万元,用于购买广电、移动、联通、电信四家运营商互联网主干网络 10G 的出口带宽,整合四家运营商网络设备,建成符合国家信息安全三级标准的县域云计算中心。此外,兴文县还升级改造城乡电子政务外网,自主开发了云网综合监测系统,为全县企事业单位提供云服务。

三是建立“数网安全体系”建设与运营。构建电子政务外网局域网,实现横向到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纵向到全县 12 个乡镇以及重点村社区的政务网络服务全覆盖,并将 IP 地址与单位终端 MAC 地址绑定,有效防范 ARP 攻击与 IP 地址冲突,切实保障了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数据与网络服务,助力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

(三) 积极推动数据共享,逐步消除数据孤岛

兴文县把县域内的政务信息系统全部迁移到云计算中心,实现共享虚拟计算资源与网络安全资源,既节约建设成本,也为数据融合奠定基础。整合智慧化综合监管与服务,形成便民服务缴费、效能监察、政务信息公开、综治调解系统、公众监督平台等 53 个信息化平台系统,覆盖全县 57 个部门和乡镇,推动数据融合应用、打破信息孤岛,形成“1+4+N”智慧应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兴文县乡村

振兴局与第三方公司合作研发“盯村抓户”APP,方便信息采集及后期数据管理使用。“盯村抓户”APP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任务,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四)数字赋能,打造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区

兴文县建设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区,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园区以数字赋能稻虾养殖为特色亮点,以特色农业基地为依托,实行以稻虾为主导产业,蚕桑、生猪、林竹多个配套产业的发展模式,规划建设核心稻虾养殖区2万亩,辐射带动全县发展10万亩。稻虾智慧农业产业园区安装传感监测设备,通过科技投入和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池塘内的溶解氧、pH值、浊度、水温等水情,不断探索适合当地小龙虾的孵化技术标准,持续提高虾苗成活率。

三、兴文县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显著

(一)社会治理便捷高效

兴文县建成智慧全域监管与服务平台,实现县城区、重要景区、12个乡镇共298个单元网格全覆盖。智慧平台汇聚接入公安天网、“雪亮工程”、数字城管等各类视频数据3694路,整合12345市民热线、12319城市服务热线、微信监督案件上报和兴文全县近70个政务服务窗口远程监管系统。智慧平台运行以来,累计受理涉及政府管理、民生服务等各类案件逾40万件。相关部门利用大数据智慧平台为群众挽回损失近1.8亿元,找回走失小孩、老年人共计62人,找回丢失财物181次,极大地改善了县域的治理环境。

(二)便民服务日益完善

兴文县积极建设便民应用集成平台,开通30项便民应用子系统。自平台运行以来,累计8000余万人次参与便民服务应用体验,代缴水电气费、社保等交易额达11.2亿元。完善智慧医疗系统,县内12个乡镇卫生院实现远程诊疗,建设“知农云课堂”,为农村居民提供远程技术服务,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效显著

过渡期间,兴文县建成智慧党建居民帮扶数据采集监管与服务系统,通过开展“三联三同”党建帮扶活动,县乡村3000多名干部参与,对全县10万多户居民数据实行动态采集与核实,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做到了实时动态监管、实时动态服务、实时动态提供精准高效决策数据。自主研发的“盯村抓户”APP,能极大方便信息采集及后期数据管理使用。通过每年开展一次全覆盖信息采集,更新到村到户基础信息和风险状况,全面分析每村每户的基本情况、风险信息。对重点对象每月开展监测工作,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风险信息,及时落实监测帮扶,化解返贫致贫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兴文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和创新创业孵化园是集“技术支持、培训孵化、产品对接、品牌建设、网络推广、信息服务、物流服务、金融信用和其他衍生增值服务”为一体的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兴文县建成1个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12个乡镇级电子商务服务站、129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孵化出1家区域电子商务平台企业、3家专营农特产网络销售企业、100余家个体网商。2020年实现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13.2亿元。开展电商培训30余次,参与人员900余人。农副产品生产企业入网率高达100%,上行农产品种类达100余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网覆盖率80%,培育出“九丝红”“方竹笋”“乌骨鸡”等优秀电商品牌。成功创建省级电子商务脱贫奔康示范县、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县,熨王山镇、五星镇成功创建市级电子商务示范镇。

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全面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兴文县通过建设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乡村产业、乡村便民、乡村监管和乡村决策的数字化转型,构建县域特色的“云网数”中心、创新数网安全“牛鼻子”举措、创新县域数字转改实现路径、确立“六融八跨”新思路、组建县域国有数网新型运营商、构建符合县域特点的数字基础支撑体系、创新县域国有数网新型运营商联盟、总结出可复制推广的“八个首创”新标准工作亮点,对数字乡村建设如何赋能乡村振兴有以下启示意义。

(一)借鉴先进经验,打造特色试点

一是学习总结推广经验。总结兴文县数字乡村试点的建设经验和存在难点问题,学习借鉴东部沿海等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发扬优势,突出重点,击破难点,打造国家数字乡村试验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标准,逐步推广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交易,乡村治理的数字化。二是突

出地域特色打造试点。针对各地乡村产业、乡村治理、应急管理等情况和具体需求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突出地方特色,将乡村旅游、森林火灾、地质灾害、洪水旱涝、乡村治理等各种信息进行数据整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亮点,进行展示并开展工作。三是营造良好宣传建设氛围。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对各地数字乡村建设的工作成效进行全面宣传报道,总结推广成功经验,营造有利于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 加强共建共享,整合数据资源

一是做好数据采集工作。数据采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工作,如人员信息、灾害风险点、重点产业等数据信息,需要乡镇人民政府、村两委、企业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二是整合数据资源。加强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打破“数据孤岛”“信息壁垒”现状,把乡村产业、土地、应急、道路、房屋、居民管理等数据进行整合,开放非涉密的数据权限,允许部门间查看、调取;整合现有的“雪亮工程”、森林防火、自然灾害等监控设备数据,融合气象、水利、交通、环保等传感设备数据,实现数据资源横向共享。三是下沉数据权限。通过进一步拓展数据使用范围,将数据权限下沉,尽可能实现县乡村三级政府的数据共享,实现数据纵向共享,让更多层级和更多部门分享使用数据,充分共享数据。四是增加数据黏性。以需求为导向,在数据更新、关联等领域下功夫,尽可能满足相关部门及其他使用者的诉求,提升用户留存度,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充分发挥数据的强大作用和效力。

(三) 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一是加强市县顶层设计。在市级层面,由市委网信办牵头,统筹制定数字乡村的建设方案、标准规范,分解落实任务。县级层面,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任组长,制定试点建设实施方案,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乡镇层面,结合实际,责任到人,落实到位。二是构建部门协调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定期汇报制度,强化网信、财政、发改、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商务、应急等部门间的协调沟通,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保障项目全面、有序、高效推进。三是强化绩效考核激励。完善监督考评激励机制,用绩效说话,将数字乡村建设纳入县级政府年度考核,掀起创先争优热潮,命名表彰数字乡村示范县、乡、村,激发工作热情,提升工作效率。

(四) 强化财政保障,加大资金投入

一是加强财政补贴。通过市、县两级政府财政补贴,特别是加大对数字乡村项目的惠民补贴,“众人拾柴火焰高”,动员更多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让数字乡村建设深入人心,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二是成立专项资金。将数字乡村列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建设项目,通过财政支持,探索成立专项建设资金,各部门根据需要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保障项目建设。三是用好用活社会资本。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更宽松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参与,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基金项目:四川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调研项目“宜宾市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项目编号: DY202221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王胜,余娜,付锐. 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 改革, 2021(04):45-59.
- [2]张旺,白永秀.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的理论构建、实证分析及优化路径[J]. 中国软科学, 2022(01):132-146.
- [3]赵智,廖明辉,阳盼盼. 重庆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J]. 重庆行政, 2022(06):106-108.
- [4]夏显力,陈哲,张慧利,赵敏娟. 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2):2-15.
- [5]张蕴萍,栾菁.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理论机制、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J]. 改革, 2022(05):79-89.
- [6]何雷华,王凤,王长明.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中国乡村振兴? [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04):1-18.
- [7]沈费伟. 数字乡村的内生发展模式:实践逻辑、运作机理与优化策略[J]. 电子政务, 2021(10):57-67.

作者:郝 妙,中共宜宾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讲师

江成程,中共宜宾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

责任编辑:胡 越

以数字化变革引领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黄朝永

数字化是经济社会变革的关键变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更是国际竞争的最前沿。适应数字化变革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数字化引领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改革任务。

一、数字化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

(一) 数字化正引起深刻的经济社会治理变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技术、新应用持续涌现,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在服务业领域,传统商业企业建立的从销售公司到大区分销商,再到地市级分销商、批发市场,最后到百货公司、超市的庞大金字塔结构,在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改造下,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和简单化。电商平台让商品信息透明,搜索引擎实现海量商品快速查找比选,网上支付结算加快配送到家的现代物流,商贸业正经历彻底的流程再造、体系重构。

在农业领域,传统的千家万户小规模分散种养殖被数字化整合为工业化大生产,“智慧农业”应用归集所有涉农数据,打通产供销各环节,帮助农民看政策、看行情、找农资、找农机、找农技、找保险、找贷款、找物流,种养殖场实时数据分析,可精准决策饲料投喂、田间管理等,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可控,线上线下产销对接,解决种(养)什么、怎么种(养)、卖给谁等长期困扰农民的问题。

在工业领域,传统的设计与制造、生产与销售分离,按计划排产、流水线组装的生产方式将逐步消失,工业大数据平台、智能制造云平台和数字孪生工厂为产品规划、工艺设计、加工组装到试制、批产、销售等全过程赋能。越来越多的企业基于智能决策进行生产运营,“黑灯工厂”和“无人车间”对冲年轻人不愿意进厂的问题,即时制造、零库存、零缺陷和智能化、绿色化的未来工厂正大行其道。

在社会管理服务领域,政府全面、实时掌握社情民意,精准识别灾害风险并自动生成警级,公务员选拔任用智慧研判并模拟调配等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推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治理精准化、服务高效化。

(二) 数字化变革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引擎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顺应数字化变革大趋势,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前,我们迎来了数字化社会,但所有制度仍然是按照工业化社会安排的,行业条条管理,地区各自为政,管理层次多,信息传递慢,数据不共享,业务不协同,遇到问题相互扯皮,党政机关与社会、与企业之间管理和服务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沟通成本高,社会交易成本高。数字化将倒逼企业、社会、政府改革,推动各领域工作体系重构、业务流程再造、体制机制重塑,传统组织的金字塔管理将实行扁平化、简单化、分布式管理,以数字赋能为手段,以数据流整合决策流、执行流、业务流,解决条块分割、决策迟缓、部门响应不一、协调不畅问题,将从整体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党中央对数字中国建设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一系列文件,为数字化变革指明了方向。

(四)建设数字重庆是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重庆一直肩负全国改革探索的重大使命。早在1983年2月,国务院批准重庆为全国首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2007年6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重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重庆积极改革探索,为全国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

踏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面对数字化变革大趋势,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战略部署,重庆有责任继续为全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探路。为此,重庆市委提出,把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鲜明标识,以数字化变革为牵引,以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为撬动,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改革成果,勇当内陆省份改革开放的探路先锋。

二、明晰数字重庆建设思路

(一)搭建“1361”整体构架

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提出“2522”整体构架,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安全“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对接国家规划,结合实际,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数字重庆建设“1361”整体构架,第一个“1”即建设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包括智能感知系统、互联网、视联网、无线宽带、服务器、存储硬件设备、政务云网等基础设施体系;自然人库、法人库、电子证照库、空间地理信息库、信用库、专题库和部门数据仓等数据资源体系;特定业务领域智慧大脑、模型库、学习算法库、机器认知库等应用支撑体系;基础组件、公共组件工具集成等能力组件体系,以及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IRS),实现全市数字资源一本账管理、一站式浏览、一揽子申请、一体化配置。“3”即数字化市级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区县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镇街基层治理中心,统一规划部署建设覆盖全市、贯通三级中心,具有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决策支持、事件流转、终端反馈功能的智慧系统,构建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监督“一览无余”的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及时感知发现问题、精准控制风险、高效解决问题,实现对公共安全、群体性事件、生产事故、重大舆情等高效处置。“6”即建设数字党建、数字政务、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六大应用系统,每个系统设置若干跑道,组织开发应用。第二个“1”即构建基层智治体系,既要承接六大系统开发的应用和下达的指令,又要根据权责清单策划特色应用并向上贯通,同步与三级中心业务协同。

(二)制定分阶段建设目标

2023年形成重点能力,标志性成果是:搭建起数字重庆建设“四梁八柱”,三级中心基本建成贯通,至少一个重大应用在全国性大会交流经验。一是形成较强的平台底座支撑能力。推进云网数整合归集,加强应用支撑体系建设,迭代升级总入口“渝快办”“渝快政”,初步建成平台底座。二是初步形成重大应用谋划开发能力。全面开展各地区各部门各系统核心业务梳理整合、重大任务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三是形成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三级中心贯通和管控能力。一体部署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三级中心,构建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监督“一览无余”的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四是初步形成应用系统优化迭代能力。优化“6+1”应用系统(体系),重点领域整体效能提升,加快基层智治体系建设。五是初

步形成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度保障能力。加强实践总结和前瞻性研究,形成一批数字化改革理论成果,初步建立数字重庆建设话语体系。出台一批平台技术支撑、数据目录编制、综合应用开发、网络安全保护等政策规范,初步形成数字重庆建设制度体系。

2025年形成基本能力,标志性成果是:形成2~3个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重大应用。一是基本建成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以党政机关整体智治为引领,基本形成即时感知、高效运行、科学决策、主动服务、智能监管的数字化治理新形态。二是基本形成数字化服务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起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带动市域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三是基本建立数字化建设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全面总结各地区各部门数字化改革工作实践,固定共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形成相对成熟的数字重庆建设话语体系,基本构建起科学规范的数字重庆建设理论和制度。

2027年形成体系能力,标志性成果是:重大标志性应用大量涌现,探索出具有新时代特征、新重庆特点的市域数字化治理路子。一是“6+1”应用系统(体系)融合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基础性、全局性和根本性改变,数字化发展水平西部领先,成为新时代市域范例。二是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度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数字重庆建设全面见效,建成丰富完善的数字化建设理论体系、制度体系。三是数字驱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全面形成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体系,对市域治理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全方位、系统性重塑。

三、抓好数字重庆建设重点任务

(一)梳理核心业务

准确界定核心业务,将本单位本地区工作主线、法定职责与当前需要落实的重大任务对接即为核心业务。当前需落实的重大任务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对本领域本地区所作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委和市委、市政府对本领域本地区本单位提出的重大工作要求,基层企业群众反映强烈、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核心业务不等于“三定”规定里的主体业务。

梳理核心业务有三个目的:一是摸家底,通过梳理明确哪些业务已数字化、哪些不需数字化、哪些将要数字化。二是找问题,通过整理找出相近职能、交叉职能,发现工作缺位、错位问题。三是做应用,按照权责一致原则理顺关系,确定优化的业务协同流程、数据集成流程,形成任务整体画像和优化方案,为业务流程再造和工作体系重塑创造条件。

梳理核心业务程序有四步:一是明确范围,划定核心业务的职能职责边界。二是划分业务层级,将核心业务拆解为一级业务(业务模块)、二级业务(业务单元)、业务事项(部门履职具体化的最小单元)。三是找出二级业务、业务事项数字化运行的指标及所对应数据,形成数据串、数据项。四是形成业务流程图,纵向梳理贯通到底,理出哪些业务事项从市级贯通到基层单位,数据怎样回流;横向梳理展开到边,理出业务事项从上一个单位怎样来,走的是串联还是并联,本单位办理有哪些环节,办完后怎样到下一个单位,找出流程办理中的问题。

分类处置核心业务梳理结果,一是对没有发现问题的核心业务,按照原工作流程落实重大任务,不开发数字化应用,也不需要再造业务流程。二是对存在问题但可不开发数字化应用的核心业务,通过谋划改革举措,优化业务流程,完善工作体系,解决突出问题,推动重大任务落实。三是对存在问题且需要开发数字化应用的核心业务,坚持“同类的归并、关联的协同”原则对拆解出来的业务事项优化整合,解决流程不优、材料重复提交、协同不够等问题。

建立核心业务构架体系,按照重大任务、事件、事项所对应的一级业务(业务模块)、二级业务(业务单元)、业务事项(最小颗粒度业务),分别找出需要业务协同的单位、需要共享或调用的数据,建立业务协同模

型和数据共享模型,按照业务事项—二级业务—一级业务的顺序逐项检查、集成汇总,形成新的业务层级及对应指标,将指标的数据串和数据项进行重组,形成核心业务构架体系。对核心业务构架体系较为复杂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转化开发驾驶舱,作为该单位该地区核心业务指挥调度平台、监测展示平台。

(二) 编制“三张清单”

编制重大需求、多跨场景应用、重大改革三张清单,是构建重大应用、推动制度重塑的重要抓手。

一为编制需求清单。动态梳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列出贯彻落实需制定的政策、推进的工作;动态梳理群众、企业、基层反映的高频共性问题;动态梳理先进地区需要学习借鉴的改革创新实践。对三类需求事项归集形成重大需求清单。重大需求需要满足高频事项、能集成到“渝快政”或“渝快办”运行两个标准。

二为编制场景清单。针对重大需求制定工作方案,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多跨协同、解决问题、满足需求,这个多跨协同的场合、情景就是场景。要从工作流程长、群众反映问题多、协同部门多、职能交叉多的业务中找出多跨场景。针对业务事项建立指标体系,组织数据对接,通过业务协同模型和数据共享模型进行优化,生成新的业务单元对应二级场景,生成新的业务模块对应一级场景,集成所有场景形成多跨场景清单。多跨场景要满足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的“三融五跨”标准。

三为编制改革清单。改革要动体制机制,不能把日常工作叫作改革。编制改革清单就是要弄清楚针对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措施,达到什么目的,带来什么变化,怎样带动全局,而不局限于数据共享。准确理解改革要把握8个不等式:一是改革优化体制但不颠覆体制,改革 \neq 革命。二是改革调存量,但调存量 \neq 改革。比如一个单位的分工调整就不是改革。三是改革增加财富,但增加财富 \neq 改革。比如增加投资、普调工资都不是改革。四是改革要创新,但创新 \neq 改革。创新有知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改革是制度创新,其中0到1是原创性改革,1到N是迭代升级改革,A到B是改革经验复制推广。五是改革出政策,但出政策 \neq 改革。改革不是大箩筐,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改革是针对性强的举措、方案。六是改革会出错,但试错 \neq 改革。以前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有不确定性但有可以摸的石头、有方向到河对岸,不是瞎改革。后来提出“改革啃硬骨头”,因为剩下的改革涉及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阻力大,充满风险。现在提出“加强顶层设计”,由上级把大局、把方向、把原则,要求改革更好,失误更少,不是盲目试错。七是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化 \neq 改革。市场化意味着更有效率或更低成本,商品市场化带来商品和服务自主选择,要素市场化带来人才、资金自由流动,但有的改革比如教育、医疗、政治、文化和党建都不能走市场化道路。八是改革要攻坚克难,但单项突进 \neq 改革,改革要争取大多数,要全面深化、综合配套。编制改革清单要领会把握这8个不等式。

(三) 构建重点领域“一件事”场景

“一件事”是将多个分散的相关业务事项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改革集成、流程再造,实现事项联办、工作联动、问题联治、风险联防,提供集成式一站式管理和服务。

“一件事”有五个标准:一端受理:网上设置“一件事”专区,实行“一次认证、一点登录、一网通办”。一次告知:对“一件事”涉及事项的设定依据、申请材料、受理标准、审批条件、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进行梳理,形成统一办事指南和审核要点,变多部门分头告知为整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一表申请:对“一件事”涉及多个部门的申办材料、表格进行精简、优化、合并,形成“一张申请表格”“一套申报材料”,变“多次填表、多头提交”为“一次提交、多家共用”。一次联办:推动跨部门跨区县跨层级贯通服务、并联审批、联合评审、联合勘验、联合验收等集成服务。一次办好:对符合申请条件、材料齐全的即刻办结;对申请材料次要条件或手续有欠缺的,在当事人承诺补正后容缺办结;不能即刻办结的由审批部门在承诺时间内办结。

构建“一件事”场景的方法:按业务流程全链条梳理各环节事项,明确各个环节有关部门的职责和申请人需要提供的信息,对需要数字化的环节进行数字化,推进部门业务协同和改革。以浙江电动自行车治理“一件事”为例,梳理出生产、销售、登记、骑行、停车充电、维修、报废回收7个环节,涉及公安、消防、经信、市场监管、商务、环保、住建等多个部门。设计“一码统管”系统,在生产环节,推动企业对车、电池检验合格后赋码出厂;在销售环节,推动经销商扫码入库、扫码销售;在登记环节,推动交管部门对车、电池扫码核验,与购车人信息关联后发放车牌;在上路骑行环节,推动路面执法扫码核查;在停放和充电环节,推动扫码集中充停规范管理、预防火灾;在报废和回收环节,推动车、电池扫码回收注销,规范回收行为,防控环境污染。通过电动自行车治理“一件事”,实现闭环管理、跨部门协同管理,大幅提高部门工作效率和百姓的改革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四)全市统建应用“一本账”

全市统建应用“一本账”,目的是统一话语体系,避免各搞一套、造成混乱;统一功能,全市一个库进行功能比对,一个单位或地方开发了具有某项功能的应用,别的单位或地方原则上不再策划开发,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统一质量,市和区县都用“三张清单”论证办法进行审核把关,保证开发的应用能上下贯通,一地创新、全市复用,实现预期效果。对纳入“一本账”的应用项目统一管理,制定分批开发计划,按照“上级交办先建、急用先建、成熟先建、高频惠民惠企先建”4条原则,明确开发建设先后顺序。按照“谋划一批、实施一批、贯通一批”的思路分批开发,滚动推进上线。

四、健全数字重庆建设推进机制

一要健全领导体制。数字重庆建设是建设现代化新重庆全新的探索实践,是“一把手”工程,要落实“一把手”责任,不能有“业务外包软件公司”思想。单位或地区一把手要亲自抓、带头干,紧盯目标任务,建立工作台账,定期调度工作。数字重庆建设是建设数字中国的组成部分,要加强与国家对口部委的汇报沟通,争取指导支持,确保改革方向与国家顶层设计和总体要求一致。积极争取国家安排改革试点,其他省市试点所获得的经验做法要争取平移复制。

二要建立专家咨询机制。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揭示数字重庆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般规律,为数字重庆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强化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推动重庆改革实践上升为理论成果。强化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数字重庆建设的思路、举措、项目。

三要健全工作绩效考评体系。突出以人民为中心、以质量效益为核心,开展一体化智能化数字平台综合评价,对上线的重大应用开展动态评估,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管理服务对象等的意见建议,对运行效果未达到预期目标的继续完善,对需要迭代升级的继续做深做实。把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绩效作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内容,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任免、奖惩的重要参考。

四要建立优秀应用推广机制。制定优秀应用培育计划,对接年度重大改革、回应群众企业基层所盼,突出群众易用好记、企业办事方便简捷,建立应用项目策划、储备、开发、推广的闭环管理机制。强化典型示范引路,对上线的重大应用实时亮晒、赛马比拼,建立重大应用“一地创新、全市推广”清单,筛选在全国、全市有示范性的重大应用组织观摩、培训推广,努力打造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

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数字重庆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张波

数字重庆建设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分析及应对

肖 军 陈林培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数字重庆是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聚焦重庆特色发展，主动塑造数字变革新优势，积极拥抱数字文明新时代，以数字化引领开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新局面。对此，数字化重庆建设将以“一年形成重点能力、三年形成基本能力、五年形成体系能力”为目标，以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助力重庆的数字化新发展。

一、数字重庆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

重庆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战略执行地。在重庆数字化的发展进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安全性问题。

首先，数字重庆是重庆作为直辖市对数字中国建设给出的市域范围的答卷，其包含于数字中国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也呈现出一种数字化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山城特色。从国家安全概念来看，数字重庆这一省市域的重要规划应当属于国家安全所涵盖的内容。

其次，国家安全其主要的范围在于国家层面。数字中国建设是国家层面宏观的政策，而数字重庆是微观视角下的省市域范围内的实际建设规划。在分析省市域中所存在的国家安全要素时，既不能脱离国家安全中的“安全”范畴，也不能脱离“国家”的内涵，应准确把握和处理好宏观和微观的问题，不对“国家安全”做扩大化的分析，也不狭隘理解其基本意思表达。

最后，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数字重庆时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为导向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始终是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实践导向。数字重庆是数字中国的生动实践，是在省市域的角度给出的数字化建设、数字化治理、以数字化推动现代化的有力答卷。

二、数字重庆中的国家安全风险分析

在数字重庆的推进过程中，无疑会存在一系列的安全性问题。根据重庆所提出的“1361”的建设目标，从国家安全的视角下分析可能存在如下风险因素。

（一）信息网络安全风险

在数字重庆建设目标中，基于一体化的信息平台以及六大应用系统，无一不需要强大的数据算力以及网络的互联互通的支持。由此在网络基础设施的搭建与维护、数据的传输与存储等方面存在着涉及信息网络安全的问题。^[1]

1.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

常见的网络基础设备包括网络交换机、路由器等等。所谓安全，就是要保障这些设备不受内外干扰和侵袭，以及保障其可持续运转为经济发展持续赋能的状态和能力。

其一，在数字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对网络基础设施的首要要求就是不受干扰侵袭以及保障经济运行的可持续运转。而病毒、网络攻击、谍报人员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和不法分子都可能对网络基础设施造成损害。其二，数字重庆的建设进程中，是否具有保障网络基础设施不断为经济赋能的能力。在数字重庆“1361”建设规划中并没有保障网络设备正常运行以及提升防范外部攻击的能力的规划。当然，在具体过程中会有相应的网安部门对其进行保障，但是数字重庆建设中的安全保障应当纳入整体规划的顶层设计之中。

2. 隐私数据的安全

数据安全是数字重庆建设的重点所在,在数字化协调工作场景建设的目标中达到: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监督“一览无余”这样的应用场景,就意味着数据内容的更大开放和数据的广泛流转。在此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数据的传输错误、泄露等情形,从而导致数据的不安全。

其一,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数据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有效治理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这种政府开放和集中存储的信息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府的公信力,一旦发生数据错误甚至是泄露,可能影响对地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也可能引发某些公众非理性行为。同时由于“数据存储的一朵云”的构想,在整个数字重庆建设和运行的数据中,不仅仅是包含政府的政令,也包含着一些国家的重要基础建设信息以及相关地理位置等等,将这种信息进行专业的二次分析后可能会反过来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2]

其二,对于企业而言,数据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企业中的数据要素是企业经营和生产的润滑剂;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数据健康发展和流动,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失去的不仅仅是企业经济利益更是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3]同时,企业也是数据流通和保护的重点对象。从人员职能监管上来讲,政府机构的人员具有国家公职主要受国家监察机关的监察,而企业内部人员采用保密协议主要受企业内部合规部门监管。从违法成本来讲,公职人员泄密可能涉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而企业人员泄密如情节达不到立案标准可能只是作民事赔偿,那么当在高额利益的诱惑下,企业内部人员极可能出现泄密行为,从而威胁企业数据安全。

其三,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渝快办等政务 APP 具有强隐私性的应用,存有较强针对性的公民信息,一旦泄露便会由此引发财产等合法权益被侵犯。在社交、消费购物等网络平台空间,也存在着灰色数据交易,其藏匿于互联网的隐蔽角落。这些利用网络爬虫手段所获得的数据交易中,包含着个人信息等大量秘密信息在内的隐私数据交易。这些数据可能被不法分子进行有针对性的诈骗、非法营销、网络骚扰、网络贷款与暴力催收等,威胁着不特定多数人的正常生活以及财产安全。^[4]

(二) 科技安全风险

科技安全关乎数字重庆建设的成败,其关键在于核心技术设备自主可控,关乎数字化推进重庆发展的战略领域和优先方向。

1. 核心技术设备的风险

要保证数字化推进的稳健运行就得保证高新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一方面,对外来科技的依赖程度如何;另一方面,是否具有保证科技核心稳定运行的能力。具体而言,对于数字重庆建设中的使用的各种基础科技设备而言,其国产化率还不能做到百分百,许多材料和设备还需要依赖国外进口。如果此时出现类似中兴通讯芯片事件的情况,那么此时无疑便是对数字化推进的致命打击。

另外,在数字化推进重庆发展的相关规划中,其重点放在了数字化应用的层面,强调的是数据基础平台、重点领域应用,而相关的核心技术保障等方面还不足够明确,即当核心设备科技出现问题时,缺乏相应的应急处理机制。因而在数字化重庆的建设中,应当不仅仅包含数字化推进,也应包含科技能力保障。

2. 科技创新发展的风险

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保证我国科技自主可控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亟须谨防出现“硅谷悖论”和“开放性悖论”现象。

其一,知识产权是保障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度,科技创新是保障科技安全以及核心自主可控的重要手段。知识产权本是从西方的“舶来品”,但经过一定时间段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5]重庆在《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年)》等政府公开文件中均同时指出要扩大科技开放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只停留在单纯的科技保护之中,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科技创新壁垒,但过度开放也可能导致收益率下降。

其二,科技发展处于一种非协调状态,在推进数字化的今天,从国家到地方都大力支持和发展数字科技。但是在数字化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盲目发展和无序发展。比如,在重庆数字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基层单位拥有多套软件系统,其原因是数据之间的权限不足,所以只得另开门户。^[6]这不仅导致科技开发的无序性,还会让政府的资金非必要流出。

(三)其他重要安全领域风险

国家安全是交叉性、综合性的,其不仅仅包含着信息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也包含着经济安全、人民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多方面安全因素。

1. 经济安全风险

数字重庆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从宏观上推动重庆市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在数字化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对传统生产人力方式产生一定冲击,另一方面会与其他行业竞争资本。其次,企业的发展除了政策的支持外也离不开资本的身影,资本由其逐利性选择投资高精尖的科技型或者其他较低风险企业,而传统行业比如农业等则投入比例会相应占比较低。最后,对于就业以及营商环境而言,国有企业在整个数字化竞争过程中,相较于小微型科技企业而言,具有一定资金和政策等优势。

2. 国土和军事安全风险

国土和军事安全,是数字重庆建设中涉及的二级安全因素。首先,从国家战略而言,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直辖市具有重要的经济、军事、资源战略意义。其次,重庆位于三峡库区上游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另外重庆是国家天然气开采重要矿区以及其他重要的矿产资源开采区。最后,重庆也承载着许多重要的军工研发项目。由此,一旦信息泄露或者某些重要的军事设施遭到破坏,那么对于国家而言便是重大损失。

3. 社会和文化安全风险

从非传统安全要素来看,数字重庆所建设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数字化现代化。其数字党建、政务、经济、文化、法治、社会这六大应用系统,展现出数字化社会治理方式,在智慧教育、数字健康、智慧康养等社会治理层面,过分强调数字化治理可能导致脱离实际,引发科技发展与人民素质不协调的问题。^[7]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来看,占比2.67%的文盲人口也可能使用智能设备困难。思想舆论阵地保护、数字文化与传统文化等文化安全相关问题,在数字化推行的过程中,既有正面的推进也有灰色地带的影 响,文化数字化发展如果得不到有力监管可能会成为不法分子的逍遥之地。

三、数字重庆中国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化解

国家安全风险是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萌芽,如果任其肆意发展那么可能威胁着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现代化建设中要谨防“达摩克利斯之剑”“阿喀琉斯之踵”,也不能忽视“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对于省市域范围的数字化建设而言,如果其中有关风险不能得到及时地排查和解决,那么便会滞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一)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问题

在维护国家安全以及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时必定离不开良好的顶层设计和扎实的实践基础。

其一,解决数字重庆中的国家安全问题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基础,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将安全的思维纳入顶层设计之中,并不只是涉及安全而是将安全纳入与发展同等地位,也并不只是局限于一时一事之安全,而是保障现在以及将来的持续安全。只有从国家长久发展大局上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让“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共同作用才能不断向前,任何一方缺失便会走向歧途。

其二,处理好数字重庆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做到“以问促改”“以改提质”。数字重庆是数字中国的市域实践,在数字中国整体框架下不断地发展精进。要以问题为导向,将数字重庆发展中的矛盾逐一解决,抓重点、难点、用经典矛盾形成经验,抓住一个解决一片。以解决现实问题和预谋未来发展,促进数字重庆的高

质量发展,最终服务于数字中国整体规划和中国现代化进程。

(二) 防范化解风险的具体途径

1. 优化从业人员资质

一是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首先,以培养本土人才为主,依托重庆丰富的高校资源,加大教育科研投入,形成特色专业特色办、弱势专业合力办,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高校名片。其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加就业岗位和提升岗位待遇,以从业人员能力为重点考察对象,做到能者上,人才尽其用。最后,健全完善相关人才政策以及加大人才引进宣传,形成一个政策、观念上保护和优待人才的良好氛围。

二是健全人员监管监察机制。首先,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条例,以标准和规范画出一条从业红线。其次,对核心技术人员进行从业资格审核,一方面是确保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要确保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减少内部泄密的机会。最后,不论是企业抑或政府的监察人员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执法,不能监管过度而影响技术人员的科技创新能力。

2. 保障网络科技设备可持续运行

第一,增强维护核心设备的能力。一方面,创新发展科学技术以增强其本身运转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增强防护核心设备遭到破坏的能力。首先,对于“卡脖子”技术和设备,应当加大研发投入,举全市之力而非一人一企之功。其次,对于基层一线工人要不断提升培训其业务能力,保障广大的技术设备稳定运行。最后,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以及防范攻击测试,做好应急演练,防止出现风险时而不能及时有效应对。

第二,完善对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证,数字重庆建设中对新产出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进行,在政策制定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为基础,依托高校、社会智库以及群众调研建议为创新思路,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驱动目标,统筹制定符合重庆地域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政策。在执法环境上,注重监管与开放,以开放合作促进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以执法监管打击恶意剽窃与抄袭。在市场方面,鼓励知识产权有关公司和业务的发展,鼓励知识产权的产业化、商品化。

第三,优化产学研协同道路加大成果的高质量产出。促进院校与在渝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以高校科研与企业科研相结合,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也丰富学生实践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在校企合作的道路上,不仅是与大企业合作也要注重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与创新,一方面,中小企业是市场的重要主体,具有数量多且发展潜力强等特点;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产学研道路体系的建设可以助力解决经营难题。^[8]

第四,核心设备的安全审查。在生产重要的基础性的设备时,从生产机床、原材料等各个地方都应该接受国家安全审查。一方面,保证设备不会被国外直接操控和隐私数据非法跨境流动;另一方面,是保证设备可以持续为国家经济建设持续发力。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时要依法依规进行,在执法流程上,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以及各行业标准严格审查。在审查主体上,由海关、公安、国安以及其他有关主体共同进行。须注意的是,审查时应该客观公正,既不能随意扩大国家安全概念,也不能任由风险发生。

3. 数字经济的审慎监管

一方面,企业的数字化改革,在数字重庆建设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科技类公司的发展,也要促进相关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革。在数字化重庆的推进中,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以及加派相关专业人员辅助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革。此外,企业本身也要提高相关人员的职业素养,制定企业数字化改革的具体实现途径。^[9]

另一方面,金融投资业的监管审查,数字金融科技对金融行业发展和公司盈利具有正向作用。但是在国家安全的视角下,要保证基本经济制度不发生改变,金融行业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就意味着要对金融发展进行审慎监管。首先,就重庆而言,可以依托数字重庆的建设,以数据大平台对金融公司的开户、投资动向、资金流水等进行监管,防止资金的非正常流转。其次,要支持投资公司以及银行将资金一部分倾向于传统

行业的改革,而非只是高精尖科技发展。再次,要强化国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国企投资、辅助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要健全金融信息披露、风险评估预警、合规管理等制度,借助期货、证券等行业协会的力量,依托证监会、公检法、仲裁、网信等有关部门,破除行业和制度的壁垒,统筹经济发展和金融投资业的安全稳定。

4. 强化其他的重点领域监管审查

第一,统筹规范相关法律政策。数字化推进重庆的现代化发展,必然给传统的法律以及政策的施行带来一定的挑战。首先,在遵循相关上位法的基础上要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政策的立、改、废、释。其次,要建立起具有实践效果的危机处理机制,保证危机来临可以有条不紊。最后,要让相关的法律上层建筑服务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限制社会的发展。

第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首先,虽然数字化改革会带来许多便利,但同时也应该保障特殊人群的利益。要让数字化为所有人谋福利,而不是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其次,继续保持并不断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市民问政模式。最后,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和市场监管,借用数字化平台与线下监管执法双通道模式,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第三,把握文化高地。要处理好数字化推进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去粗存精,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创新融合。要把握好舆论阵地,推进相关法规政策的完善以及人才培养,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特别是群体性、热点性事件的有效处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的体系建设与实施措施研究”(项目编号:20&ZD19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李竹,肖君拥. 国家安全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178.
- [2]梅傲,陈子文. 政府数据开放中的数据安全隐忧及其纾解[J]. 情报杂志,2023(5):76-85.
- [3]王敬勇,华雨倩. 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数据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以滴滴为例[J]. 当代经济,2023(3):12-18.
- [4]苏丽洁. 个人数据泄露问题及其规避——以2019年网络爬虫事件为例[J]. 科技传播,2020(16):179-182.
- [5]陈佳举,张瀚洋.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道路与科技自立自强[J]. 科技与法律,2023(3):10-19.
- [6]刘瑶. “一中心四体系一网格”架构 破解重庆市基层治理数字化难题[J]. 重庆行政,2023(2):55-57.
- [7]胡扬名,林慧.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12):956-960.
- [8]谢文为,何刚,益湛磊等. 面向中小企业的产学研技术链协同创新体系研究[J]. 广东经济,2023(4):48-53.
- [9]Chen X, Teng L, Chen W. How does FinTech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2(61):101697.

作者:肖军,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博导
陈林培,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安全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小侨

实现价值共创: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的新理念与新路径

张 鸣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公共服务,一头连着党和政府的初心,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而在数字时代,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必然要运用数字化改革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去促进民生福祉的优质共享,这也向我们提出了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如何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命题。

一、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时代呼唤与主要内涵

(一) 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时代呼唤

1.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指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庄严宣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由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于破解美好生活的制约因素,高度重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尤其是通过公共服务提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要在不断发展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

这种价值追求在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出后进一步细化落实为政府政策的实践指向。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将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主要标志,同时在实践层面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公共服务事项提出一系列政策要求,“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要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要完善兜底救助体系,加快缩小社会救助的城乡标准差异,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住基本生活底线。要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重点解决好新市民住房问题。”^[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作出部署:“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4]

可见,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质效,形成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美好生活图景,进而实现社会公共价值最大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落实到实践上,就是要在政策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扩大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破解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各种堵点、痛点。

2. 数字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对国家信息化发展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数字社会建设是构建数字中国蓝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其中,拓展数字化公共服务在数字社会建设中处于首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5]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部署,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融合升级平台渠道、夯实支撑基础、加强组织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优化政府服务的具体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十分注重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此,《意见》要求构建政府、公众、企业共同参与,优势互补的政务服务格局,并提出通过开放网上政务服务资源和数据,鼓励企业和社会开发利用创新服务供给模式。202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专设一篇“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其中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的首要任务就是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并从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服务模式的具体任务。2022年6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公共服务高效化取得重要进展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指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企业和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并从打造泛在可及的服务体系、提升智慧便捷的服务能力、提供优质便利的涉企服务、拓展公平普惠的民生服务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通观上述三份文件,均把价值共创作为拓展数字化公共服务的核心理念、思路及实施手段。一是在理念上突出精准对接并满足全体人民的服务需求。上述文件均清晰表达了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手段破解群众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二是在思路注重基于协同共创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提供了机会。上述文件均提出通过开放共享政府数据资源鼓励公众、企业、社会机构等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提供,使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在推动以公共价值牵引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为公共服务价值由全社会共同创造提供了条件。三是在实施手段上强调围绕用户视角“一件事”进行整体联动。上述文件均聚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服务设计,强调基于用户视角开展“一业一证”“多卡合一”“多码合一”等事项集成化办理,推动在政府内部围绕“一件事”进行整体联动式的价值创造。

(二) 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主要内涵

价值共创理念起源于市场营销领域的研究。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研究认为,价值由顾客决定和共同创造,其在顾客消费和使用服务时产生。因此,顾客是重要的价值创造者,顾客通过购买产品服务并加入自身的个性化知识和技能来实现服务的价值属性,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使用价值,实现价值共创。随着价值共创在商业领域蓬勃发展,其影响逐渐扩散至公共服务领域。有学者指出,价值共创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新趋势,公共价值创造的服务目标、“去中心化”的多元主体参与,以及遵循服务管理的公共服务生产逻辑是实现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主要路径^[6]。基于对电子政务服务的考察,研究发现电子政务服务价值共创过程中存在角色转换、信息透明、持续对话与持续迭代四种基本特征^[7]。同时,部分学者对如何实现价值共创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进行了系统考察。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的研究发现价值创造者(社区居民)—代理人(街头官僚)关系为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组织与服务使用者提供了概念框架,公共服务组织与服务使用者、政府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社区公共服务的价值共创^[8]。此外,资源禀赋在主体间的分布不均是价值共创生产模式得以实现的基础之一,而数字平台与技术能在更大范围内激活资源,

形成价值共创的生态系统,纾解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9]。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通过对街道公共服务生产的研究发现,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价值共创模式的实现依赖于相关要素的有机互动,居民参与、主体间关系建设、服务创新、知识的挖掘与应用构成了价值共创模式的基本要素^[10]。

根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字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结合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内涵为: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引领下,聚焦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系统内相关机构与社会多元主体合作形成具有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并依托数字技术推进公共服务供需精准匹配、服务方式智慧便捷、服务覆盖公平普惠,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全社会优质共享,有效增强全体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和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而推动社会均衡发展。这一内涵的结构要素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以满足全体人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公共价值引领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现代政府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求。^[11]尤其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改革,必然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引领下,为全社会创造公共服务价值,破解以往服务供给“供非所需”“供不应需”的结构性矛盾。

第二,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系统重塑。价值共创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要求围绕解决人的高频需求和关键问题,在党的领导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群众等主体高效协同,形成具有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并通过改革创新、制度重塑推动公共服务的多样化、立体式供给,打造一系列多元联动的场景式公共服务。

第三,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多跨协同的流程再造、模式重构。在运用数字技术将物理空间数字化、网络化、物联化、智能化的基础上,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一方面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内各主体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有效互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底层逻辑上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协同供给模式;另一方面,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即依托数字技术实现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服务策略精准集成、服务供给精准触达、服务效果精准评估。

第四,价值共创的结果体现为全体人民感受到的效用增加。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是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价值共创的结果就体现为全体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真实感受到的效用增加,这种效用的衡量标准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更多体现为主体的主观获得感和满足感。

二、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运行框架

(一) 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运行框架的理论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12]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也必然要通过合适的方法和运行框架加以落地实现。换言之,即要对公共价值创造过程进行有效的管理。对此,美国学者马克·H·穆尔在《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以及创造公共价值的主要途径——“战略三角模型”。穆尔的“战略三角模型”具有鲜明的结果导向,强调公共价值来源于社会价值,由公众和政府共同决定,核心内涵是政府的产出要满足公众需要,以实现对社会公众有价值的结果^[13]。同时,“战略三角模型”作为政府战略管理工具,用于帮助公共部门管理者寻找、抓住各种机遇,以充分创造公共价值。围绕这一目的,政府需要在相关工作开展前,确定组织的使命,并将使命传达给组织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确定目标后,组织进行战略执行,一方面要争取法律和政治上的支持,即必须能够持续地从政治环境中得到授权和资金;另一方面,组织必须具有运作和管理上的可行性,即相关机构应利用和运作组织内外部的操作资源(财政、职员、技能和技术),以满足公共价值产生的需求,同时通过网络化治理(构建并维持公共、私营和非营利组织的同盟)来提供公共价值,顺利完成授权的行动^[14]。由此可见,使命、权威与合法性、运作能力构成了“战略三角模型”的三根支柱,实现了对新公共管理工具的改造。此外,穆尔的理论在聚焦公共价值创造的同时,十分关注公共价值管理中的绩效评估。

穆尔认为,开发用于支持价值创造战略执行的评估系统不仅有助于辨别“战略三角模型”每个点上要做的工作,还能获知具体工作的影响力如何。“战略本身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支持战略执行的绩效评估系统也得不断变化。开始时,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关于价值的政治协议,也没有一个衡量它的、完美的科学方法。”^[15]穆尔指出,衡量公共价值的有效系统应综合使用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因为除了创造预期结果方面的工具性价值,某些过程的特性在公共部门中是有价值的。

在穆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学界对公共价值实现过程进行了持续研究。影响较大的价值生命周期模型从上游、中游和下游对公共价值实现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了界定。上游主要涉及价值产生和价值识别,其中价值识别需要考虑识别工具的可用性、差异性和限制性,其方法主要包括在决策制定和分析过程中通过民意调查、投票、文本分析和其他参与机制吸纳各种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对不同价值进行排序并确定优先级^[16]。中游涉及价值工具和价值执行。在价值工具方面,由于公共价值有多种实现方式,因此包括了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工具。在价值执行方面,学者布鲁因和迪克概括了三种主要机制,一是等级机制,通过政府的监管和罚款等实现公共价值;二是网络机制,政府创造条件促使不同主体在谈判、协商的互动中达成公共价值;三是市场机制,政府策略性地利用市场力量以实现公共价值^[17]。下游涉及价值实现和价值结果,其中价值结果即公共价值的实现程度和效果,体现为服务对象感知到的效用、结果,及其与预期价值之间的关系,回答产生什么产出和结果的问题^[18]。

(二) 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运行框架的构建

就实践指向而言,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与公共价值生命周期模型倡导的运行机制是高度一致的。首先,在价值识别阶段,要了解服务对象的价值偏好,准确识别其价值诉求,也即穆尔强调的政府的产出要满足公众需求。其次,在价值执行阶段,要运用相关价值工具和执行机制确保公共价值的有效实施,这也是“战略三角模型”发挥其战略工具作用的关键环节。最后,在价值结果阶段,要构建穆尔提出的用以支持战略执行的绩效评估系统,对价值实现程度开展评估。综上所述,结合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内涵,构建了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运行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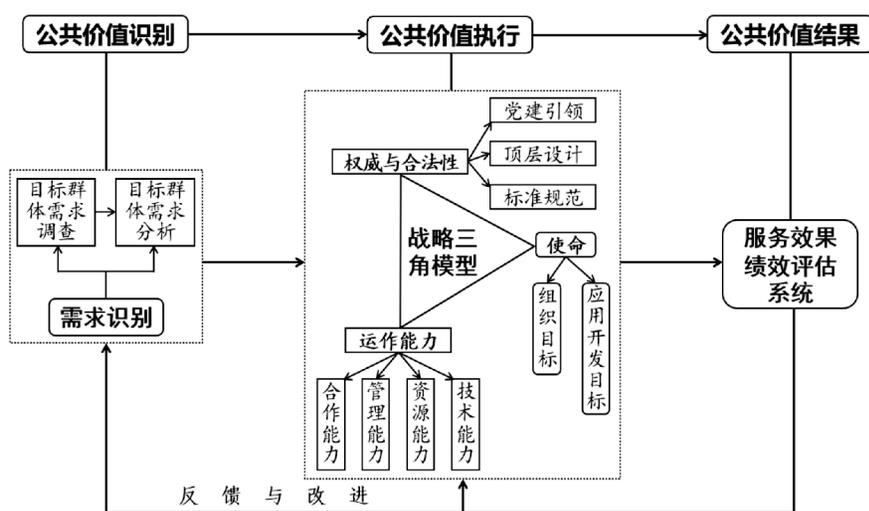


图1 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运行框架

该框架的运行流程同样始于公共价值识别,要求公共服务供给方在投送数字化公共服务之前,应通过多种方式对服务目标群体的现实状况进行调查,准确把握、分析预测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目标群体需求明确拟投送数字化公共服务的性质、特征、场景,为“战略三角模型”有效运用奠定基础。

进而,依托“战略三角模型”进行公共价值执行。其中,使命维度主要指向组织目标、数字化应用开发目

标。具体而言,组织目标即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方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应根据目标群体实际情况和需求确定清晰、可衡量、可达成且各方认同的服务投送目标;数字化应用开发目标则基于组织目标进一步细化明确具体领域、具体场景的服务投送目标。权威与合法性维度主要涉及党建引领、顶层设计和标准规范。党建引领能够克服公共服务多中心合作生产存在的不足,实现有序合作生产并走向公共价值共创^[19]。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中的党建引领就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引导和党的政治领导掌舵下,推动党组织有效嵌入行政、社会与市场力量中,推进资源整合、功能融合,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顶层设计指高层级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政策文件和政策实施机制,确保价值执行过程权责明晰、行为有据、运行顺畅。标准规范不仅是巩固和推广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更是公共服务质量管理和机制创新的基石和动力。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应通过建立标准规范体系为价值共创提供操作规范和权威依据,同时巩固改革成果,促进服务供给的流程再造、机制优化、制度重塑。运作能力维度主要包括合作能力、管理能力、资源能力、技术能力。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的价值共创除了需要资源能力和技术能力的“硬”支撑外,合作能力、管理能力对于实现价值共创也具有重要作用。明晰公共价值之后,政府应主要通过网络化治理来提供公共价值^[20]。加之政府在合作网络中往往发挥领导者、动员者、监督者的作用,因而政府建构和管理合作网络的能力,以及体现出来的合作诚意、合作技巧是公共服务价值共创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序合作生产网络的运转与维持需要有效的管理,以完备的管理机制和高素质管理团队为代表的管理能力对于形成“生产”合力从而推进价值共创同样必不可少。

紧接着价值结果,服务效果绩效评估系统通过构建公共价值实现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全时空多维度绩效信息采集,对价值实现效果进行实时评价。与此同时,评估系统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价值实现效果反馈及问题诊断,持续改进对公共价值的识别和执行。由此,形成“价值—行为—结果—反馈—改进”的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闭环运行框架,确保公共价值在迭代循环中不断“扩大再生产”。

三、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实现路径

依据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运行框架,结合当前数字化改革实际,加快实现公共服务价值共创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 人机协同准确识别、整合服务需求,牵引公共服务价值共创

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特征,而且相较企业服务,公共服务需求的识别还会遇到来自减少误差、准确辨识、整合需求等方面的困难^[21]。因此,只有通过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方式,才能准确识别、整合服务需求,从而有效牵引公共服务供给侧价值共创。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服务需求全域融合感知与识别。利用数字技术全天候、智能化的优势对行政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网站、主流媒体、网络平台中的公共服务需求进行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同时,建立公共服务需求在线点单平台,建设服务需求自主表达和服务项目库、活动库点单场景,对群众服务需求进行智能分析和归纳整合,当需求强度达到阈值时自动触发供给机制。另一方面,利用网格化管理和专业团队精准捕捉服务需求。一是通过网格化管理打通感知群众需求“最后一米”,尤其对于数字弱势群体,应由村社干部、网格员代表其进行需求表达或服务点单,从而补充、修订大数据分析结果。二是利用专业力量开展服务需求细颗粒度分析。利用专家团队、调查公司对特定群体的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如运用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法对留守老人小孩、农民工等的访谈资料中传达价值偏好的特定词语和短语开展细颗粒度分析,进一步摸清服务诉求。

(二) 强化党建与标准推动,引领公共服务价值共创

由于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因而党建引领本质就是对公共价值的引领。为更好发挥这一优势,应推动党的组织链条延伸到城乡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各环节,使基层党组织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网络,在深入联

系群众的过程中及时发现识别群众需求。在服务供给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党统筹协调领导作用及合纵连横组织优势,打破部门间、地域间、不同主体间条块分割、碎片化的合作困境,打造多跨协同的一体化服务供给体系。同时,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服务模式,更快更精细回应不同服务需求。在服务结束后,以党组织带领群众有序开展服务价值绩效评估,并通过党组织的纽带反馈群众意见建议。此外,要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标准规范体系。通过建立服务公开承诺制度,倒逼服务提供者进行服务资源、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的梳理与优化。通过引入公共服务质量管理模型和标准化管理体系,推动各类服务提供者完善服务模式,开发服务技能,并在统一框架下相互学习、推广创新,加快从质量管理到质量卓越的跨越。

(三) 科学设定使命目标, 促推公共服务价值共创

应面向需求并聚焦提升托育、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居住等关键公共服务办事体验,科学设定服务组织、数字化应用开发目标,以清晰、可衡量的方式进行呈现并传达给公共服务供给侧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乡镇、村社等基层组织,从而促推各方朝着服务目标开展步调一致的集体行动与合作生产。在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要在政绩追求和服务对象需求之间达成平衡。从以往情况看,政府出于政绩追求千篇一律地投送某种公共服务会导致大量资源浪费,不仅无助价值共创,反而造成价值共损。鉴于此,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目标设定必须要在政绩追求和服务对象需求之间达成平衡,从而增强目标价值的合法性与各方认同度。第二,要在理想状态和现实实际之间达成平衡。全民畅享数字化服务是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创的理想状态。然而,仅从理想状态出发设定数字化应用的开发目标,进而据此考核用户活跃度、访问人数等,往往会脱离实际场景,导致数字服务“中看不中用”和群体间“使用鸿沟”扩大。因此,数字化应用开发目标的设定应通盘考虑各种使用场景,提供多种服务接入方式和备选服务方案。

(四) 提高项目实施运作能力, 保障公共服务价值共创

运作能力强调达成价值目标的能力,资源、技术能否获得以及是否具备较强的合作、管理能力,对于目标的实现均十分重要。在合作能力方面,政府应搭建合作协商平台,将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纳入项目实施过程,培育各种伙伴关系以形成多样化的合作生产方式。同时,优先在与民生紧密相关、公众需求迫切的领域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在管理能力方面,建立健全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项目宣传推广、运营维护、绩效管理、人才招聘等机制,破解以往数字化服务项目重建经管的弊端。在资源能力方面,改革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鼓励推广 PPP 模式,打破相关规定对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束缚,吸纳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更高效地实现价值共创。在技术能力方面,高层级政府应统筹加强对通用算法、模型、组件、模块的开发,迭代升级现有通用工具和组件,并加强对自然语言处理、视频智能分析、语音智能问答等技术的研发应用。同时,打造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实现人口情况、服务设施、资金投入“一站研判”,服务事项“一键触达”。

(五) 优化服务效果绩效评估系统, 提质公共服务价值共创

建议借鉴绩效评估中经典的“4E”(包括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评估)评价法,构建公共价值实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大数据采集、问卷调查等手段收集数据,统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与此同时,建立公共服务价值评估结果数据库和公共服务价值供需匹配指数,利用数字技术分析预测功能,结合专家分析意见,开展价值实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诊断,及时向价值识别、价值执行的相关方进行反馈。据此,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生产供给模式,尤其是财政资金分配方式,推动公共服务价值共创不断提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承诺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监管质量影响因素及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CZZ01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市场进入类跨部门审批事项‘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测评与政策完善研究”(项目编号:119NDJC289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22.
- [2]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 人民日报, 2014-01-01(002).
- [3]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1-4.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004).
- [5] 习近平.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N]. 人民日报, 2017-12-10(001).
- [6] 王学军. 价值共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新趋势[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0(1): 23-32.
- [7] 王咏, 胡广伟. 服务主导逻辑下的电子政务服务——概念模型、关键要素及特征分析[J]. 现代情报, 2018(5): 17-24.
- [8] 定明捷, 曾祯.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价值共创:一个分析框架[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1(6): 124-138.
- [9] 张毅, 贺欣萌. 数字赋能可以纾解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吗? ——资源视角的社区公共服务价值共创案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11): 131-137.
- [10] 单菲菲, 高敏娟. 价值共创视角下城市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逻辑——基于两个街道的双案例分析[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1(4): 72-84, 126.
- [11] 宋世明.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发展趋势[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1): 120-126, 151-152.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142.
- [13] 王学军, 张弘. 公共价值的研究路径与前沿问题[J]. 公共管理学报, 2013(2): 126-136, 144.
- [14] Moore, M. H.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4-36.
- [15] Moore, M. H. *Recognizing public value*[M].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
- [16] Fukumoto, E., & Bozeman, B. *Public values theory: What is missing?* [J].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9, 49(6): 635-648.
- [17] Bruijn, H. D., & Dicke, W. *Strategies for safeguarding public values in liberalized utility sector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 84(3): 717-735.
- [18] Bozeman, B. & Crow, M. *Public values leadership: Striving to achieve democratic ideal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1: 29-30.
- [19] 张绪娥, 温锋华, 唐正霞. 由合作生产到价值共创的社区更新何以可行? ——以北京“劲松模式”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1): 144-156, 175-176.
- [20] 董礼胜. 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评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与整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252.
- [21] 祁志伟, 桑川.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J]. 电子政务, 2023(06): 113-124.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学丽

以“数字救助”改革构建地方社会救助新格局

冯永生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深化社会救助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统筹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使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社会救助数字化改革,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数字重庆建设战略背景下,深刻认识社会救助工作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全面总结“数字救助”改革实践经验,对深化推动社会救助各项工作体系重构、业务流程再造、体制机制重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重庆市“数字救助”改革现状

(一)基本生活救助数字化改革基本实现全覆盖

2023年以来,按照数字重庆建设和主题教育工作要求,重庆市民政局通过广泛调研和前期试点,迅速部署在全市推广“重庆救助通”应用工作任务,切实打通困难群众快捷高效获得救助的堵点,实现救助事项“掌上办”“指尖办”。“重庆救助通”应用作为“社会救助一件事一次办”的重要载体、“渝悦救助”应用的发展基础。一方面,深入凝聚基层数字化发展共识;另一方面,广泛吸纳基层意见建议不断完善系统应用,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困难群众的一致好评。据统计,“重庆救助通”上线以来,累计收到在线救助申请12.7万人次,签署核对授权书15.3万人次,待遇资格认证67.6万人次,已对符合条件的3.1万人给予保障,2.7万人正在救助办理中。通过“重庆救助通”应用的信息积累,将在册和暂不符合条件的共计115.6万人次纳入持续监测信息库进行动态监测;通过构建10余个模型对持续监测对象进行动态预警,初步实现了数字化主动发现及在册对象的有效管理。

(二)专项社会救助数字化改革情况

教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城乡建设委、医保局、司法局五部门分别负责的教育救助、就业救助、住房救助、医疗救助、司法救助等专项社会救助大都采用传统线下救助模式,数字化程度较低。

(三)急难社会救助数字化改革情况

应急救援部门负责的急难社会救助也大部分停留在传统线下救助层面,数字化程度较低。

(四)慈善社会救助数字化改革情况

以慈善会和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社会救助基本上停留在手工操作层面上,数字化程度普遍偏低。

二、重庆市“数字救助”改革面临的“三大困境”

(一)救助体系有待完善

一是社会救助缺乏统一管理机制,无法协调解决“多跨救助”难题,客观存在“九龙治水”现象。二是社会救助工作网络不健全。市、区县、街(镇)、村(社区)四级救助网络体系缺乏有效联动,还未完全展现整体性力量。

(二)救助信息尚需畅通

一是救助部门的信息不畅通。现行社会救助工作缺乏数字救助平台支撑,各救助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处(科)室之间信息不共享,数据信息壁垒没有彻底消除,客观导致求助群众反复跑路多头跑路的现象发生。

二是救助政策信息传播不畅通。救助政策公开透明度低,使群众质疑救助的公平性,认为救助存在优

亲厚友和暗箱操作现象,导致与此相关的信访事件时有发生。

(三)救助合力亟须聚焦

一是因救助资源分散,难以统筹形成救助合力导致无法主动发现困难群众求助信息,无法实施精准救助,同时转办协办迟缓、救助效率低下、重复救助、多头救助、碎片化救助等现象仍然存在。

二是社会力量参与救助还不足。在实践中,慈善救助面临着“慈善蛋糕”不够大的问题,慈善组织的数量、慈善捐赠总量有待提升。社工、志愿服务组织参与救助虽然成效显著,但参与渠道不畅通限制了作用发挥。

三、綦江区“数字救助”改革探索实践

重庆市綦江区以推进“数字救助”改革为抓手,建立“三破三立”体制机制,初步构建起信息聚合、资源统筹、高效便捷、公开透明的社会救助新格局。

(一)破解体系不健全“难点”,建立“数字救助”多级融合新模式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为健全救助体系提供组织保障。成立以区长任组长、分管副区长任第一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推进专班,区民政局牵头协调推进“数字救助”改革具体工作,增强“大救助”领导力和执行力。

二是强化部门联动为健全救助体系整合资源。依托“重庆救助通”应用,将救助事项向移动端延伸,实现“掌上办”“指尖办”,调动激发全区有救助职能和惠民补贴的13个单位主动作为,进一步厘清救助事项、整合救助资源,建成低收入人口信息库,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动态监测机制。

三是强化网络体系为健全救助体系提供基础支撑。建立区级救助服务中心1个、镇(街道)救助服务站21个、村(社区)救助服务驿站381个,形成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三级救助服务体系。

(二)破解信息不畅通“堵点”,建立“数字救助”多跨协同新格局

一是依托“重庆救助通”提升困难群众申报社会救助便捷度。推动“重庆救助通”应用在綦江上线,困难群众可通过智能手机进行低保、特困、住房等社会救助的线上申办。目前,通过“重庆救助通”提交各类社会救助4640人,已纳入救助1582人,签署核对授权书4518人次。

二是依托“重庆救助通”提高办理社会救助效率。通过利用“重庆救助通”大数据平台,救助待遇资格认证、核对电子授权、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比对、办理进度查询、申请救助公示、社会救助证明、超标提醒、资料收集等功能基本实现了社会救助线上全程办理和系统自动完成。

三是依托“重庆救助通”推动部门协同开展社会救助工作。“重庆救助通”对接了市级社会救助综合信息平台 and 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业务系统,链接住房、慈善等救助力量,优化救助功能模块,将各级、各方、各类困难群众信息融汇到一处,各部门信息共享、数据互认,业务申请数据、过程办理数据、结果处理数据跨层级跨平台流转。目前已开发住房线上救助,办理救助43户。通过“重庆救助通”对困难群众电费、垃圾处理费、有线电视费线上减免信息采集2.6万人。

(三)破解合力不聚焦“痛点”,建立“数字救助”多元帮扶新路径

一是为职能部门开展救助提供数据参考。借助“重庆救助通”,创新探索建立多维度贫困识别指标体系,从健康、教育、就业产业、家庭结构、生活形态5个纬度12个指标立体综合评估,精准勾勒困难家庭画像,形成多维困难需求数据库,建立分层分类救助体系,智能推送职能部门帮扶。

二是为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提供平台支撑。发挥綦江慈善优势,以“99公益日”为抓手,建立助学、助残、助医、助老、扶幼、济困等慈善项目,吸引鼓励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参与,发动引导社工、社会志愿者参加救助服务,实现慈善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效衔接。截至目前,綦江区鼓励引导4家社会组织、120余名社工、200名志愿者,关爱帮扶困难群众13.5万人次。

三是发挥“5+3+N”队伍合力推动社会救助主动发现。充分发挥社区、社工机构(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五社”力量,充分发挥热心社会救助公益事业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三员”作用,充分发挥区教委(学校)、区司法局、区乡村振兴局、区人力社保局等区级重点救助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

的“N个”合力,第一时间帮助指导群众线上办理和收集相关资料,实现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让困难群众享受“零距离”服务。目前已实施主动上门服务2500余例。

四、重庆市“数字救助”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高位推动“数字救助”改革

一是强化“数字救助”机制建设。将“数字救助”纳入市委改革办“数字重庆建设”“愉悦救助”“一本账”统一管理,整合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慈善社会救助等所有救助资源,真正实现“跨协同,一窗通办”。

二是强化部门联动。健全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部门间分办、转接程序,加强部门间工作协调对接,推动“重庆救助通”“愉悦救助”等信息平台的数据实时更新,促进各项救助政策的无缝衔接,力求加强动态信息汇总研判、部门联动综合救助,推动数字救助落到实处。

三是强化网络体系。健全市、区(县)、镇(街)、村(社区)四级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健全全市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协调推进社会救助部门信息资源共享。完善区(县)社会救助服务中心,汇聚全区(县)救助资源和困难群众数据。全力推进镇(街)社会救助工作站建设,提供专业化“数字救助”服务。探索建立村(社区)社会救助服务站,主动发现困难群众,扩大“数字救助”服务覆盖面。

(二)全面打通各类数据壁垒

着眼“惠民有感”,利用大数据实现信息共享、跨部门合作,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落实。

一是实行“一窗办”。探索依托“重庆救助通”为所有救助申请端口,民政局系统将低保、特困、残疾人两项补贴、高龄失能补贴、慈善等纳入“重庆救助通”申办或“免申即享”。整合住房、教育、医保、就业、司法等其他专项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以及慈善社会救助到“重庆救助通”应用实施,阳光透明,实现一门受理。

二是推广“指尖办”。人人都是救助员,群众足不出户即可通过“重庆救助通”,线上申请救助、授权核查、了解政策、查询结果,实现高效便捷,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三是深化“协同办”。通过“重庆救助通”受理救助申请,救助综合业务系统推送办理,强化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实现主动发现、分层分类综合救助,形成跨部门、多层次、可共享的协同救助格局,使困难群众一次都不跑,多重救助一次享。

(三)持续提升多元救助合力

整合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以及应急救助、社会慈善救助资源,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综合效率。

一是畅通数据共享渠道引导社会慈善参与。开设慈善救助模板,联合救助综合信息平台,形成“政府+社会慈善”救助链,推送基本救助之外特殊困难家庭救助需求,发挥慈善补充作用,以项目帮扶为突破口,多方链接资源,激发社会参与。

二是打造多元合作机制凝聚综合帮扶合力。充分发挥“五社联动”机制作用,打造“慈善+社工+志愿者”救助综合体,开通社会组织帮扶模块,汇聚帮扶多方力量,开展困难群众结对帮扶、探视走访、精神慰藉、实物救助等救助服务,多项叠加让困难救助帮扶最大化,切实增强救助帮扶合力。

三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推进多样化救助帮扶服务。根据困难帮扶类型,建立从单一基本生活保障到心理、精神、能力建设、社会融入等多层次多样性服务。线上搭建服务监管信息平台,细化服务标准类别,从项目申请到上门服务到项目结案全流程监管。线下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为分散特困老人、低保家庭、留守儿童、困难学生等特殊困难群体开展生活照料、送医陪护、心理慰藉、升学就业、资源链接等分类差异性服务。

作者:重庆市綦江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编辑:刘小侨

社会工作介入信访工作的路径探索

李云波 周 灵

社会工作是为解决个体、家庭、群体、社区和组织在与环境互动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而开展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服务。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权利维护和矛盾化解的角度看,社会工作与信访工作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和功能上的亲和性,对于帮助信访人解决问题、提高信访人自身解决问题或摆脱困境的能力、优化信访工作品质、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预防性措施具有重要作用。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工作条例》提出,要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推动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

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推进社会工作介入信访工作,可在三个层面发挥作用:在微观层面,帮助信访人解决问题,同时提高信访人自身解决问题或摆脱困境的能力;在中观层面,完善信访工作机制、流程和方法,以专业价值提升信访工作品质;在宏观层面,研究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预防性措施,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信访形式可以概括为来电、来信、来访三种,无论介入何种形式的信访,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都应该抓住过程介入,同时向两端延伸,抓好前期介入和后续介入。

一、夯实过程介入

过程介入是指在信访工作中,从信访的开始到结束,社工要全程介入。在这一过程中,社工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 柔性对待信访人

信访人在反映诉求的同时,往往会用声音和情绪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不安,社工在与信访人接触时,应保持空杯心态,充分运用尊重、接纳、同理等服务技巧,积极聆听,保持适当的沉默,耐心给对方“一杯水”的时间,让其将不满的情绪发泄、释放出来,之后再寻找对话的切入点。同时,社工在接待信访人时应主动换位思考,站在当事人角度去分析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取得他们的信任与理解,便于进行接下来的工作。

(二) 帮助信访人梳理分析诉求

信访人在多方奔走时常常会被引至“云里雾里”,到信访时往往已搞不清其原本诉求,此时社工应与信访人一起梳理分析。以来访为例,针对个体信访人,社工应倾听并引导信访人诉说事情的来龙去脉,通过同理、澄清等技巧疏导情绪,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处理信访人提出的信访诉求;针对集体信访,特别是面对矛盾激化的场面时,社工应以第三方身份出现,及时运用危机介入和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缓解信访人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张力,做好情绪安抚工作,协助信访人推选代表反映问题,促进矛盾化解。在梳理分析诉求过程中,社工应认真记录诉求内容,全面分析信访人的需求和动机,注意观察现场形势,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三)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诉求回应

社工应充分掌握相关政策知识,协助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给予信访人解答和回应,能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解决的尽快落实解决,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按照现行政策不能解决的诉求和问题,要向信访人作出解释,争取他们的理解,或寻求其他途径给予信访人支持和帮助,尽量缓和矛盾。对于超出权益范围的无理诉求,应给予专业指导,引导其就自身权益依法参与信访工作。对于确属无理诉求的缠访和闹访,社工应在耐心疏导教育的基础上协助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做好劝返工作。

二、积极前期介入

前期介入是在民众在信访之前和信访人再次信访之前展开介入。尤其是面对存在重访、缠访、闹访情形的信访人时,信访社工应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充分整合资源,争取社区工作者、社区社工和社区志愿者的配合,共同做好以下工作。

(一) 主动接触, 获得信访人的信任

社工在正式接触信访人之前, 应尽可能搜集信访人个人和家庭情况、目前和先前的困难、个人的能力与优势、身体状况、情感状况、认知状况、经济状况、社会支持网络状况等, 形成对信访人的预估。在此基础上, 社工应不厌其烦地进入信访人家庭及其经常出入的场所, 因人而异采用适宜的方法逐步取得信访人的信任。有的可以通过熟人或者社区工作者介绍, 有的可以先为信访人提供社区服务再慢慢熟悉, 有的可以在前期预估的基础上通过解决燃眉之急获得信任, 有的可以在领导下访时及时对接跟进。不论采用哪种方式, 真诚服务的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必不可少。

(二) 面对面交流, 释放信访人的负面情绪

信访人经历了信访挫折后, 内心压抑了不少的愤懑和不满, 外界的不理解也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时候他们需要找人倾诉, 即使不能解决问题, 也是一种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的释放。不管信访人的诉求是否合理, 社工对他们首先要做到理解和接纳, 聆听他们的信访历程, 帮助其释放内心的负面情绪, 待其心平气和之时, 再引导他们理性地看待整个信访过程, 思考其中个人的得失, 调整心态后重新设计维权的方式, 改变窘迫的境况。

(三) 联系社区, 帮助信访人回归社会

因社会对信访人的“标签化”“污名化”或信访人自卑等原因, 信访人会主动或被动与外界隔绝, 或独来独往不与人交往, 或退回自己的家庭, 或有和相同遭遇的人走到一起寻找安全感。前两类信访人在不能够获得外界支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会选择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 第三种情况则会形成政府部门最头疼的集访。为避免或改善上述情况, 社工要帮助信访人重新建立与社区的联系, 鼓励或邀请他们参加各类社会活动, 从社会活动中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逐步改善信访人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状况, 恢复和增强个人或家庭的社会功能, 使其回归正常的社会角色和生活。

(四) 挖掘潜能, 增强信访人自助能力

实际工作中发现, 有一部分信访人确属遭遇不能解决的突发事件, 由于个人力量单薄、支持网络单一, 怀着对政府的信任而走上信访之路。对于他们, 社工应帮助其认识、挖掘未开发的潜能, 动员信访人一起参与改善面临的困境, 增强其自助能力, 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

三、完善后续介入

信访工作结束仅仅是政府部门针对信访人开展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行政程序的完成, 很多只是解决了信访人的一时之急、眼下所需, 无暇顾及信访人以后的生活, 可能为重访埋下隐患。因此, 在信访工作中, 不仅要注重当时对信访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处理, 也要关注问题解决后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对此, 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出发, 一般应运用跟踪服务技巧, 对每个信访个案进行登记, 定期回访, 加强落实信访承诺, 巩固问题解决成效, 降低重访率。同时, 要加强信访档案资料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便于随时查询以及开展精细化管理和阶段性分析, 助力提高信访工作水平。

从全国来看, 各地在信访社会工作领域做出了一些探索, 可以概括为岗位购买、项目购买和社工专业理念介入三种方式。不论哪种方式, 社工应坚持正确政治立场, 尤其是信访人和政府部门发生矛盾冲突时, 社工既可以帮助信访人维护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公正; 又可以代表政府部门对民众的信访行为进行调解, 从而缓解信访人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张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信访工作是基层治理的“压舱石”。做好信访工作, 一要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 变被动接访为主动解难, 推动信访工作从单向信息传递转变为干群之间有来有往、双向互动, 通过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解决群众复杂问题中的主力军作用, 切实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二要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 加大对信访社会工作的支持力度, 建立信访社会工作服务网络, 既须加强横向沟通, 以便解决复杂的、涉及多部门的信访矛盾; 又须加强纵向联系, 动员各级信访社工和志愿者, 做好前期介入和后续介入, 提升信访工作水平。

作者单位: 李云波, 重庆市民政局

周 灵, 重庆市民政中西医结合医院

责任编辑: 张 波

促进重庆市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前沿展望

谭江蓉 向艳妮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时期托育服务提出了新要求。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明确了17个部门将共同保障推动托育行业发展，要求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以及提升托育服务质量。重庆市也在国家托育服务体系顶层设计和基本框架基础之上积极探索，于2019年和2022年先后制定了《重庆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重庆市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实施方案》《重庆市贯彻〈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意见和方案。此外，2023年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推进以区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且支持托幼一体化，要求每个区县建成1个承担指导功能的示范性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或综合性托育服务中心，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2023年10月，重庆市政府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重庆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为进一步了解新时期重庆市托育服务发展情况，重庆工商大学课题组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了调研，探析重庆市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重庆市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一、重庆市托育服务基本现状分析

（一）托育服务供需结构失衡，婴幼儿入托率仅为3.1%

托育服务机构呈现出“民办兴、公办弱、单位办滞后”的局面，供需结构存在失衡现象。据重庆市卫健委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末，重庆市3岁以下婴幼儿常住人口80.46万人，其中位于1~2岁入托关键期的婴幼儿约50万人。截至2022年6月，正式入托的婴幼儿一共24931人，仅占全市3岁以下婴幼儿总人口的3.1%，较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21年全国婴幼儿入托水平（5.5%）低2.4%，低入托率表明绝大部分家庭存在托育需求。此外，同一时期重庆市民办托育机构一共1134家，公办托育机构87家，单位办托育机构仅有9家，分别占托育机构总数的92.20%、7.07%和0.73%，其中民办营利性托育机构共512家，占到了民办机构总数的45.15%。以上数据说明重庆市托育服务以社会办机构为主力，其大多数由市场主导实行非普惠性服务，因此入托率仅3.1%的现实局面表明婴幼儿家长对普惠托育服务的需求更大。

（二）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现有机构托位闲置率高

表1展示了重庆市不同类型托育机构的机构数量、总托位数、实际收托婴幼儿数和收托率（本文收托率为托育机构正式入托的婴幼儿占该机构总托位数的比例，计算公式为：该机构婴幼儿入托人数/该机构总托位数*100%）等数据信息。截至2022年6月，重庆市收托机构一共1230家，其中，重庆市在国家普惠托育服务行动项目中的托育机构、托幼一体化园所、其他民办机构和单位办托育机构分别为47家、783家、391家和9家，各自占总收托机构的3.82%、63.66%、31.79%和0.73%。60%以上的托育机构为托幼一体化园所，普惠托育机构和单位办托育机构的总和还不到总机构数的5%。托幼一体化园所作为重庆市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主力军，目前具备26865个婴幼儿托位。从实际入托人数占托位数的比重来看，重庆市各种类型机构总托位数54869个，24931名实际收托人数仅占总托位数的45.44%，即一半以上的托位处于闲置状态。即便是收托率最高（48.04%）的托幼一体化园所，也避免不了大量托位闲置的现状。

表 1 重庆市托育服务机构婴幼儿入托情况表(截至 2022 年 6 月)

机构类型	机构数量	百分比(%)	托位数(个)	实际入托(人)	收托率(%)
普惠托育机构	47	3.82	4675	1910	40.86
托幼一体化园所	783	63.66	26865	12907	48.04
单位办托育机构	9	0.73	23329	10114	43.35
其他民办机构	391	31.79			
总计	1230	100	54869	24931	45.44

资料来源: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部门职能分工逐渐明确,但托育服务体系尚未健全

近年来,重庆市托育行业发展规范性和系统性显著提高。重庆市将托育服务体系纳入市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托育服务纳入市政府 2022 年 15 件重点民生实事清单,由卫健委牵头强化部门联动,联合 15 个部门印发部门职责分工方案,建立部门会商机制、信息推送机制,各区县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部门综合监管机制。总体上托育行业发展规范性和系统性显著提高,但托育服务相关体系尚未健全。

首先,托育机构标准体系方面,重庆市目前未出台和建立本土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托育机构管理、托育机构质量评估体系和托育信息服务管理系统相关规范性文件,目前仍以国家标准为主。其次,托育服务监管体系方面,重庆市卫健委作为牵头部门暂时承担托育服务的管理工作,但仅有 5 名编制人员负责相关工作且需同时承担其他事务,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均没有设立专门的托育日常管理机构。最后,托育服务保障体系方面,截至 2022 年 6 月,市级层面暂时未将托育服务列入政府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未提供托育机构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和职业培训计划补贴。

据此,重庆市托育服务实施路径较为具体,各部门职能分工也逐渐明确,但离国务院办公厅“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目标要求还有距离。

二、重庆市托育服务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托育服务机构建设资金紧张

针对重庆市“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每千人 4.5 个托位目标任务,重庆市卫健委制定了“3 步走”战略:2022 年增加托位 1 万个,2023 年增加托位 2.3 万个,最后两年分别增加托位 3.2 万个,在 2025 年达成总计 15 万个托位数的建设目标。但完成目标任务的难度比较大,其困难主要体现在托育服务机构建设资金紧张。

首先,目前的优惠政策与托育服务发展并未匹配,中央于 2022 年停止托育服务普惠发展机构对社会办机构的资助金,托育服务机构的财政补贴呈收缩状态。其次,政府在对托育服务经费投入方面的主导责任发挥不足,市卫健委在托育工作中的部分经费仍来自卫生系统的业务经费。最后,税收优惠、托位补贴、房租减免等优惠政策落地范围十分有限,且大多是鼓励性而非强制性,能否落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和市场活力,而经过近几年时间的防疫抗疫,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市场活力均受到一定影响,大部分托育机构建设依靠自筹资金和企业融资,托育机构出现运转困难,普惠托育发展徘徊停滞。因此,在普惠性政策未落实、入托率不理想、财政能力不足的现实下,全市仍在继续按“十四五”规划增建托位,谁来建、如何建、建设资金从何而来等问题接踵而至。

(二)现有托育服务机构供给与家庭需求错位

重庆市托育服务供给与家长入托需求未达到稳定匹配状态,以母职照料和隔代照料为主的照料仍是更多家庭的首选,托育服务机构一半以上的托位数面临闲置,家庭“入托难”和机构“收托难”并存。一方

面,托育机构运营成本高、风险大,缺少政策支持、经费支持和项目支持的托育服务很难达到普惠条件,“入园/托贵”成为制约3岁以下婴幼儿正式入托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未考虑到家长入托需求的多元化,仅从机构设置与管理、卫生与安全等“硬件”进行相关规定,忽略了服务内容区别化设置这一“软件”标准,且保教内容设置上缺乏本土性考量,难以赢得家长信赖。

(三) 托育机构监管机制建设滞后

虽然2021年重庆市筛选了20家(首批)托育服务示范机构候选单位,以积极发挥其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但是目前重庆市托育机构的监管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工作执行仍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市进行合规备案的托育机构数量为246家,仅占全部托育机构数量的20%,加大了系统和规范监管的难度。同时,由于备案标准较高,如果严格按照备案标准来看,重庆市超过五分之四的托育机构资质标准未达标,即规范化发展的确保性相对较低。而未备案的托育机构难以享受到优惠政策,也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服务发展能力。再者,由于缺乏权威的质量评估标准、专业的评估机构和稳定的监管团队,很多不具备托育资质的民营企业开始运营托育服务,而卫健委作为监管部门虽有监督权,但对不合格机构缺少处置权限,托育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遭到挑战。

三、重庆市高质量发展托育服务的前沿展望

托育服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围绕“基本、普惠、投资、收费、减负”五个关键词下功夫^[1]。目前,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实施了城企联动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累计已争取中央预算资金5099万元,支持新增建设普惠性托位5099个,托育服务的普惠性发展初见成效,但仍需进一步精准施策和协同推进托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 打通政策壁垒,实行“专项资金”方案

“普惠”的背后,离不开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在中央全面部署和领导下,市政府应加大力度落实托育服务的优惠政策,结合重庆实际情况对托育服务制定具体可行的财政计划,建立专项资金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为托育机构发展赋能。

其次,重庆目前只依靠财政补贴还无法建立普惠托育机构,政府应当合理确定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和市场化托育服务机构比例,打通卫健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政策壁垒,切实申请并建立专项资金库,将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事业经费的一部分共同作为托育服务经费,借用社会力量提供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的托育服务,同时建立规范化的托育收费指导标准,缓解家庭“入托难”和机构“收托难”的窘况。

最后,继续完善现行机构准入标准、行业监督和奖惩机制,公平公正公开落实相关执行,保证托育机构享受应有的福利和权利,成立专门的托育服务日常管理部门和托育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因地制宜开展适合重庆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生产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托育发展工作。

(二) 推动托育服务供需双方的高效匹配

首先,将托育补贴对象从供方转换到需方,统筹调配财政经费。2023年8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2],明确自2023年1月1日起,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2022年规定的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在此政策基础上,合理计算人口变动情况,动态跟进人均托育经费的投入,对正式托育的家庭进行直接补贴,提升家庭对托育的消费意识和支付能力。此外,政府应联合保险公司采用“补助+个人”承担的方式设立托育意外伤害险,减轻托育机构风险,保障婴幼儿的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

其次,建立规范化的托育收费指导标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精准把握3岁以下婴幼儿不同年龄的需求差异,动态计算需求总量和托育时长,破解供需错位难题以推动供需的高效匹配,激发托育市场发展活力。1~2岁婴幼儿是正式入托的主力军,优先解决1~2岁婴幼儿的托育问题是短期内提高托育服务能力最经济、最直接的方法。加上当前双职工家庭、多孩家庭的增加以及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可以考虑在现有托育

类型上增加周末、节假日托育服务,托育时长根据家长不同托育需求和现有资源科学设置“延时服务”并制定分级分类服务标准。

最后,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及行业人士定期开展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从规范、创新、发展、共赢等角度共同探讨普惠托育服务未来发展新模式。政府应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两办意见作出面向重庆市的“产教融合”新措施,以政策为指引,集合政府、行业、学校、企业、科研单位等多方资源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之路,鼓励并支持本专科院校和优秀早教机构积极融入、充分介入产教融合项目,探索校地、校企、校校合作新模式,为其发展赋智赋能。充分响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托育服务全面合作和资源共享,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托育服务发展联盟,搭建两地政府、教委共同指导,以院校、机构、企业为主体,集“政产学研资”为一体的托育服务创新协同发展平台。

(三) 严格制定监管机制,筑牢行业准入关口

首先,实行托育服务透明化,鼓励政府、社会、行业及家庭多方位共同监督。在《重庆日报》《今日头条》《三峡都市报》等市级主流媒体刊发关于托育机构成立、备案、评选的文章,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媒介以直播、录播方式开展合理范围内的婴幼儿照护实录,引导社会了解托育服务的备案细则、工作重点和方向,并积极鼓励社会办机构参与示范托育机构的评选,以强机制、严监管、提效能高质量推动托育服务的健康发展。

其次,成立托育服务指导中心,把控人员管理资质。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万州区卫健委、妇幼保健院联合共建托育综合服务指导中心,助推万州区获批为全国首批19个托育服务示范城市之一。政府需制定并颁发托育从业人员持证上岗专项行动,批准各区妇幼保健院成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对备案机构负责人、保育员等专业性岗位进行规培,提高托育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平,并印发通知明确要求加强托育机构监管服务工作形成常态化机制。包括全职妈妈(爸爸)和低龄老人群体,政府和社会对该群体参与规培并取得资质证件应给予鼓励和支持,大力发展婴幼儿托育服务,在人才培养、家庭科学育儿等方面持续发力。

最后,净化托育市场环境,为托育行业准入提标扩面。建立专门的托育机构质量评估体系,成立托育服务质量监督小组和执行小组,严格查处关闭资质不足、具有质量问题的托育点,有效设置民众对托育机构的意见或投诉箱并及时给予回应,打压部分私企“钻空子”行为。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制定规章制度明确要求具有收托业务的机构和企业限期完成备案,对不达标或资质不全的机构或企业进行限期整改,避免重数量而轻质量的托育发展趋势。此外,各区县应坚持规划引领,将发展托育服务分别纳入区县级考核指标体系、区县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和区县长专题会议重大事项,采取多措并举的方式促进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及社会支持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9BRK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傅苏颖. 国家卫健委:围绕五个关键词发展托育服务[N]. 中国证券报,2022-08-18(A05).
[2]国务院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26):20.

作者:谭江蓉,重庆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向艳妮,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小侨

养老风险精准识别的问题与化解

舒梅李颖

步入新时代,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化。老龄社会的新格局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我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处于老龄社会^[1],人口老龄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步同频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2]。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3]。重庆作为全国老龄化率较高的省市之一,关注养老事业、加强老龄工作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中的一项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重要战略任务。能否精准识别养老风险,关系到能否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内的各类风险,也关系到能否构建良好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良性、健康运行。

一、养老风险精准识别的重要性

(一) 养老风险关系社会安全稳定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因都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由数量压力向结构性挑战转变^[4]。2019年,重庆市0~14岁少儿人口为520.1万,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525.89万,老年人口超过少儿人口,老少比迎来历史性拐点。截至2021年末,重庆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491.18万,占15.29%;65岁及以上人口达570.21万,占17.75%^[5],居全国第二位、西部地区第一位。这些人口结构指标预示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內部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新动向^[6]。老龄问题正由个体问题向群体问题转变,由隐性问题向显性问题转变,由相对单一的社会领域问题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问题转变。养老已经成为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积极应对养老风险能夯实社会基础、维系社会安全,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保障民生的根本和维护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前提。

(二) 识别精准性关系预防有效性

精准识别风险是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对类型、成因、影响因素等识别不清的问题,为避免风险进一步叠加累积,通过科学的方法,将关键的风险要素识别出来。精准识别风险能降低风险发生概率、降低风险造成危害的可能性、规避风险给经济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养老一般包含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部分。这也是赡养法明确规定的有赡养义务的人必须应尽的义务与责任^[7]。精准识别意味着准确地辨识和评估养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帮助决策者和养老服务提供者更好地观测到某些重要的风险因素,了解养老过程中的风险特点、风险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差异。基于精准识别的风险预防措施可以更具针对性,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更加有效地降低养老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二、养老风险精准识别的制约因素

(一) 信息收集平台建设薄弱

精准识别养老风险,需要大量信息数据作为支撑,信息收集充分与否是精准识别养老风险的前提。从各地社会信息平台现状来看:

一是信息平台建设缺乏维护。实际工作中,“僵尸网”现象时有发生,仅靠每年发布的统计年鉴是不够的。各大企业、机构、社区等如不能自行监测和更新相关数据指标,则难以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支持作用,无法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风险。

二是信息处理手段不完善。精准识别养老风险需要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 and 挖掘,以发现潜在风险。一方面,人工处理信息能力有限,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并容易忽略潜在隐患。另一方面,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部分机构仍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在信息处理上的优势。信息处理手段的不完善将导致数据分析能力不足,无法充分挖掘有价值的信息。

三是信息缺乏整合与共享。养老风险的识别需要多来源的信息,涉及卫健委、民政局、发改委等多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分局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的相互独立,数据来源分散且未有效整合,难以获得全面、综合的信息,影响了养老风险的全面评估。

(二) 风险隐蔽性高难以发现

养老风险大多蕴于社会运行之中,与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在一起,其发生难以预测、不易察觉,影响和制约了风险的精准识别。

一是风险指标难定位。通过梳理常用的风险识别方法(表1)可发现,当前风险识别工作应建立风险评估模型,以指标来量化风险程度。以事故树法为例,如果逻辑推理存在偏差,可能导致建立的风险评估模型不准确,无法真实反映风险情况。目前的风险识别指标体系还有待完善。

表1 风险识别方法^[8]

风险识别方法	具体内容
1. 事故树法	通常是当风险已知时,以一个特定事故为起点,通过逻辑推理,找到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并通过事件符号和逻辑来描述可能事件,目前运用得最为广泛
2. 流程图法	根据生产运作过程、活动内在逻辑关系,绘制出风险分析流程图,并针对风险的重点环节进行识别和调查
3. 德尔菲预测法	根据指定程序,对某一具体风险向相关专家进行反复咨询,经过统计处理后,得出预测结果
4. 现场调查法	进行全面、彻底的风险调查,包括前期准备、实地调查和访问、调查结果和反馈,并提供调查报告书
5. 经验反馈法	根据“在岗人员对自己所处岗位的风险最了解”的假定,采用一套科学的奖励和惩罚机制,激励员工主动提出日常工作的事件
6. 风险损失清单法	列举出可能面临的所有风险源,参照这个清单表,逐一检查、核对,预见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

二是风险的发生与发展难预判。养老风险受多种因素交织影响,包括经济状况、政策环境、医疗保健等。这些领域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再加上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得养老风险的预判变得复杂。此外,养老是一个长期过程,风险的出现通常需要考虑时间跨度和动态变化,在当前时点上预判风险的未来发展是困难的。

(三) 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不足

信息要实现互联互通,并为风险精准识别提供必要支撑,关键之一就在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由于养老风险的高度复杂性,在现代社会中,依靠传统采集方法已无法满足对风险精准识别的需求,信息收集和分析需要采用大量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而重庆市现有养老服务机构、社区等虽然利用了科技化手

段,但一些部门对科技手段缺乏日常维护,技术未适时更新,影响了精准度和可靠性,无法充分预警养老风险。此外,养老风险识别涉及大量私人 and 敏感信息,目前有效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措施相对欠缺,可能导致数据泄露、滥用,从而影响养老风险识别的可信度和可接受性。

(四)问题觉察反馈渠道不畅

养老风险的精准识别还有赖于问题的及时觉察,这需要畅通反馈渠道与反馈机制,使风险信息能及时传递给相关部门,进行风险的综合研判与协同处理,从而达成问题共识,开展风险动态预警、风险及早防范、及时化解等工作。分析当前重庆养老风险问题反馈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点。

一是问题在同一系统内的纵向反馈不畅。目前,我国大部分行政机构都采取分级管理,其问题的收集、处理等工作均需沿着既定路径传递,并按照层级授权和审批。这种模式影响了问题反馈的速度和效果,使有关部门无法及时、精准地进行风险识别,导致反应不及时,错过响应的最佳时机,增加风险外溢风险。

二是问题在不同系统间横向反馈不畅。各主体间权责关系不明,难以整合资源,无法形成有效治理合力。养老问题涉及各个领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加强部门间合作。各系统间的闭环运行使得问题交流与反馈受阻,影响了风险的综合考量和精准识别。

三是问题的社会反馈渠道不畅。由于风险动态追踪的机制和技术尚不完善,有关部门对问题的觉察通常具有一定滞后性。社会公众作为最贴近社会生活的主体,对某些细微问题的觉察会先于相关部门。但当前社会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即发现问题后公众不知道该如何、向谁、去哪反映,以致影响风险精准识别的工作效率。

三、做好养老风险精准识别的建议

(一)强化信息平台资源建设

在养老风险精准识别的工作中,信息平台资源的建设必须根据现实情况不断加强和优化。

一是多维度充实信息。根据各类风险属性,确定不同信息需求,在工作中有目的、有重点地收集,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损耗和信息浪费。在此基础上,应拓宽信息收集渠道,多维度采集信息。如社区加强与老年人的沟通,了解他们在养老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加强养老风险识别信息的针对性。还可以向重庆市应急管理专家或民政局相关领域专家学习,了解前沿的养老风险内容,获取更多指导。此外,还应加强对社交媒体的关注,多视角获取信息,以及时发现和控制风险。

二是提升数据处理水平。建设信息平台资源,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须将先进技术与平台相结合。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和预处理,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以提高后续分析的可靠性。此外,应根据不同养老风险信息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运用恰当的算法和模型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还应利用可视化技术,将处理后的数据以图表、图像等形式展示,更直观地呈现养老风险信息的趋势和规律。

三是促进信息共享互通。养老风险的精准识别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割裂状态下的风险识别是片面的。依托数字重庆建设,开发养老服务大数据中心,整合各类养老风险信息资源;强化大数据研究和应用开发,为政府政策制定执行、资源优化配置、在线监督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还应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格式,确保不同数据源信息的可操作性。

四是加强平台维护。确保平台的数据和内容得以及时维护,定期进行数据更新。同时,及时修复平台的技术问题和漏洞,确保平台运行的安全性。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加强平台的安全保障,包括数据加密、身份验证、访问权限管理等,确保养老风险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不断升级迭代平台的技术手段和功能,提升平台的用户体验和数据处理能力,提供更智能化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二)完善问题觉察反馈机制

开展养老风险精准识别工作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建立良好问题觉察反馈机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早发现、早研判、早引导、早消除。

一是加强“条块”统筹。设立多个层级的养老风险问题觉察反馈机制,包括基层反馈、部门协调和高层决策层面,建立起跨部门、跨机构的信息共享平台,以促进养老风险问题的沟通和交流。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如联席会议、专题研讨会、工作座谈等,让相关部门、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能够及时交流和反馈意见。此外,应当设立问题解决工作小组或专职机构,负责收集、分析和解决养老风险问题,并建立及时响应机制,制定明确的问题解决时限和责任追究原则,对问题及时处理,确保有效解决。

二是加强公共平台建设。建立专门的养老风险问题觉察反馈的综合性公共平台,提供多种功能和服务。在平台定期发布养老风险问题的相关信息,提供养老知识普及和教育,帮助公众增加对养老风险问题的认知和理解;设立多样化反馈渠道,如在线表单、邮件、热线电话等,确保公众可以便捷反映问题,并及时接收回复;建立互动平台,鼓励公众、专业人士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开展在线讨论、问答交流等活动,促进多方合作与交流,共同解决养老风险问题。此外,还应建立健全运营机制,包括平台维护、人员培训、技术更新、用户隐私保护等,确保公共平台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

(三)加强科学技术手段运用

养老风险精准识别工作的开展和推进,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离不开数字重庆的建设。

一是运用云计算进行数据管理与存储。云计算提供了大规模的数据存储能力,通过将数据存储在云平台上,可以突破传统存储设备的限制,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并进行数据自动备份,在发生故障或灾难时能快速恢复数据,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云计算平台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弹性扩展,根据数据量的增减自动调整存储空间和计算资源,确保有效管理和分析海量数据。云计算平台还能进行多用户的协同合作和数据共享,提高养老风险识别的效率和精确性。

二是深入挖掘信息潜在价值。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养老风险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模式识别、关联规则挖掘等,可以发现隐藏在数据中的规律、趋势和关联性,进一步识别和评估潜在的养老风险。运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能从历史数据中提取特征,构建养老风险预测模型,提供更准确的风险预警和决策支持。利用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技术,对社交媒体、新闻报道、用户评论等文本数据进行关键词提取、主题建模和情感分析,可以了解公众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度、态度和需求,从中发现潜在的风险。

三是动态追踪信息。利用自动化工具,实时或定期监测养老风险相关数据的变化和更新,包括社会经济指标、人口统计数据、医疗保健数据等,以了解养老风险的实时状态和趋势。还可以通过在养老场所、医疗设备、个人穿戴物品等部署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老年人的步数、心率、睡眠质量等健康指标与生活数据,从而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情况。还应建立养老风险预警系统,根据实时数据进行模型更新,监测风险指标的变化,并生成预警信号,及时向相关部门和机构提供预警信息。

(四)加强社会协同互动参与

当前,依赖于单一主体已经不能满足养老风险精准识别需要,多元主体合作已成为一种有效的风险识别方式。促进各方积极主动参与,能使各社会成员的作用和价值得到最大程度发挥。

一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协同配合。社会组织可以协同整合各自的资源,如人力、财力、技术等,形成合力,共同开展养老风险识别工作。如借鉴酒店管理经验,完善养老院信息系统,实时掌握老年人数据;鼓励市场主体开发养老相关应用程序,动态监测风险信息。充分发动社区、医院、学校、企业等社会主体,依靠自身专

业知识,实现养老风险识别工作的全面性、连续性和一体化。

二是重视群众积极参与。研究制定数据公开办法,向广大群众公布相关数据。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活动,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培训班等形式,提高群众对养老风险的认知水平。主动征求群众的看法和意见,了解他们在养老问题方面的关注点和需求,从而更准确地识别养老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养老风险识别工作,组织成立相关的志愿者团队,帮助收集养老风险信息、宣传养老风险知识、协助调查和评估。

三是深化网络资源运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正式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9]。因此,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在线数据库等网络资源,能收集整理相关的案例、统计数据、政策文件、研究报告等,建立更全面、准确的养老风险数据库,为风险识别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基础。还应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在线调查,广泛征集公众对养老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获取更多样化的反馈,为风险识别和管理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何文炯,王中汉.论老龄社会支持体系中的多元共治[J].学术研究,2021(08):73-80+188.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21):4-35.
- [3]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5-06(001).
- [4]贺丹.中国人口展望(2018)[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8:1.
- [5]重庆市统计局.2022重庆统计年鉴[EB/OL].(2022-12-26)[2023-10-27].https://tjj.cq.gov.cn/zwgk_233/tjn/2022/zk/indexch.htm.
- [6]李志宏.新时代我国老龄工作的新使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构建理想老龄社会[J].老龄科学研究,2018(09):3-11.
- [7]高洁,蔡娟.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村家庭养老风险研究——以W村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22(18):12-15.
- [8]刘钧.风险管理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9-70.
-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2023-08-28)[2023-09-02].<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作者:舒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颖,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经济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刘小侨

重庆市地方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以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为视角

王 焱

近年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优化民主立法的方式方法,先后分两批次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10个,积极争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成功落户重庆。基层立法联系点洞察民情、倾听民声、集中民意、汇聚民智等作用不断深化和拓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原汁原味”直达国家权力机关,彰显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一、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背景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强调要“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历史性地与基层立法联系点联系在一起,与立法工作联系在一起。202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到上海调研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时提出,要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迈出新步伐。

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重庆市委六届二次全会对标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提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要新在人民群众对更加幸福美好生活有实实在在的新感受”,“着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积极申报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落户重庆,2021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沙坪坝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在渝举行,标志着“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在重庆市正式启动运行。

二、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重庆实践

基层立法联系点虽“小”,但一头连着国家权力机关,一头连着普通群众,是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为充分发挥民意“直通车”作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始终注重加强对各点的规范化建设、实效化运行、特色化打造,不断总结完善工作模式,“1+10+N”(1个国家级立法联系点、10个市级立法联系点、N个立法信息采集点)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格局逐步形成。

(一)高位推动促进“规范化”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试行办法、明确“七项职能”,积极探索实践,不断创新完善,建立健全基层立法联系点准入与退出、融合共建、绩效评估、表扬激励等制度机制。注重加强对各点的工作指导,通过集中培训、组织交流、上门指导等多种方式,着力推动各点结合实际制定立法建议征集、联络员队伍建设、经费管理使用、工作资料归档等配套工作制度,确保夯实民声听取“广”、民情反映“实”、民意归纳“准”、队伍建设“专”的制度基础,促进了基层立法联系点规范化建设。如,沙坪坝区中心湾社区立法联系点以制度促规范、以制度出质效,创设“三甄三译”的六步征询法,实现了立法意见征询“三上三下”。

(二)聚合力量架构“工作群”

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立法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洞察民情、倾听民声、了解民情、吸纳民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着眼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联动工作态势,积极指导各点组建工作队伍、拓宽工作渠道、延伸工作触角,更广泛地汇聚民意民智。涪陵高新区立法联系点面向园区、服务企业,先后聘

请了10名咨询专家、65名信息采集员、117名企业服务专员,并在全区建立起21个立法信息采集点,加强纵横向联系,形成“专群结合”的网格化工作机制。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铜梁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心等立法联系点利用已有工作架构,探索建立立法联络员、信息员、宣传员等专兼职工作队伍,变“单兵作战”为“百团会战”,确保了工作开展有组织、有网格、有队伍、有力量。

(三)立足特色打造“主阵地”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按照“有必要的场所、有基本的指引、有固定的人员、有健全的机制、有规范的管理”等建点标准,有序推进各点承接单位建设符合本地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确保务实管用的工作阵地,推动有条件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打造示范窗口和展示平台。沙坪坝区承接的国家、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大胆探索实施“示范点、孵化点、普及点”分级分类建点机制,在磁器口街道、回龙坝镇等培育了一批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立法联系品牌,让立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有“看点”。重庆市开州区法院汉丰湖法庭立法联系点紧密结合人民法庭建设,加强软硬件配备,打造法治小公园,设置立法征求意见箱,并借助已有的宣传公告栏、LED显示屏、“车载法庭”等装备,有效打造一果多用的主阵地。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立法联系点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机遇,立足川渝两省市毗邻地区“桥头堡”综合大镇的特点,围绕川渝协同立法,探索性地将立法意见征集和调研分析工作延伸至四川毗邻区县,较好扩大了立法联系工作影响力和“5G基站”覆盖面。

(四)借力云端扩容“朋友圈”

立法参与的主体越广泛,就越容易从民意中汲取营养、汇集智慧、凝聚共识,全社会公众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就越容易形成。针对传统的立法征询意见方式中征集建议面较窄、公众参与度不高、焦点讨论互动性不足等问题,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引导和鼓励各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借助新平台新媒体,探索及时便捷的意见收集方式,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常态化关注立法、参与立法、支持立法,让“铁脚板+职能化”共同服务于地方立法,实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重庆市涪陵高新区立法联系点在用好漫谈会、上门访、建议箱等传统线下意见征集方式的同时,专门开发法规草案线上意见征集信息平台,赋能网络化智能化,与园区企业广交朋友,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重庆市律协等立法联系点通过重庆律师公众号、“E党建”小程序、腾讯会议、微信群等方式更广范围地“连线”普通群众,也让“上班族”“手机控”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参与立法建言献策、谈出真心话。

三、重庆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和运行面临的问题

(一)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根据对10个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2023年1~7月份法规草案意见建议反馈及采纳情况的初步统计,10个立法联系点共对24部地方性法规提出432条意见建议,被采纳意见建议30条。有三个立法联系点反馈意见建议为3条以下,其中一个立法联系点对征求意见的两部法规提意见数为0;有两个立法联系点被完全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意见建议数均为0;同等条件下,立法联系点之间所提意见建议数最大差距多达142条。

数据客观反映各项工作的成果,透过数据看背后的原因,结合日常调研,我们发现有的立法联系点至今尚未明确“核心工作人员”,存在“临时派活”的情况,未形成工作常态;个别立法联系点接到立法征集意见任务后,仅交由少数人员提意见、马马虎虎、应付了事,对意见征集工作不“上心”、不“给力”;有的立法联系点设置立法信息征集点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升、部分信息征集点设立以来征集意见建议数几乎忽略不计;有的立法联系点工作创新不足,没有从自身的特点出发整合资源、发掘潜力。

(二)群众参与意愿与信息采集员能力仍需提升

基层立法联系点运行三年以来,参与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建议的老百姓经历了“观望-疑虑-尝试-改观”的转变,基层群众的参与意愿逐步被激活,涌现出了很多鲜活生动的民主故事。但是,仍有部分立法联系点面临群众在参与立法意见征集中“不愿、不会、不敢”的困扰。“老百姓的意见建议真的能直达立法机关吗?”

不会是走过场吧!”此谓不愿。“立法这么高大上的事,离我们有点远,普通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提意见呀!”此谓不会。“提意见不是给别人找麻烦吗?算了算了!”此谓不敢。信息采集员直接面对群众,与群众打交道是信息采集员需要掌握的首要 and 核心技能,其次,信息采集员还需要适时解读法规草案、将“法言法语”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为法规草案增加“烟火气”。实践中,有的信息采集员在工作中存在本领恐慌,上接天线、下接地线的能力还需加强。

(三)民意转化机制尚需完善

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工作,而立法工作的政策性和专业性都很强,如何处理好立法意见建议“原汁原味”与“梳理分析”的关系,兼顾民意的“真”和立法的“专”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汇总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反馈的意见建议,我们发现有的立法联系点简单地当“传声筒”“二传手”,对收集到的重复、相似的意见建议不归纳,对群众的“口水话”不转换,可采用性不高;有的立法联系点过度过滤、修饰甚至曲解民众原汁原味的意见,导致信息失真;有的立法联系点为求意见梳理方便快捷,以专家征求意见座谈会形式简单代替征求民众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深入群众倾听民声有虚化弱化的倾向。

此外,部分立法联系点对老百姓的意见建议分类整理不够、缺乏汇集民意与基层治理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在内容上,哪些属于体制机制中的问题需要地方立法层面予以解决,哪些属于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哪些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开展政策解读。在层级上,需要进一步区分哪些属于基层可以解决的,哪些属于需要向上级国家机关反馈的问题。在转化成效上,哪些民生热点、治理痛点可以成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的突破口。要切实履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迫切需要在工作中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耐心细致研究归纳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愿。

四、做实做亮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路径

基层立法联系点为立法决策提供“接地气”的一手民意资料,是在地方立法中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为充分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民意直通车”作用,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强化思想引领,在坚持人民民主中显高度

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本质属性、优势特点和实践要求的深刻阐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理解得越透彻,运用得越灵活,越能找准前进的方向、行动的指南和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我们可以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有植根本国土壤的民主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参与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各有关方面只有将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才能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局面。

(二)改进方法作风,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上增温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髓在于“全”,更在于“人民”二字,是对人民至上的生动诠释和深刻实践。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中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深入把握民主立法的本质,凝聚各方共识,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民意民智转化为国家意志。因此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原汁原味征集意见,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客观汇集群众的真实诉求。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对收集到的立法意见建议也要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好“法言法语”和“群言群语”的关系。一方面要把法规条文解释成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与群众进行充分沟通,把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转换成法律法规规范用语如实反馈给立法机关。可建立群众意见汇总分析联席会议制度,邀请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律师、社区工作人员等共同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研判分析,对可以直接采纳的意见建议从立法技术、立法规范上予以完善,对于蕴含群众实践经验和智慧、用朴素语言提出来的立法建议,认真分析研究其背后所反映的客观规律,并抽象提炼到具体的法规制度中。另一方面,对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经分析研判不宜纳入法规规范的,可进一步研究可否转化

为优化基层治理的具体举措。

(三) 突出实干实绩,在推进地方民主立法上见精度

必须始终坚持“扎实干”的工作作风。“扎实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不搞形式主义”,是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在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之初提出的明确要求。基层立法联系点要真正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单元,必须杜绝“立而不建,建而不用”的“民主装饰品”,求真务实、久久为功。适时启动工作评估机制,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让、劣者汰”的良性运行模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2022年通过的《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办法》规定,加强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及效果的动态评估,定期开展对各基层立法联系点上一年度工作情况的综合评价,作为调整或者撤销基层立法联系点的重要参考。建议严格落实工作办法相关规定,科学合理设置综合评价指标,细化量化基层立法联系点征集意见数、完全采纳数、部分采纳数以及意见建议转化为基层治理具体成效的情况,实现立法联系点运行情况“数字化”“可视化”。对上一年度综合评价排位靠后的立法联系点予以重点关注,对连续两年综合评价排位靠后的应撤销其立法联系点资格。

(四) 注重宣传引导,在讲好民主立法故事上加力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人民。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对广大群众和企业而言,还比较陌生。怎么打消在立法征集意见过程中群众的“不愿、不会、不敢”的顾虑?这就要求各立法联系点在实效化开展工作的同时,要注重加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及工作成果的宣传,讲好中国民主故事,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立法制度等深入人心。同时,要加大立法宣传力度,生动讲好新时代立法故事,特别是更加注重立法全过程宣传。广大群众通过亲身参与立法,更容易直接准确地了解立法宗旨、立法精神和核心条款的立法原意,更容易感受到法律法规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的本质。各立法联系点可以整合人大代表、律师、社区工作者等资源,把立法语言转化为社会公众听得懂的话,让老百姓深切感受到立法是为了解决老百姓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不是高不可攀的教条。各立法联系点要建好立法“广播站”、当好立法“宣传员”,如在养犬管理条例、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等立法的“前中后”,加强社会舆论引导,增进公众立法认同,力求每一项立法都广而告之、广纳良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推动法律法规正确有效实施。

(五) 及时反馈通报,在建好“回音壁”上有态度

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做好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不仅要在开门立法中接地气、汇民意、聚民智,也要及时向有关群众反馈立法建议被采纳的情况,向立法机关反馈法律法规实施的效果,向有关部门反映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和建议,起好“回音壁”的作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在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监督过程中,分别委托市律协、开州法院汉丰湖法庭、荣昌盘龙镇人大办等基层立法联系点,针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情况、行政程序违法涉诉情况、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情况开展“小切口”“解麻雀”的调研分析,各立法联系点认真负责地反馈了问题和建议,确保该项监督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深化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有益尝试,今后要坚持和完善。要及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建议采纳情况反馈、通报、激励等机制,进一步激发各立法联系点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动力。

作者: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委综合处处长
责任编辑:刘小侨

村规民约的研究综述及其治理重构

周铁涛

有社会即有规约,规约得以实施,秩序方能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1],要“创新用好村规民约等手段,倡导性和约束性措施并举,绵绵用力,成风化俗”^[2],“发挥好村规民约、村民民主协商、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3]。从传统乡规民约到现代村规民约,变化的不仅仅是规约的内容和形式,更有人治型管理理念向民主法治型治理理念的演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规民约的约束性、惩罚性治理功能弱化,但其倡导性、规范性治理功能日渐显现。通过价值重构,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功能,将现代民主治理理念融入乡村社会,实现村规民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提升“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善治的重要课题。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规民约研究综述

通过梳理 2018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核心类期刊关于村规民约研究的 54 篇文献发现,国内学者近年来关于村规民约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从历史文化传统和乡村发展实际的结合出发,探寻规约文本落地落实的有效路径,研究重点主要侧重于重新界定当代村规民约的价值定位、树立村规民约治理权威、提升村规民约的治理效能三个方面。

(一)从“历史传承——现实价值”的维度对传统村规民约的现代转型进行梳理,重新界定当代村规民约的价值定位

部分学者从历史的维度得出村规民约价值再现的结论。郎友兴、陈文文、薛晓婧认为,村规民约的治理议题已从工具论走向工具与权利、价值融合的治理轨道^[4];高其才认为,村规民约变化的是表面性内容,实质性内容和保障工具职能没有变化^[5];陈秋云、姚俊智认为,尽管传统村规民约已发生全方位裂变,现代村规民约与之有诸多传承与暗合,衍变和发展并未离开基本价值要求^[6];任新民、刘园园、施静春通过探寻乡村治理主体、方略、实践的“共构谐变”逻辑阐明了村规民约的价值再现^[7]。

部分学者从现实的维度对村规民约治理的当代价值进行了阐述。印子认为,村规民约是社会生活规范化的制度载体^[8];刘思思认为,村规民约内嵌于“三治融合”具有独特的功能价值^[9];唐家斌、熊梅、何瓦特认为,村规民约是乡村文化价值重塑、秩序稳定的重要突破点^[10];王小章、吴达宇认为,村规民约的伦理作用日渐式微,但其形式却可以用来“接引”现代公民道德;高其才认为,村规民约具有“改变不良习惯”^[11]和推动“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12]的作用;李敏认为,村规民约在基层情境治理中发挥着行为规制、法律补漏、民主参与和文化遗产等多重功能^[13]。

(二)从“国家法律——自治规约”的维度对村规民约内容的性质、效力进行探讨,理顺树立村规民约治理权威的思路

部分学者从国家制定法与村规民约的关系探讨村规民约治理权威的树立。陈寒非认为,通过村规民约整合国家法律与民间规约是村级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路径^[14];李竹认为,村规民约与制定法之间应保持“回应与互动”的状态^[15];赵凌认为,重塑村规民约的法治作用要推动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互动^[16];舒松认为,要协调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政策的关系^[17];牟军、徐超认为,协调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关系,要改进国家法的实施方式^[18]。

部分学者从村规民约中惩罚性规条的性质和村规民约的司法适用探讨村规民约治理权威的树立。罗鹏、王明成认为,村规民约中属于国家授权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本质上是法,反之属于契约^[19];曹伊清、翁静雨认为,应根据村规民约中责任条款的内容区分其性质为民事契约或者自治规范,进而判断其效力^[20];唐鸣、朱军认为,村规民约规定的内部罚则惩罚措施属村民自治共同体的自治范畴,适用法无禁止即可为^[21]。袁方成、刘桓宁认为,村规民约中惩罚性规条的落地有赖于村庄共同体内部的有序参与和外部的指导监督^[22];张华认为,村规民约在司法审查中绝大多数未能获得肯定与支持,应当以司法保障村民自治^[23];郭剑平认为,村规民约的民事司法适用要建构双轨审查机制,加强对村民的引导^[24];罗鹏、王明成认为,行政监管和法院司法适用应区分村规民约内容的性质,采取不同的处理步骤和规则^[25]。

(三)从“外部环境——内生动力”的维度对村规民约的制度重构进行探讨,探索提升村规民约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在完善宏观政策层面,苏曦凌、梁舒萍认为,政治势能与社会动能有机结合方能Let村规民约转化为实质秩序^[26];乔淑贞认为,应进一步明确村规民约的法律地位和功能^[27];李敏认为,村规民约的改造和吸纳,应以“硬法”为基础,“软法”为补充,推动有效治理^[28];印子认为,应为村规民约促进“三治”结合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法治空间^[29];姚俊智认为,应重视党规与村规民约的协同互动,以达成“最适宜的善治”^[30];郭利京、林云志、周正圆认为,发挥村规民约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规范作用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保障和支持^[31]。

在创新运行机制方面,王世强认为,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才能更好推动村规民约的复兴、重塑和优化^[32];苏运勋认为,村规民约的村庄治理和社会教化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利益重合下的价值引导机制、组织配套下的监督保障机制和福利关联下的惩罚机制的有效运行^[33];池建华认为,村规民约要注重制定机制的自治性、内容安排的针对性、保障机制的强制性^[34];唐家斌、熊梅、何瓦特认为,应从发挥政府主导、法治平衡作用,强化耦合协同作用、构建多方互动机制等方面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35];刘思思认为,应在改进形式、提升内容、完善程序、强化执行、组织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36];陈荣卓、李梦兰、马豪豪认为,村规民约的现代转型应进一步提升规范性、增强协同性、注重参与性、加强引导性^[37];杨守涛、蒋良竹认为,南广阳城村的契约治村是村规民约地方性方案,其党领群治、民主协商、问题导向、刚性约束、扎实推进的做法值得借鉴^[38];曾勤、刘名瑞、池飞帆、关洁茹、王阳提出了将村庄规划纳入村规民约的衔接思路^[39];夏佳奇、何可、张俊飏认为,政府应当推动环境规制“合礼”化、村规民约“合理”化^[40];高艳芳、黄永林认为,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41];卢瑶玥、覃诚、方向明将村规民约的作用机制划分为理想型、松散型、悬浮型、脆弱型四种类型。^[42]

在激活内生力量方面,向颖认为,村规民约遵循乡土社会内生逻辑而形成,只有“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更好提升治理绩效^[43];李媛媛、贺树月认为,村规民约只有与乡村社会网络相嵌合,才能获得乡村内生性力量的支持^[44];唐丽霞、丁悦认为,激励、引导和规制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三种不同内生机制,以尊重农民地位为基石转变互动模式可以作为政策设计的突破口^[45];陈学金认为,村规民约的有效性取决于民主协商治理,而非物质上的福利激励^[46];陈秋云、姚俊智认为,通过村规民约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当注重规范协同与主体共振,通过规范的融合共生、主体的多元互动实现“良法善治”^[47];祝丽生认为,需要加强双向互动,构建农民内在认同与政府外在引导机制^[48]。

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规民约的治理功能重构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关于村规民约的既有研究中,已经形成的共识有三个:一是现代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的文本呈现形式多样化、内容复杂化的特征,但传承的治理功能没有改变,村规民约短时间内不会自然消失,正在努力完成“价值再现”的蜕变过程;二是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和互动中,规约内容日渐向法律靠拢,但由于制定主体的特殊性,尚未完成两者间司法适用的接轨,村规民约治理权威的树立任重道远;三是规民约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是一个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过程,面临着如何更好契合基层实际、如何更好适应农民需求等一系列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价值重构,既要挖掘规约文本承载的治理理念和文化遗产,也要把握其彰显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还要其指向的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目标。

(一)以文本化乡村自治规范承载法理和乡俗

传统村规民约的现代转型要契合基层治理实际就不能不考虑乡村治理生态的变化。现代乡村治理是基层党委、政府主导下,农民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其基本理念是让农民作为政治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和村级公共事务治理。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基层社会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效和问题同时显化,农民的思想由封闭走向开放,民主热情日趋高涨,利益诉求日趋多元,行为方式日趋理性,乡村民主生活呈现新特点,以“三治结合”为基础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以村规民约为载体推动乡村善治,必须正视这一变化。就村规民约治理功能的现代转型而言,需要形成的共识有两个:一是治理机制的民主化;二是治理规则的制度化。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协商治理形式融入乡村社会,承载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制度需求逐渐显化。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乡村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下,民主法治示范村镇的建设步入快车道,治理机制的民主化、法治化得以显现,村级治理的民主共识已基本形成。然而,在共识形成的

同时,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不可能在短时间消除,农民对国家法律、村规民约、乡村习俗等各种治理规则始终存在模糊认识,依据何种规则表达诉求、调处纠纷,容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有制度化的文本为参照。对乡村社会的居民而言,国家法律似乎过于专业而相距遥远,只能用来解决重大纠纷;乡风民俗又似乎过于“传统”,不足以拿上“台面”调处村域外部的矛盾纠纷。村规民约若能以文本化的地方性制度承载法理和习俗,则不失为理想的地方治理规则,重现地方“小宪法”的功能。

(二)以协商型治理形式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乡规民约的政治基础是建立在协商基础之上的一种村民自治制度。”^[49]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将“三农”问题作为关乎发展与安全的头等大事来抓,始终关注农村的民主法治进程,积极推进群众工作站、村民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建设,自上而下的改革部署凝聚了民心,也使乡村民主治理转型达成了共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规民约必须由村民会议制定,在制度设计上,它必须是通过民主化的程序、基于村民同意才能合法产生的村民契约。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村经济日趋发展,农民生活日趋富裕,加上近年来民主协商的理念和机制进入乡村,农民参与村级治理的愿望不断增强。在诸多政治参与方式中,参加民主选举解决了农民基本的平等权保护问题,而参与村级事务协商则让农民的政治参与更具实效。在封闭农村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农村熟人社会开始向半熟人社会转型,农民参与村、组治理增多,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程序的制度化要求被提出。村民真真切切参与村规民约制定的过程,尽管在表面上看绝大多数都是围绕自身利益进行的诉求表达,带有明显的功利意识,实际也是完完整整的民主协商的过程,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三)以内生性治理机制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以全体村民共同参与为前提,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特征,主要依托乡村治理内生机制得以维系。村规民约是农村基层群众以加强村民自治、规范村民行为、化解基层矛盾为目的,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等,结合乡村实际,就农村治理中的一些或某一问题提出并制定的由当地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内容源于乡土社会,是村民开展群众自治活动应遵循的基本规范。作为一种契约性规范,其与村民自治章程的定位不同,村民自治章程是宪法、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就乡村治理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而村规民约则是用于直接指导乡村治理实践的实用性规则,是农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直接依据。在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农村社会急需加强利益整合,应根据村落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按照充分体现自治、法治精神的原则,以构建和谐农村为目标,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使之发挥应有作用。由此,现代村规民约的价值需定位于健全乡村治理内生机制,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内核,以国家法律政策为主臬,致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村规民约的重构”(项目编号:XSP19YBZ1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 求是, 2019. 11.
- [2]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求是, 2023. 06.
- [3] 汪晓东, 李翔, 刘书文. 谱写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的华彩乐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综述[N]. 人民日报, 2021-09-23.
- [4] 郎友兴, 陈文文, 薛晓婧. 村规民约的文本和背后的治理议题及演变——以浙江省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为例[J]. 治理研究, 2022(05): 59-72+126.
- [5] 高其才. 乡村治理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变与常——以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魁胆村为考察对象[J]. 学术交流, 2019(04): 96-107+191.
- [6] 陈秋云, 姚俊智. 乡村治理视野下海南黎区村规民约的裂变与传承[J]. 原生态民族化学刊, 2019(06): 90-99.
- [7] 任新民, 刘园园, 施静春. 共构谐变: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格局嬗变中村规民约的价值再现[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96-104.
- [8] [29] 印子. 法治社会建设中村规民约的定位与功用[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1): 27-36.
- [9] [36] 刘思思.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村规民约的价值功能、实践难点及完善路径[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08): 128-133.
- [10] [35] 唐家斌, 熊梅, 何瓦特. 论村规民约对基层治理的作用[J]. 原生态民族化学刊, 2020(06): 93-100.
- [11] 高其才. 通过村规民约改变不良习惯探析——以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为对象[J]. 法学杂志, 2018(09): 78-85.

- [12]高其才.通过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以贵州省锦屏县启蒙镇边沙村环境卫生管理为对象[J].广西民族研究,2018(04):56-64.
- [13][28]李敏.村规民约在基层情境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108-114.
- [14]陈寒非.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村规民约之路:历史、问题与方案[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01):79-87.
- [15]李竹.乡土社会村规民约的“法制化”博弈[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5):32-37.
- [16]赵凌.重塑村规民约之于乡村法治建设的作用[J].人民论坛,2019(25):82-83.
- [17]舒松.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村规民约的作用机理及其实证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9(11):52-60.
- [18]牟军,徐超.民族村寨村规民约“异化”及与国家法调适——基于元阳梯田核心区村规民约的分析[J].思想战线,2018(04):117-125.
- [19][25]罗鹏,王明成.村规民约的内涵、性质与效力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9(03):67-76.
- [20]曹伊清,翁静雨.村规民约中责任条款的效力——以黔东南的民族村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23(04):65-71.
- [21]唐鸣,朱军.关于村规民约的几个问题[J].江汉论坛,2019(07):132-136.
- [22]袁方成,刘桓宁.从规约有效到治理有效——以村规民约中的惩罚性规条为研究对象[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05):111-118.
- [23]张华.村规民约的司法审查:启动、内容与结果——基于2008篇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69-76.
- [24]郭剑平.乡村治理背景下村规民约民事司法适用的理论诠释与优化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08):78-86.
- [26]苏曦凌,梁舒萍.村规民约何以转化为实质秩序:建构机制与效能——基于18省份36个优秀村规民约的整体性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05):30-38.
- [27]乔淑贞.乡村治理视野下村规民约的法律依据与司法适用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2020(01):46-48.
- [30]姚俊智.乡村治理视野下党规与村规民约的协同互动[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01):82-90.
- [31]郭利京,林云志,周正圆.村规民约何以规范农户亲环境行为?[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07):68-74.
- [32]王世强.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3(04):31-40.
- [33]苏运勋.村规民约的社会基础及其运作机理——以鲁中D村为例[J].兰州学刊,2021(03):147-157.
- [34]池建华.通过村规民约促进生态宜居建设——以南方主要少数民族村规民约为考察对象[J].贵州民族研究,2020(09):88-93.
- [37]陈荣卓,李梦兰,马豪豪.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村规民约:现代转型与发展进路——基于“2019年全国优秀村规民约”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1(05):23-36.
- [38]杨守涛,蒋良竹.村规民约有了地方性方案——南广阳城村契约治村的实践与启示[J].前线,2020(06):82-85.
- [39]曾勤,刘名瑞,池飞帆,关洁茹,王阳.村庄自治视角下村庄规划与村规民约的衔接研究——以广州市乡村地区为例[J].规划师,2019(24):41-47.
- [40]夏佳奇,何可,张俊飏.环境规制与村规民约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以规模养猪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例[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12):1925-1936.
- [41]高艳芳,黄永林.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19(02):102-109.
- [42]卢瑶玥,覃诚,方向明.村规民约对农村养老福利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浙江省衢州市28个村的观察[J].中国农村观察,2023(02):109-125.
- [43]向颖.村规民约嵌入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J省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家,2023(06):136-141.
- [44]李媛媛,贺树月.从“上墙”到“落地”:村规民约效力实现机理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J].湖南社会科学,2022(06):99-106.
- [45]唐丽霞,丁悦.激励、引导和规制: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何以有效发挥?——基于积分制、村规民约和农村综合信用体系的对比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22(08):144-150.
- [46]陈学金.历史视野中的当代村规民约与农村社区治理[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02):69-74.
- [47]陈秋云,姚俊智.通过村规民约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来自海南黎区的探索与实践[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05):85-92.
- [48]祝丽生.积极培育现代村规民约[J].人民论坛,2018(13):76-77.
- [49]江祖松.村民自治体系中村规民约对依法治村的平衡作用[J].江南论坛,2016(11):30.

作者:中共湖南省益阳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刘小侨

金融强国视阈下“代理退保”耦合协同 金融诈骗犯罪及打击方法研究

李大鹏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充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等,以有内部资源名义,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虚假宣传可办理全额退保,并从中非法牟利,形成“代理退保”的金融诈骗模式。而“代理退保”就是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以保单投保人的名义向保险金融机构申请办理退保,通过捆绑目标客户、逼迫保险公司、线下发展代理等形式获取不法收益的犯罪模式。目前,“代理退保”已成为扰乱保险市场、损害保险公司和消费者利益的重灾区,逐步形成黑色产业链,并正从传统寿险、健康险等人身保险产品向车险领域延伸^[1]。加大对“代理退保”的金融诈骗犯罪打击力度以及方法研究,是实现金融安全,进而保障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代理退保”的行为特点及获利模式

“代理退保”黑产团伙模仿直销模式,通过加盟代理、中介合作、招收学员等形式,广泛发展线下代理,并开展所谓的“保单维权说明会”“专业培训会”,形成线下逐层获益、线上网课收费的获利模式。

一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退保。“代理退保”黑产团伙往往包装为专业团队,通过自媒体等平台营销,或者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客户信息后,诱导消费者与其签订代理合同,委托其代理退保。二是操控投诉,阻断消费者正常维权。部分“代理退保”黑产团伙中,混杂着保险机构的在职或离职人员,利用其熟悉保险消费投诉和相关监管政策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操纵消费者,反复向保险业监管部门投诉,并控制或诱骗消费者不能与保险公司直接联系,阻碍消费者正常维权^[2]。三是伪造证据,向保险公司施加压力。“代理退保”黑产团伙,通过与原保单销售人员联系,钓鱼取证,诱导多数正常保单出现一系列人为制造或伪造的问题。在钓鱼取证成功之后,“代理退保”黑产团伙就针对销售误导、学历造假、培训记录缺失、给予合同外利益等上述人为制造或伪造的问题理由,进行高频次投诉,向保险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全额退保。四是谋取非法利益。在实施前三步的非法行为过程中,“代理退保”的黑产团伙通过向保险消费者收取“代理费”“咨询费”手续费,或者通过从消费者退保之后,投资其他产品获取不当利益,甚至是通过贩卖消费者个人信息,谋取非法利益^[3]。

二、现有打击实践与新型金融犯罪

近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对该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入研判,实施了有效的打击实践和实务探索。

(一) 现有“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的打击实践

有效打击实践的分类研判:第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施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代理退保”黑产团伙实施代理退保行为中的预备行为^[5]。在这一行为中,黑产团伙多通过非法方式获取投保人信息,以电话、短信息等方式游说客户委托其办理退保。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名的打击对象是代理退保的预备行为,能够实现对“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犯罪行为的前置阻断,但尚不能形成对代理退保完整实行行为的整体打击,难以作为打击的典型实践。第二,以诈骗罪实施打击。犯罪团伙冒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实施诈骗,以能够代理客户办理退保为名,从意图退保的保险消费者手中骗取手续费,实施诈骗犯罪。该类犯罪的主体是电诈团伙成员,而非“代理退保”黑产团伙成员。以诈骗罪实施打击,能够重点打击电诈团伙,但较难打击到“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第三,以职务侵占罪实施打击。在上海经侦办理的“代理退保”职务侵占案中,犯罪事实具体表现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为侵占公司“开单”奖金,劝说投保客户全额退保并重新投保,骗取公司财产的行为。该案中,犯罪主体是保险公司员工,“退保”是其职务侵占的手段行为,不具有典型性。

实务探索的结构化分析: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就“代理退保”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犯罪进行了探索。第一,寻衅滋事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前提是公司财物的所有权归属已经确定无疑,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拿硬要,或者强行索取。而在“退保”这一行为中,投保人期望退还的金额,与保险公司愿意返还的金额并不一致,且因为保险条款、累计缴纳保费金额、保险金额、投保时间、退保

原因等因素产生纠纷。关于退保金额的财产所有权尚处于争议之中,导致以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定罪存在争议。第二,虽然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犯罪。但“代理退保”明显不属于“经营保险业务”的范畴,且非法经营作为列举型犯罪,在其列举规定的非法经营的表现形式中,并没有代理退保行为,因此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二)新型金融犯罪揭示“代理退保”的另类途径——保单转让

保单转让须遵循“保险利益”原则。保单转让,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将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他人的法律行为。其实质是合同主体的变更。保险不能更改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一旦确定便不可随意变更,但投保人可以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作出更改。寿险保单作为一项金融资产可以进行转让,即变更投保人和受益人,但必须遵循“保险利益”原则。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根据“保险利益”原则,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才具有投保人的资格,保险利益是认定保险合同有效的依据。

保单转让须提交具有证明保险利益的书面材料,即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劳动合同、户口簿等等。投保人、受让人提供上述“保险利益”凭证就可以在保险人(即保险公司)处进行转让登记。因此,将寿险保单通过“转让”方式出售给受让人,也成为寿险保单通过保险公司“退保”变现之外的另类途径。

“助贷”黑产团伙收购寿险保单实施骗贷、骗保犯罪行为。融资性保证保险,是指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借款人,向保险公司投保,在发生还款违约后,由保险公司代偿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的一种保险。此类险种是银保合作的创新应用,既符合高效申请贷款的市场需求,更有效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风险,已成为保险行业财险业务第二大险种。2021年全国保证保险保费收入已近千亿美元。其中,融资性保证保险,依托互联网科技应用,具备较高市场认可度和便捷操作性,也成为不法侵害的重要目标,面临严峻的风险隐患。近日,重庆警方侦破全国首例利用虚构“车资质”、转让过户“寿险保单”实施诈骗的融资性保证保险诈骗案,成功打掉一个“助贷”金融黑产团伙,及时发现贷款类、保险类诈骗犯罪的新手法和新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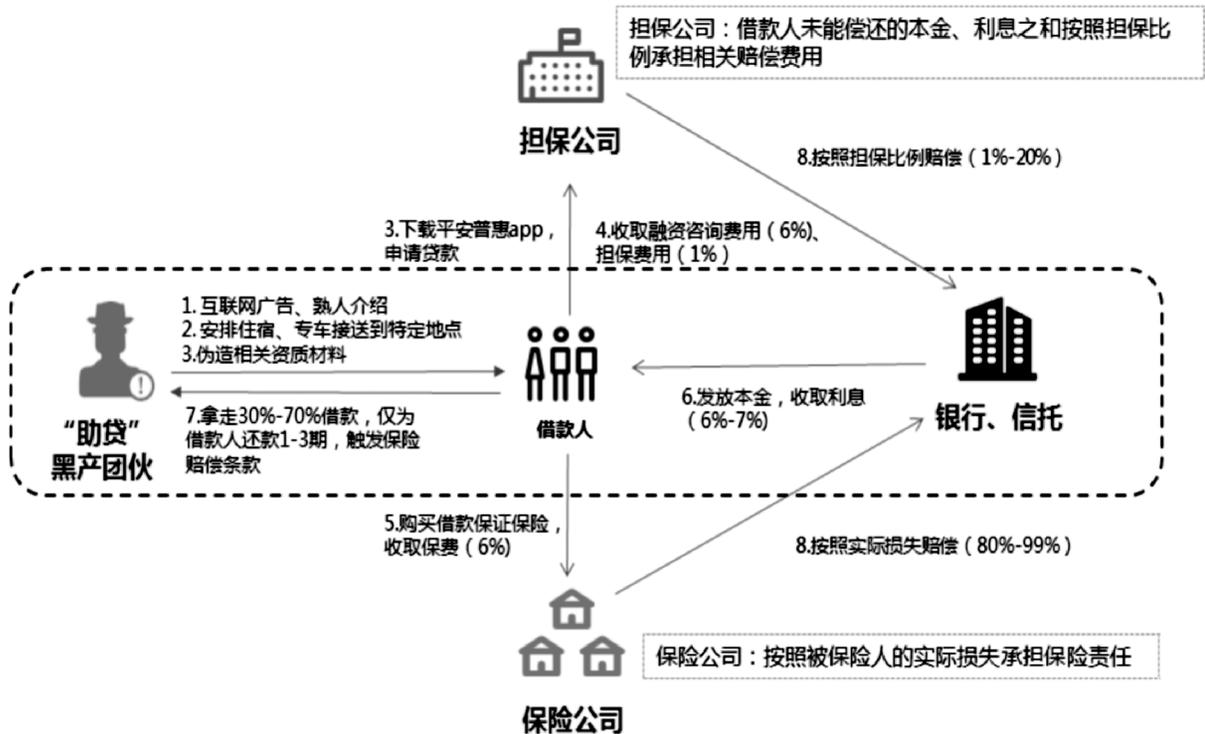


图1 融资性保证保险诈骗犯罪行为模式图

在重庆警方破获的融资性保证保险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严某为首的“助贷”金融黑产团伙,以获取高额手续费为目的,通过线上广告、线下推介等方式,利用国内各地金融中介人员搭线,招揽全国各地贷款资质极低的资金需求人员,并以承诺顺利贷款、提供交通费用、安排在渝食宿等为条件,组织借款人来渝贷款。其间,该团伙针对借款人征信资质差异,采取为借款人购买“车险”、转让过户“寿险保单”、虚构工作单位、虚报工资收入和编造居住地址等系列手段,伪造并提升借款人贷款资质。同时指导借款人下载贷款APP,并

填写虚假信息,骗取金融机构视频审核和大数据审核。借款人贷款成功后,该中介团伙即按约定贷款30%—50%作为中介费用,并扣留借款人还款银行卡和三期还款资金,由该中介团伙安排履行三期还款后即终止还款,故意触发“拖欠借款”的保单生效条款,最终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严某在重庆先后面向全国20余省市招揽了360余名借款人伪造个人信息和资质证明,采取向金融机构贷款并故意逾期等手段,对平安财险、太平洋保险等多家公司,实施融资性保证保险诈骗活动,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

“代理退保”黑产团伙通过转让保单全额变现。“代理退保”黑产团伙,将寿险保单转卖给“助贷”黑产团伙,然后由“助贷”黑产团伙将收购寿险保单过户到借款人名下,以提高借款人的借款资质和授信额度,进而通过投保融资性保证保险顺利获取贷款。在这一过程中,“助贷”黑产团伙,利用伪造的借款人资质,成功诈骗到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贷款、保险金。而“代理退保”黑产团伙,通过转让保单,实现了保单的全额变现。

三、“代理退保”与“助贷”黑产团伙耦合协同的共同犯罪模式

2018年以来,“助贷”黑产团伙通过收购“寿险保单”骗贷、骗保的犯罪日益猖獗,而“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的高频次犯罪日期与之高度重合,形成二者耦合协同的最新金融诈骗犯罪模式。

(一)“代理退保”与“助贷”黑产团伙相互助力,协同增力

具体来说,“代理退保”黑产团伙通过转让寿险保单变现是其最优选择:首先,相比于“维权”方式的退保,转让寿险保单的变现方式时间更短、成本更低;其次,寿险保单可以多次转让,手续费可以多次收取;再次,寿险保单转让可以网上异地办理,不受“维权”退保方式的地域限制,便利性较强。所以,寻找合适的寿险保单受让人,就成为“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的最迫切需求。

不仅如此,“助贷”黑产团伙收购寿险保单使其骗取贷款的犯罪效率快速提升:寿险保单作为一种金融资产,是银行、保险公司授信审核的重要依据。“助贷”黑产团伙通过招揽信用“白户”,受让寿险保单进而骗取贷款、保险金。在重庆警方破获的融资性保证保险诈骗案中,严某招揽借款人赵某从吉林到重庆骗取贷款,高价收购原投保人张某的一份“平安福终身寿险”保单,并伪造了赵某和张某的结婚证一张,成功骗取保险公司完成保单转让过户,赵某从而获取贷款资质,成功骗取年缴保费金额三十倍的贷款,可谓“一鸡三吃”。值得注意的是“一鸡三吃”的最大犯罪收益:在“代理退保”与“助贷”黑产团伙耦合协同的共同犯罪过程中,“代理退保”黑产团伙既可以在原投保人处收取高额手续费,也可以从“助贷”黑产团伙的客户处收取高额手续费,还可以从“助贷”黑产团伙处收取转让过户费用,真正实现“一鸡三吃”的最大效益。

因此,该类犯罪中,“代理退保”黑产团伙手中掌握大量寿险保单需要变现,而“助贷”黑产团伙需要寿险保单包装借款人,两个团伙通过买卖寿险保单而相互助力,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协同完成了代理退保、骗贷骗保的犯罪行为,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金融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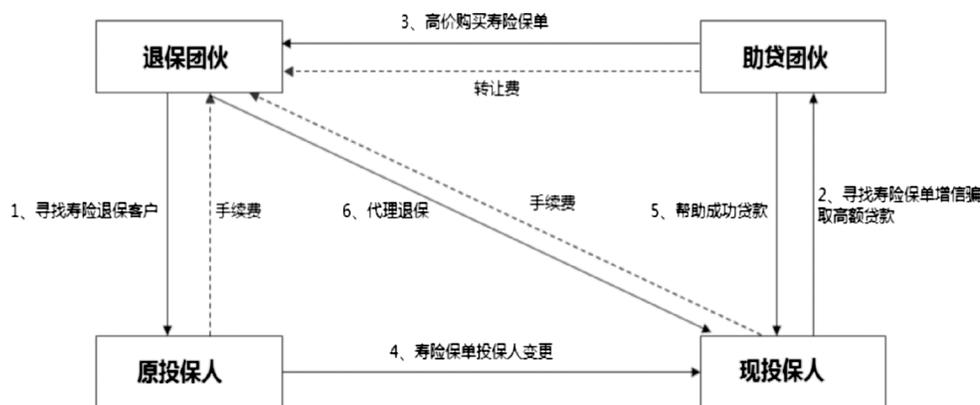


图2 “代理退保”与“助贷”黑产团伙耦合协同模式

(二)“代理退保”与“助贷”黑产团伙构成金融诈骗犯罪共犯

“助贷”黑产团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招揽借款群体、伪造核心资质、培训应对审核、引导骗取贷款、收取高额费用、触发违约责任、保险理赔代偿等手段,骗取金融机构贷款、保险公司保险金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在该类犯罪中,“代理退保”黑产团伙手中掌握大量寿险保单亟须变现,而通过“代理维权”方式不仅时间过长,而且不能全额退保。其将保单转让给“助贷”黑产团伙,不仅能够快速变现,更能全额、超额变现。在与“助贷”黑产团伙合作过程中,“代理退保”黑产团伙为能够足额,甚至超额转让保单,往往承诺“包干”完成转让过户程序。其不仅明知保单受让人以该保单骗取贷款、保险金的犯罪意图,也帮

助原投保人、现投保人(暨受让人)伪造“保险利益”凭证以在保险人(暨保险公司)处完成转让过户手续,最终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保险公司的保险金,构成“助贷”黑产团伙金融诈骗犯罪的共犯。

四、“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的打击对策

正如对公职人员的打击应该以职务犯罪定罪,对金融黑产的打击也应该以金融犯罪的罪名科刑。对“代理退保”黑产团伙建议以上述侦查实践引导打击思路,并研判该类犯罪的打击模型。

(一) 开拓“代理退保”黑产案件打击思路

对寿险保单进行多维度(如过户日期、投保险种、保险公司等)筛查,明确“助贷”黑产团伙和“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的共同客户(通过“助贷”黑产团伙伪造寿险资质成功实施保证险诈骗的投保人),查明过户寿险保单时提供“保险利益凭证”的真假,厘清“代理退保”黑产团伙帮助“助贷”黑产团伙金融犯罪的共犯关系,锁定退保中介嫌疑人。

(二) 创建“代理退保”黑产案件打击模型

首先,通过“投保融资性保证保险且已理赔的寿险投保人 & 投保前一个月内变更投保人 & 投保后一个月内退保或转让保单”明确投保人。其次,通过投保人与黑产中介的手续费转账规律“两个及以上投保人给同一人转账”明确黑产中介。具体而言:通过条件1:“购买融资性保证保险且理赔的投保人”,筛选出贷款、投保、理赔的三个条件都具备的保证险投保人。通过条件2:“贷款前一个月内变更投保人”,筛选出以变更寿险保单获取授信的投保人。通过条件3:“贷款后一个月内退保或转让保单”,筛选出疑似“退保”黑产团伙操作的订单。综合条件1、2、3得到“投保人清单”,该清单是“助贷”黑产团伙和“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的共同客户。通过投保人与黑产中介之间手续费交易的转账规律(暨两个及以上投保人给同一人转账),锁定“助贷”和“代理退保”黑产团伙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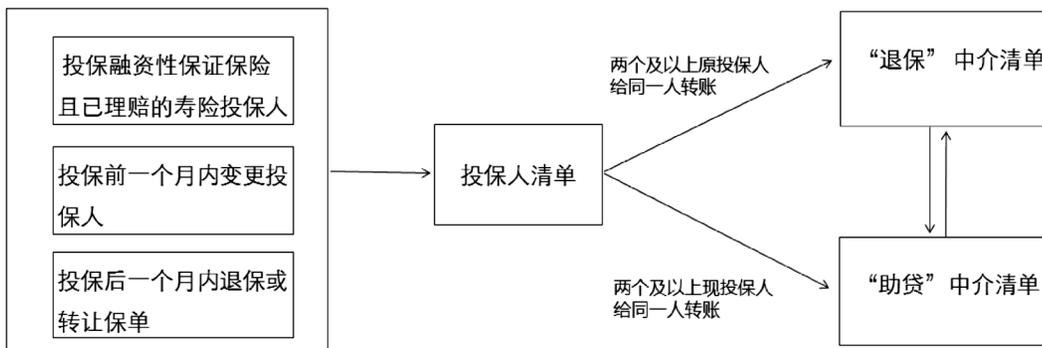


图3 “代理退保”黑产团伙的打击策略模型

(三) 加强警银协作,实现预防与打击并重

“代理退保”黑产团伙定性难、打击难,一直是制约该类犯罪的瓶颈问题。以公安机关为主导,联合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保险企业,加强警银协作配合,利用上述打击模型对“助贷”和“代理退保”黑产团伙进行批量打击,可以有效铲除信贷、保险行业面临的风险隐患,维护金融领域良好秩序。同时,公安机关、监管部门、银行保险企业也应当结合职能职责和角色定位,通过案例剖析、风险提示、行业整顿、违规警示等途径,采取线上线下宣传、教育和引导,揭露此类犯罪的手段方法,曝光金融黑产团伙的现实危害,依托全民金融法治意识的提升,构建金融安全的防护屏障。

参考文献:

- [1] 徐凌波.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功能性重构——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40号为中心[J]. 政治与法律, 2018(10):31-42.
- [2] 劳东燕. 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重构与运用[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1(04):3-29.
- [3] 李媛媛, 张春蕾, 随力瑞. 居民金融素养对防范金融诈骗风险研究——兼析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0(08):92-95.
- [4] 肖周录, 何旺旺. 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问题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11):181-185.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经侦支队
责任编辑:刘小侨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养女性干部的历史经验探析

李金蓓 吴碧清 张志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培养女性干部、发挥女性的“半边天”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取得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培养女性干部的举措,顺应了中国女性追求自由、平等、解放的美好愿景,吸纳了世界其他国家保护女性权利的经验教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将女性干部培养成党和国家事业的骨干。百年来党领导女性干部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给我们带来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因此,开展新时代女性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女性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会,通过女性干部来带动女性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养女性干部的思想文化渊源

(一)中国女性自由解放愿景为培养女性干部提供深厚文化基础

从原始社会至今,女性的地位大致经历了主导、依附、平等三个阶段,长期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对性别解放、性别平等非常渴望。随着母系社会的解体,我国女性的社会权利逐渐被限制,虽然经历了如商周时期“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或魏晋时期“今俗妇女……错杂于市”的社会风气较为开明的时期,但总体而言女性地位不高,最终随着封建礼制的强化,越来越被“三从四德”所限制,在社会地位上普遍低于男性。

在封建礼制和男权思维的束缚之下,尽管我国女性依旧在为追求平等解放而奋斗,但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女性无力对抗整个封建制度从而实现自身的解放,女性自由解放从一种社会政治诉求逐渐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景。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达到顶峰,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批判封建礼教、歌颂女性自由的作品逐渐增多。《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一方面揭露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扬女抑男”意识,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女性对平等、解放的渴望。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就肩负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不断满足中国女性对自由解放的期待也是应有之义。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就审议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反对“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主张妇女在社会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指明了中国妇女通往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1]。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培养女性干部的举措,与我国国情息息相关,是对封建历史的扬弃和对女性自由解放美好愿景的满足。

(二)女性自身发展为培养女性干部提供丰富经验借鉴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同样经历了长期探索,这一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女性干部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中世纪的欧洲受到教会的黑暗统治,妇女长期被视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和繁育后代的工具,甚至被认为是疾病和灾难的原因。从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欧洲社会对女性的观念有所变化,但女性依旧被束缚于家庭之中。

随着16—17世纪价格革命、商业革命等资本主义性质革命的爆发,妇女开始以独立姿态发挥个体作用、实现自我价值,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契机,部分女性进入社会的管理层,具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话语权。

西欧地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男女平等,既为我国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出现了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培养女性干部中需要规避的问题。首先,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因素,培养女性干部是为了更好发展生产力,培养高水平女性干部也需要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作为支撑,因此必须将经济建设摆在最为紧要的位置。其次,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可以实现男女平等,但也给女性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工业革命早期绝大多数劳动妇女要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工作,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很难得到保障,而更有话语权的中产、贵族妇女,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这也充分说明必须要培养真正能够代表所有女性群体利益的女性领导干部。最后,资本主义道路下的女性解放出现了异化的倾向,部分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女性干部裹挟民意,出现了极端女权主义等对社会危害巨大的社会思潮,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对立,这也说明培养女性干部必须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培养女性干部、追求男女平等的过程,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女性干部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女性干部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了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发展规律,是将中国女性自由解放历史愿景与现实社会女性解放经验结合起来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女性解放问题,一方面承认女性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女性的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肯定女性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将妇女解放程度提升到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高度来认识,为妇女解放指出了参与社会劳动这样一条根本途径”。^[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妇女实现解放面临较大困境,一方面是劳动妇女迫切需要得到平等和解放;另一方面是中国面临三座大山的压迫,劳动妇女受封建主义压迫尤其严重,其解放具有更大难度。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推翻“三座大山”救中国,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内忧外患的关头激发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妇女的解放。自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始终尊重劳动妇女创造历史的作用。培养女性干部,微观而言是在破除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残余,实现性别平等;放到更大的历史尺度上来看,培养女性干部的重点是以关键少数带动整个妇女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劳动,渐进地实现妇女解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中国女性才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养女性干部的历史演变

百年奋斗历程,党无论身处何种艰难环境,始终关注我国妇女解放和发展,坚持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不断开展实践研究。根据我国不同时期女性工作的开展特点,党对女性工作百年领导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首先,推动成立全国性女性组织,并对其进行改造和规范。党的早期领导人陈潭秋建议抓紧成立“女界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向各区通告中指出:“‘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3]

其次,党内成立了女性部和女性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对全国的女性工作进行领导,组织与规范。1922年7月党的二大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女性部,1924年5月正式成立。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必须附属于女性部并由女性同志承担这一任务”,同时还决定“设立女性委员会”。党的四大强调:“为图本党女性运动宣传工作之发展,本党应有一女性定期刊物之筹办。此刊物内容应注重女性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在党的领导与组织下,这一时期妇女工作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从规范程度来看,都有很大的发展与提高。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党的实力还相对薄弱,它所引领的女性工作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果上,仍然比较局限。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翌年7月,党的六大作出《女性运动决议案》,提出“在中国的环境中,组织单独的女性协会是不适合的。”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农村女性积极参加女性解放事业,为了维护其正当权益,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参政议政,甚至直接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在保卫根据地中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女性工作大纲》的工作方针也作出了适当的调整。例如,在各级党委中设立了女性部、妇委及其他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妇女工作宣传引导力度;通过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女性抗日救国会和其他女性抗日组织,充分调动了女性抗战的积极性;积极联合社会各界筹备建立中国女性抗

日统一战线组织充分调动广大女性的抗日力量,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亦大大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女性工作持续发展、不断推进。《解放日报》刊发《解放区女性当前的任务》一文,进一步指出:“全解放区女性当前的任务,也就是要贡献自己一切的力量,以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组织下,解放区女性工作继续蓬勃发展,广大解放区女性为保卫革命果实积极出谋划策,为解放军提供后勤补给;有的解放区女性直接参军赴前线作战,为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定新中国女性解放工作的大政方针,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3~4月就召开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更好领导和组织女性工作以促使女性进一步解放,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制定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明确指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宗旨是“努力争取废除对妇女的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同时,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保障妇女权益。例如,“为保障女性婚姻自由,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4]”,以法律形式保护妇女在婚姻中的正当权益,特别强调基层干部要积极推进婚姻法在基层贯彻落实。党的妇女解放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她们积极投身于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之中。例如,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党的组织、宣传和鼓舞下,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生产建设中,极大地保障了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有的妇女奔赴朝鲜为志愿军战士提供后勤服务,有的妇女甚至直接参军参战。1952年12月10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上通过的《关于当前妇女工作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全国妇联“除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直到最后胜利之外,必须更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妇女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和文化学习,积极参加祖国建设的各项工作,从而积极地、有步骤地解决女性特殊的切身利益问题,这是当前妇女工作总的任务和方针”。为了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工业化,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全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978年12月26日,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就在《把妇女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广播讲话中指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伟大的战略决策”,“也是我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同时她还进一步指出广大妇女的誓言是:“心要想在四个现代化上,劲要使在四个现代化上,聪明才智要发挥在四个现代化上。”在次年3月,全国妇联第四届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紧跟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做好妇女工作》再次明确强调:“我们各级妇女组织、妇女干部、广大妇女群众,一定要在党中央领导下”“紧跟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积极主动、生气勃勃、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为调整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而努力奋斗”。全国妇联在积极拥护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同时,号召全国妇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广大妇女在党中央及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为我国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努力拼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各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广大妇女的辛勤付出。随着经济迅猛发展,这一时期我国妇女工作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不断得到深化与拓展。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将促进男女平等和女性全面发展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大格局之中,擘画推进女性事业、妇联工作、妇联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女性运动的时代主题。只有把握好这一时代主题,才能把握住当代中国女性运动的前进方向。大家要牢牢把握这一时代主题,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的历程更加紧

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我国女性事业发展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使我国亿万女性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担当”^[5]。

此外,党中央还多次强调要重视女性的突出贡献,保障女性合法权益,促使女性全面发展,进一步完善女性工作。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文件中,专门强调要“推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健全女性、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合法权益保护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女性儿童合法权益。”党对女性工作的重视以及各项保护女性工作发展的重要举措,使女性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自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十分注重女干部的培训和教育,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导,根据肩负的历史任务和中心工作的变化,不断探索、发展和创新女性干部培养教育的思想理论和实际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不同时期,培养教育了大批优秀女性干部,为推行男女平等的参政议政作出了一系列的革新,如重视提拔少数民族女性干部、领导班子成员要求女性有一定的占比等。可以说,加强女性干部培养和培养,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工作和任务,又是推动性别平等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养女性干部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百年来党领导女性工作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带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就是,新时代开展女性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全力保障女性正当权益以及充分发动女性广泛参与。2023年10月23日第七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儿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在谈话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养女性干部的历史经验

女性干部工作是党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创举和巨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起到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广大女性群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因此,对百年来党的妇女工作的经验和主要成就进行总结归纳,为新形势下妇女工作创新发展提供借鉴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提高女性文化知识水平,为女性学习提供支持。广泛开展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促进妇女理想信念赋能,培育爱国主义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追求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大局,使其贡献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立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拓宽学历教育渠道,满足女性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女性提供便捷的党组织培训和在线教育资源,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与党的步调保持高度一致;大力提高妇女的科学素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教育,发挥“领头雁效应”,为女性群体树立榜样效果。

注重提拔少数民族女性干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女性的特点。少数民族女性干部队伍是领导班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少数民族以及女性群体争取到了更多的发言权。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女性干部并委以重用,是民心所向、发展之需,也是少数民族女性自身不断进取、中国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然体现。随着少数民族女性干部的进一步培养、选拔和使用,将会改善民族地区的工作现状,也能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二)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养女性干部的启示

百年来党领导女性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是,开展新时代女性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充分保障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给女性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会,通过女性干部来带动女性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妇女的作用不可替代。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激励广大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党的领导”列为我们党一百年来艰苦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正是有了党的领导与组织,中国妇女工作才逐步从弱到强、从广度到深度都得到了扩展与深入,维护妇女权益,宣传男女平等观念的效果明显,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提高。所以,现阶段我国妇女工作开展还必须时刻坚持党对妇女的领导,唯有这样才能使妇女工作向着正确方向继续发展,才能使新时期妇女工作继续取得更加瞩目的成绩。在新时期要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指导,一是党要不断地代表广大女性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女性服务、多措并举保障女性切身利益、让女性衷心地支持党的领导。二是广大妇女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始终坚持并拥护党对妇女的全面领导,积极响应并支持党对妇女的要求,唯其如此,党才能够更全面地引领妇女工作开展,让妇女工作开展持续全面推进。

坚持党的领导,践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要求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中国特色国情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融通中外女性研究成果,在促进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上下功夫,使其组成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干部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党同心同行。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牢牢把握我国妇女事业的政治属性和妇联组织的政治定位,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真正地选出听党话跟党走做实事的女性干部队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推动女性解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重大贡献。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培养女性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CYS2274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李锡炎.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初心使命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20(01):18-24.
- [2]肖巍,尹奎杰,石红梅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学科化建构的若干思考(笔谈)[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33(02):5-15.
- [3]韩燕,范建英.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J].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01):21-26.
- [4]侯公林,洪顺姬.妇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展的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20(06):60-64.
- [5]拉毛措.新中国中央历代领导人对妇女事业的重要贡献[J].青海社会科学,2019(05):73-78.
- [6]隋悦.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走向[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04):60-65.

作者:李金蓓,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
吴碧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
张志勇,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主任
责任编辑:胡越

军民融合提升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机理研究

贾燕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1]。由于诸多原因,一些革命老区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匮乏制约了革命老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提升革命老区发展质量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实施军民融合,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战略抉择,也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革命老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弥补革命老区生产要素欠缺的有力举措。文献显示,目前学术界关于军民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有一些讨论,但对军民融合与老区发展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基于对军民融合提升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基础条件的分析,本文拟提出军民融合提升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军民融合提升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分析

(一)有助于促进革命老区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供给因素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引发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3]。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国防工业产业关联度高,产品覆盖范围广,产业配套需求大,国防工业的发展会对全产业链产生强大的牵引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革命老区提供更多可支配资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从技术创新层面看,国防科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高科技水平。军用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军民通用技术的共同研发,能够为革命老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充足的技术储备与深厚的工业基础。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会促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通过技术的外溢、扩散效应推动一系列关联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促使落后产业逐步淘汰。新兴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过程。从供给要素层面来看,军民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知识和技术迁移的过程。通过技术合作、共建实验室等途径可以加强革命老区的劳动要素供给,从而促进区域内要素供给结构的优化。随着区域经济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吸纳更多优质人才的加入和资本的投入,企业会在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的驱使下自主进行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从需求层面来看,需求是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最大动力。军民融合项目通常是精准对接军民两用市场需求。军民两用市场的融合对技术指标、产品性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必然对需求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构成革命老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外源性驱动力。

(二)有利于提升革命老区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其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4]。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正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5]。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在产业、部门和区域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重要原因在于要素结构分布具有差异性。军民融合兼具市场配置资源与行政配置两种属性。一方面,作为一种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军民融合可以充分整合军民两个系统的人才、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资源与要素的集约化程度和使用效率,有助于形成国防建设与区域经济建设协同效应。例如,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通过整合科研资源,可以大幅节省技术研发成本,提高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效率;而军民两用产品的生产,既能满足军用需求又具有商用价值,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军用技术大多都属于高新技术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示范带动性。通过军地协作,充分发挥两个系统的技术优势,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的壁垒,通过技术创新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三)有利于提升革命老区的经济带动效应

革命老区大多位于多省交界处,处在交通、物流网络的重要节点上,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具备成为经济功能区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发展潜力。通过军民融合发展使技术、人才等要素向革命老区迁移,在影响区位决策的因素发生变化时,会导致区域内经济活动发生相应变化。经济主体总是依据符合其业务发展的区位偏好进行区位选择,这就使对区位因素有共性需求的经济主体通过极化效应在空间上集聚,形成集聚经济,表现出空间专业化的特性^[6]。而区域与空间专业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劳动生产效率和投资收益率的提高,以及市场支配能力的增强。亚当·斯密认为,任何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7]。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经济主体会不断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迁移,使更多同质性要素、资源进一步流入,随着集聚经济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演化,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产生区际分工协作的需求,使得区域之间产生紧密的经济关系,即区际辐射效应。根据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区域的经济集聚度越高,产生的区际辐射效应越强^[6]。凭借区位优势将革命老区打造成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通过集聚经济的辐射效应放大军民融合的经济带动效用,这在革命老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例如,陕西依托军工企业的优质资源,培育出专业化程度高、技术优势明显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成为全国重要的军用、民用航空研发生产基地和创新高地,通过增长极效应,辐射和带动周围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军民融合提升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条件及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机遇与基础条件

一是新发展格局为革命老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因自然地理条件限制所形成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问题,较长时间内曾是制约革命老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发展阶段,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以及中欧班列、陆地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政策的普惠性调整,为内陆地区的振兴带来了发展机遇。革命老区多位于省际交界处,历史上因行政能力难以覆盖等因素有的成为“三不管地带”,也因此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年来,随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与行政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行政区划边界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为此类区域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在新的发展格局下,为释放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内需潜能,党中央作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部署,意在破除区际壁垒和加强区际分工协作,革命老区的区位优势正逐步转化为区位优势。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以及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为革命老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供需网络,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综合条件。

二是当前革命老区已具备军民融合发展的较好基础。首先各项政策叠加释放红利,区域差距逐步缩小。2012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明确要求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重大项目和产业扶持等措施推动革命老区加快建设。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为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并产生了显著成效。除福建省外,革命老区大多位于中西部省份,包括西部地区的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等七个省份和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山西等六个省份。“十三五”期间,这十三个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或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区域协调发展的特征开始逐步显现。其次革命老区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大多数革命老区都拥有丰富的军工资源。“三线建设”时期,为保障国防安全,在中西部山区建设军工生产基地以研发和生产军工用品,由于历史的机缘,这些基地就布局在革命老区。“三线建设”带动了革命老区的工业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为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产业基础。例如,四川省依托军工大省的资源,融合各类创新主体,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不断增强,形成明显的区域经济优势。再者产业梯度转移为革命老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中心区在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开始逐步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进行产业梯度转移,许多革命老区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承接地,为革命老区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创造了条件。例如,赣南、闽西革命老区因区位优势临近广东,现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产业承接地。

(二)主要问题

一是军民融合能力欠佳。军用技术与产品的标准和整体水平较高,一定的区域综合实力和经济基础是实施军民融合战略的前提和保障。大部分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并且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

高、人才匮乏等问题,这些都成为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因素。革命老区企业规模小、综合实力差的问题较为普遍,军民融合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根据国家和军队的现行法规标准,民营企业参军所具备的条件相当严格,革命老区的许多企业往往难以获取相关资质。

二是脱离实际超前选择。一些革命老区在选择军民融合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超前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与军用先进技术对接。在项目落实过程中,受要素保障不足、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弱、关联产业发展不足等因素制约,往往容易导致项目失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效益。

三是政府效用发挥不足。一些革命老区的地方政府对军民融合战略缺乏全面和准确的认识,对军民融合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在发挥军民之间纽带作用上不够充分,在推进军民融合工作的组织保障、机制体系和工作方法等方面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奖励政策普惠性不强且激励效应不够显性,导致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不高。

四是军民系统之间沟通不畅。军工科研院所研发、储备了大量的可转化为民用的先进技术,但转化率却很低。近年来,国防科技工业正逐步向市场化转型。在推进军民融合过程中,军民系统的对接渠道还不太畅通,体系壁垒、体制机制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军民融合提升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质量的路径选择

(一) 基于老区实际选择差异化发展道路

革命老区数量多、分布广,既存在产业基础薄弱、发展滞后等共性问题,也存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等区域性差异。在政策供给方面,既要通过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战略,增加普惠性政策的供给,也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军民融合发展路径的选择方面,也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形成了技术融合型、技术迁移型、市场导向型和国防科技型等军民融合发展模式。因此,革命老区军民融合发展路径可作差异性划分:一是对于科研资源丰富、地方企业研发实力较强的革命老区,可以选择技术融合型,通过统筹军地科研资源,联合攻关关键技术。二是对于具有一定产业基础,但技术、人才匮乏的革命老区,可以选择技术迁移型,通过先进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化,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对于具有明显地方特色产业优势的革命老区可以选择市场导向型,精准对接军地需求,协调各方资源、要素推进技术和标准的通用化,以扩大需求提升规模经济效应,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四是对于具有深厚军工基础的革命老区应首选国防科技型,以服务保障国防安全为首要目标,通过加强军地合作提升国防科技水平并使经济溢出效应最大化。

(二) 以革命老区比较优势谋划产业发展

在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应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区域要素禀赋结构,识别比较优势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林毅夫指出,只有发展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和足够的资本积累,为现有产业发展、技术升级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9]。为此,主要应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革命老区的政策优势,加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夯实军民融合发展基础。二是充分发挥革命老区的区位优势,加强区际分工协作,推动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发展。革命老区应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在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中进行战略布局,加强区际合作,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通过协同发展弥补革命老区欠缺的资源和要素,为军民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畅通的产业链条和更为完善的供需网络。三是充分发挥老区特有的红色资源优势,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以实现资本的积累,为高位嫁接军用技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物质基础。

(三)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和机构间作用

曼昆认为,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政府行为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8]。政府应主动帮助企业克服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10]。区域性军民融合工作需要跨越的层级和部门较多,国防科技工业与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加强信息沟通,构建军地工业协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军民融合发展体系,使军工技术和民用技术优势的外部性得到充分释放。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服务保障方面,政府应增加保密管理、政策解读、标准协调等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打造有利于军民融合的营商环境来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军民融合创新成果展等经济协作交流活动,打通民品向军方推介渠道;积极推进符合发展布局、成长性好、拥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军工企业与本地企业进行股权合作,实现高质量融合。二是在制度供给方面,各级政府要积极维护有效市场的制度,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竞争

性,激励有意愿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到军民融合项目中。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实现军地创新资源和要素的双向流通,优化资源配置,促使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在资金保障方面,通过军工集团与各级政府出资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成立专注于投资革命老区军民融合产业的专项基金,产业基金通过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和专业化运营,助力革命老区军民融合事业的发展。四是在人才保障方面,充分发挥军队、军工集团及军工科研院所和地方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科技人才优势,建立军地人才交流制度,共同推进人才建设。

(四) 打造军民融合专业化产业集群

对于资源要素匮乏的革命老区而言,通过共性技术的研发、推广以及同质性要素的集约化使用,打造专业化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有助于提升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此,当前应重点考虑:一是科学选择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系统的核心,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产业规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应在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产业基础的前提下,培育和发展与军工技术同源或工艺相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区域主导产业。二是发展为主导产业提供配套的关联产业,努力提高产业链和协作链的现代化水平,通过提高产业关联度扩大主导产业优势的辐射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三是完善基础产业建设,为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提供服务和保障,高效的公共投资可以减少单个企业的经营成本、提升投资回报率。

(五) 着力构建军民融合科研体系

革命老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内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存在资金、技术和信息方面的短板,搭建公共技术平台是提升区域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军用技术的转化或军民两用技术的研发,是对潜在生产力的物化过程^[10]。革命老区搭建军民技术服务平台,对接军工科研院所,共建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对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有利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为相关企业节省大量研发成本。与此同时,应充分运用国家对革命老区采取的对口援建帮扶措施,加强与发达经济区的的技术合作,统筹运用多元化创新要素和资源,提升革命老区军民融合发展水平。通过搭建军民技术信息平台,组建军民融合技术转化中心,归集技术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的信息,使信息流通渠道更加畅通,从而大幅减少企业搜寻信息的成本,提高技术转化的效率,帮助提升革命老区技术创新水平。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一般项目“中央苏区人民军工发展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BDJ039)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发〔2021〕3号)[EB/OL]. [2021-02-20] (2023-10-02).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2/20/content_5587874.htm.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21):18.
- [3] 于立宏,孔令丞. 产业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
- [4] 刘鹤.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N]. 人民日报,2022-11-4(6).
- [5]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13-11-16(1).
- [6] 郝寿义,安虎森. 区域经济学(第三版)[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56-65.
- [7]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9:76.
- [8] 曼昆. 经济学原理(第7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
- [9]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91-278.
- [10] 黄朝峰,高建平. 军民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7.

作者单位:福建古田干部学院、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胡越

“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经验

董小玲 梅浩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从“三个‘为什么’”到“归根到底是两个‘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深入思考和科学判断不断丰富发展,是我们认识三大命题的指南针,为我们厘清三大命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整体性认识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内在逻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四个伟大成就”,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发展。理顺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深化对其规律性认识,既是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需要,同时也是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

(一)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林林总总的新生政党中脱颖而出,能够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其根本前提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一批救亡图存的先进分子被马克思主义所折服,经过革命运动的实践检验,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由此应运而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转化为自身独特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作风优势等,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胜利。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历程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共产党人确保自身纯洁性与先进性的根本,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的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3]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行稳致远,愈发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4]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是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的关系。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都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在经济建设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升效率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在政治建设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为我国的国体,实行制度上科学设计、实践上完整参与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文化建设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在社会建设上,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力构建生命共同体,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推动生态环境转化为生产力发展要素。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

和发展,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行”的鲜活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离不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和亲身实践,并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实践经验总结等方式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准确理解、牢牢掌握,为把“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打下了坚实基础,使认识世界的科学绝对真理成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确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过去行、现在行、将来仍然行的重要方式就是结合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历史和时代提出的课题,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在科学应对时代课题、成功指导伟大实践、奋力抓住发展机遇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回应和解决时代之问,推动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坚决避免固步自封,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二、“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实践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一次次的理论创新,再以创新理论指导变化发展着的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理论品质。实践证明,要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首要前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动力,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战略支撑,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实践机制。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首要前提

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灵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广大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所在、觉悟所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一批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踏上救亡图存的征程,以热血和生命展示出了强大的信仰力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原原本本地学习经典原著,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世界,并将其运用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当中去,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坚强动力。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源头的伟大建党精神,第一条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所揭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都把马克思主义信仰刻画在基因血脉之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关键的是深刻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不能静止、孤立、片面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正是来源于其宝贵的理论品质。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三者之间有一个亮眼的共通点——人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成立之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拥有9804.1万名党员,之所以能够一次次绝处逢生并创造出彪炳史册的非凡奇迹,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之所向作为政之所行,切切实实为人民群众办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奋起反抗、寻求自身解放、夺取自身权利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武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内容,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立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现阶段而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其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舒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变为现实,幸福指数直线上升。总的来说,任何一种理论要想具有蓬勃的生命力都必须是能够造福于民的理论,任何一种实践要想具有旺盛的活力也必须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否则终将被历史淘汰。

(三)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战略支撑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提升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方式,是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长期执政的水平和能力的战略性支撑。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优势就在于他们不仅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更在于他们善于学习,并且能主动将学习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活动中。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主动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才能不断地从先进文化和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始终以先进理论和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和百端待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设学习型政党既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又是追求进步的必要之举,确保党在解决内忧外患时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引领党的建设,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任务,进一步促进学思用的高度融合与知信行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建设学习型政党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党百年来的智慧结晶的继承和发展。全党上下只有通过不断学习进而砥砺党性、增强本领,才能确保在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朝着正确的方向开拓创新。

(四)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实践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7]建党至今的百余年间,中国共产党历经数次挑战,每次都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进行自我革命纠正错误,不断总结经验完善自身,从而确保党一次次历经坎坷挑战却能一步步走向更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从不犯错,而在于能够勇敢地承认和面对错误,坚定地自我革命以改正错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的政治性、思想性问题,确保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的发展问题得以解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解答,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相较于其他政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始终保有生机活力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社会革命当中不断得以成长,又反过来通过伟大自我革命确保伟大社会革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党在各时期各阶段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展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规律性认识,是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更好地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在新征程上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一) 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并发展完善的;从理论维度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关键;从实践维度来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方方面面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树立了党的核心和权威地位,全面开创了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新局面。面对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全党必须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服从中央、始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对于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制度优势,充分把党内民主和集中统一结合起来,在确保全党思想和行动步调一致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党的创造活力。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自觉担当表率,坚持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遇事主动商量,在充分发扬民主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的基

础上,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二) 必须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

要想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勇立潮头,就必须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以其武装头脑进而转变成明辨是非、看清形势、指导实践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坚持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性和必然性,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脉搏、洞悉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遵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基于实践发展新态势,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系统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党的创新理论的金钥匙。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务必”“六个必须坚持”等新论断是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根本遵循,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是中国共产党人修身立德、治国理政的理论宝库。只有牢固树立这些基本立场观点,才能持续推动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使党的理论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三)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9]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能公式而不加以具体实际的结合,最终只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破坏和损失。当今中国面临着“两个大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回应和解决国际国内发展难题的破局之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给出的“治病良方”,必须全面准确学习、坚定不移贯彻。第一,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间属于同频共振的关系。第二,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掌握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方面要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到固本培元;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搞清楚、弄明白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真正践行守正创新。第三,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有胸怀天下的理念。当代中国的综合实力愈发强大,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还要放眼世界,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项目基金:乐山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立项课题“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和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关系研究”(项目编号:SZND20210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CDJ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0,109.
- [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03.
-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36.
- [8]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66.
-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0.

作者:董小玲,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梅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越

红岩精神耀新华

——“纪念《新华日报》移渝发刊85周年暨第一届红岩精神与《新华日报》学术研讨会”综述

蔡 斐 李鑫斓

2023年10月21日,“纪念《新华日报》移渝发刊85周年暨第一届红岩精神与《新华日报》学术研讨会”在重庆红岩干部学院成功举办。这是学界首次将红岩精神、《新华日报》这两个重大科学命题并题研讨,具有开创性意义。

此次会议由西南政法大学、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新华报业传媒集团、重庆史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媒观察》编辑部、重庆红岩精神研究会、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西南政法大学“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课程组承办。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河北大学、湖北大学、延安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10余所知名高校的7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新闻活动、党报优良作风传承等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共同追溯《新华日报》的历史印记,传承红岩精神,赓续红色基因。

一、弘扬红岩精神,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统治区复杂艰险的政治环境,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在可歌可泣的艰苦斗争中形成了红岩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新华日报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钱丽萍说。重庆的虎头岩(重庆时期《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红岩嘴(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旧址)、曾家岩(曾家岩50号周公馆、桂园、特园)一起被合称为“红色三岩”。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红色三岩”发挥着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醒民众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历史使命,如同迷雾中的明灯,屹立于战时陪都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赵骏表示:“红岩精神是英雄之城重庆的红色标志,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重庆这座英雄城市,孕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革命先辈崇高的思想境界,绘就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为了进一步推进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不断丰富重庆红色旅游内涵,扩大重庆红色旅游品牌的影响力,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重庆红岩精神研究会会长雷莹表示,目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正在努力打造“红色三岩”,实施红岩工程,弘扬红岩精神。今后,希望与各方一道在红岩精神传承、《新华日报》研究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领域进一步开展深度合作,共同为新时代红岩精神的传承与弘扬,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等贡献智慧和力量。

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严功军指出,红岩精神的内涵仍处于不断地阐释和解读中,未来还需要围绕收集新闻史料去做印证,做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媒介记忆对红岩精神的建构和记忆呈现出“变与不变”“一元到多元”的流变特征。这既为弘扬红岩精神,使红岩精神在新时代发挥重要的思想引领、精神铸魂、实践指导作用创造了优良条件,也使红岩精神的内在本质与特色内涵在新时代得到认可,不被淡化、不被消解,成为新闻传播学者从事媒介研究时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二、重返《新华日报》史,继承党报优良精神

“《新华日报》是一座值得深入发掘、深研细读的红岩精神宝库。”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表示。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人不惧险境、善处逆境的政治勇气,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政治情怀,也同样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内涵。

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移渝发刊,并在社论《本报移渝发刊》中写道,“今后深愿与读者诸君及全国同胞共同一致地继续为巩固国内团结而努力,务使我们民族团结得比铁更坚,比钢更固,比任何铜墙铁壁更牢不可破。”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在极其艰难险恶的情况下,《新华日报》发挥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爱国民主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壮大革命阵营的重要作用。

“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被评价为我国无产阶级办报事业臻于成熟的标志,在近现代报刊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新华日报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钱丽萍在致辞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移渝,又回到南京的历史,强调了“《新华日报》报史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组成,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

新时代以来,学界对《新华日报》的研究呈井喷状态。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思扬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研究情况,发现研究方向大致分为三种:第一是从历史学角度收集与梳理《新华日报》史料,第二是立足于新闻传播学,研究《新华日报》的新闻传播实践,第三是从政治学方面研究《新华日报》的政治思想。

首先,在报史研究路径中,重庆图书馆研究咨询中心主任、研究馆员唐伯友围绕《新华日报》的发展史、工作关系史,阐述了《新华日报》研究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三组关系。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邓绍根教授通过史料挖掘,介绍了胡乔木指导重庆新华日报社学习《解放日报》改版经验的原因、契机和具体改进方式。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聂远征回望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筹办、发行和宣传的整体概况。他指出,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在鼓舞民众的抗日情绪,在记录实事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对后续的新闻发展也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抗战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陈康指出,抗战时期国统区群众的《新华日报》阅读史是一部党的意志与读者阅读互动的历史,是一部党领导群众的抗战史,是一部群众向党靠拢的政治史。《传媒观察》主编助理颜云霞指出学界在《新华日报》史料挖掘和理论探讨方面作出了不少研究,但总体而言,《新华日报》报史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研究体系,对报史与党史、革命史之间的互动也缺乏深入的关照。而此次论坛将《新华日报》与红岩精神相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角,新华精神与红岩精神之间存在相通性,有待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梳理与研究。

其次,在对《新华日报》的新闻传播实践研究中,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颜春龙分析了全面抗战初期《新华日报》的统战宣传策略,对比了《向导》和《新华日报》在统战宣传中的异同。他指出,二者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不同,在统战宣传实践的不同阶段各有特色。人民出版社编辑詹鲁对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所载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抗战相关报道展开研究。她认为这些报道有力地增进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促进了国家认同,维护了抗战时期民族团结、统一抗战的大局。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洪富忠从《新华日报》如何吸引读者关注,《新华日报》报道内容的针对性与现实性,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成功实践的说服力和引领性等方面,层层递进地阐释了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共党报党刊如何引领大后方的舆论话语权。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吴婧瑀研究了《新华日报》中的苏联抗战音乐文化报道。她指出,苏联的成功革命经验和先进音乐文化在《新华日报》中得到了较好的宣传,这些报道与广播、书籍等传播形式互补,为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徐金分析了1936年至1939年中共及南方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展现了中共从被动向国际社会“答疑解惑”到积

极主动开展国际宣传和国际舆论参与工作的发展过程。

最后,在对《新华日报》的政治思想研究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韩立新对武汉会战期间《新华日报》的新闻动员展开研究,他指出,在武汉会战期间,王明借助新闻的形式,以正确的意识形态,将错误政治主张贯彻在《新华日报》宣传中。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黄肖肖通过研究《新华日报》中的工人诉苦动员报道,认为《新华日报》通过诉苦动员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诉苦不仅指向了工人阶级反抗苦难生活的行动实践,还指向了对一种崭新的生活和社会的追求。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研究馆员王晓园系统梳理了《新华日报》中的有关周恩来的宣传报道,她指出,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分阶段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主张。周恩来充分利用报纸的功能,发挥舆论优势,形成较为系统的舆论思想和实践,同时加强了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把党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王军峰以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上的木刻为研究对象,认为作为视觉性革命媒介的木刻起到了思想传播与抗战动员的作用。

三、传承历史使命,以史为鉴观照现实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坚持党性原则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强调,为宣传思想战线提升工作水平、主流媒体推进融合发展确立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报作为党一百多年奋斗历程的同行者,始终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忠实见证了党和人民双向奔赴、党和人民事业生生不息的伟大历程。作为我们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正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这一重要原则的见证者、践行者和推动者”,《传媒观察》主编赵允芳说。赵允芳主编指出,《新华日报》首次提出了“党性就是人民性”的说法,被认为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身处复杂舆论斗争前沿阵地的《新华日报》,成为党的这一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形成和发展的沃土。当前,新华报人从实践和理论等多个维度,深入把握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这一根本原则的源与流,更好地发挥新时代“新华方面军”的重要作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新闻舆论同频共振,使主流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重视学习历史、认真总结历史、善于运用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通过回顾《新华日报》报史,总结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进而映照现实,指导新闻实践。《重庆日报·思想周刊》执行主编侯金亮从《新华日报》面向青年开展理论宣传工作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结合《思想周刊》“理响青年”的宣传实践,认为党报应当回应青年真正关切,为青年提供正确的指引,重视读者呼声。重庆职业学院副教授汪浩指出,《新华日报》的时代性特征在于准确把握时代之势,勇担时代之责,准确回答时代之问,凝聚时代之魂和建构时代之言。《新华日报》的经验启示党报党刊要把握时代脉搏,适应时代变革,顺应时代要求,担负时代之责,适应时代话语体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刘明洋以推进红色新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主题,结合山东大学和《大众日报》的实践经验,他指出,要注重构建红色新闻文化的学术体系、传播体系、育人体系和实践体系,不断推进红色新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郭森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栏目为例,探讨媒介视角下党报的中介化功能。郭森教授指出,基于媒介性实现的连接、交换、融通与重构,可以成为党报建强自有阵地,提升对“三元”舆论场的领导权、话语权的赋能之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副研究馆员丁英顺通过梳理《新华日报》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发现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明确指出了调查研究的目的,还详尽论述了在调查研究中应该遵循和秉承的思维、态度、作风和方法,为启发新时代党员干部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有效

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有力借鉴。

四、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从国内看,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关键是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积极拓展发展新空间。”在这一时间节点之上,新闻传播学科在应对媒介环境转变、舆论舆情治理、国家形象建构等问题上,要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创新传播手段与方法。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严功军教授指出,当前处于多主体、多层次、多模态、多平台、立体化、数字化传播时期,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智能化、移动化、网络化的传播矩阵传播不断推动着红岩精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这为弘扬红岩精神,使红岩精神在新时代发挥重要的思想引领、精神铸魂、实践指导作用创造了优良条件。但是,传播环境的快速转变,也使“如何使红岩精神的内在本质与特色内涵真正得到认可,不被淡化,不被消解”成为新闻传播学者未来从事媒介研究时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对红岩精神的媒介建构研究既是有价值的学术话题,也是关系到红岩精神时代赓续的现实保证。那么如何以新闻报道的力量让红岩历史不断迸发强大的现实生命力、号召力,弘扬红岩精神?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赖义羨认为,加强主题报道选题策划机制创新,是弘扬红岩精神主题报道创新、打造报道精品的重要前提,是提升弘扬红岩精神主题报道作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路径。他以“弘扬红岩精神主题报道,选题策划机制创新研究”为题,分析了《号角催征——解码〈新华日报〉老报纸里的百年初心》系列报道的选题策划机制创新,从中归纳出破题出新、抽丝剥茧、深入调查等重要启示,使“昨天的新闻”启迪“今天的新闻”,为弘扬红岩精神主题报道策划机制提供创新路径。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巨大人格魅力和浩然革命正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红岩精神的故事。面对红岩精神的国际传播,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林昱君认为红岩精神代表了一种文化自信,在对外传播的话语建构中,我们要解释清楚红岩精神的话语内涵、制度内涵、精神内涵、物质内涵,既要从小自我定位的视角去凝练出红岩精神所代表的话语符号,又要从文化他者的视角进行话语的创新表达,解决好红岩精神在对外传播中应该说什么话语,怎么去建构话语以及建构什么样的话语等问题。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效地走向世界,使其成为不同语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平交流沟通的媒介,从而更好地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理念,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传播体系,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五、促进学科发展,培养新闻传播人才

红色基因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对青年人才成长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加强大学生的红色文化教育,弘扬红色基因是当前高校教育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赵骏回顾了《新华日报》在重庆的革命岁月和西南政法大学与红岩精神的深刻渊源,介绍了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科建设、学院发展、办学成果。“在近30年的办学过程中,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指引,注重守正创新,从重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新华日报》等党史宝库中寻找有效的研究对象,让历史成为最好的教科书。”他强调,一定要持续做好红岩精神与《新华日报》相关研究,产出具有西政和重庆标识度的重要成果,把研究做实做深,把影响力做大做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刘明洋指出,红色新闻文化是育人的重要的资源。山东大学不断推进红色新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过规划建设红色新闻文化系列课程,丰富课程思政内容,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打造红色新闻文化优秀教学成果

并联合山东省其他高校,共同挖掘红色资源,建设红色新闻文化课程体系。《重庆日报·思想周刊》执行主编侯金亮认为要让青年群体加入理论宣传实践中,让青年群体发表自身心得体会,现身说法,增强理论宣传说服力和号召力。《重庆日报·思想周刊》的“理响青年”栏目上线130期以来,所有视频均由广大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拍摄。西南政法大学的18个学院中,有9个学院参与视频拍摄,重庆共有15所高校参与,目前已经走向全国。他指出,在理论宣传实践中,要让青年成为“学”的主角、“讲”的主力、“听”的主体。

在媒介环境变迁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教学方法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革新。经重庆市教委立项批准,从2023年开始,西南政法大学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共建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李珮介绍,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将从5个方面开展合作:联合开展“《新华日报》文丛第一卷”20册编辑工作、共建《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共建《新华日报》系列微视频库、共建《新华日报》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学生实习活动和学术研究。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建院以来,便继承红色基因,有意识地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体系,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团队,在全球视野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以“三全育人”、课程育人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点,在“蓝鲸计划”“大篷车课堂”“红色新闻之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基地之博士生工作站、媒介素养基地中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在新建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项目中,要由学院和行业双导师一起来带领研究生深度参与,培养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专业能力,力争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出版》编辑王千一以《中国出版》杂志为例,分析了期刊近十年宣传中国共产党新闻活动历史的三个取向。《中国出版》杂志从大策划和宽视野出发,强调小选题、小切口、小道理的“三小”选文取向和新见地、新史料、新路径的“三新”选文特性。《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胡秀荣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大会动员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指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积极担当起党刊的职责与使命,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己任,策划与刊发以“百年大党精神谱系”为主题的系列文章,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在《新华日报》移渝发刊85周年之际,此次研讨会开创式地将红岩精神、《新华日报》这两个重大科学命题并题研讨,通过回顾《新华日报》与中国共产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进力量。此次会议打开了《新华日报》这座值得深入发掘、深研细读的红岩精神宝库,深化和推进了红岩精神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的研究,为全社会弘扬红岩精神,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了学理的支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深刻的时代复杂变化,此次会议紧扣时代脉络、回应时代议题,覆盖了党史报史、政治思想传播、国际传播、党报党刊管理发行、课程及育人体系建构等内容,体现了与时俱进、教研相长的进步性和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和学术导向的方向性。立足时代前沿,紧扣时代脉搏,此次会议为红岩精神与《新华日报》这两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推进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丰富了中国特色新闻史研究的内涵,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学术参考,也为国内党史界、教育界、新闻界专家学者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创造了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增进了学界和业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蔡斐,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鑫斓,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波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研究

臧建业 周 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人民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和活的灵魂，“这种人民性能最大限度地驾驭资本，摆脱资本的绑架，是真正的人的主体地位的实现和人的价值实现，在本质上超越了资本性”^[2]。从多重维度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生成理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承继马克思的人本文明观，在赓续中华文明强调民本价值导向和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共同生成的。

（一）理论之源：承继马克思的人本文明观

人民性是马克思文明观的显著特征，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人作为文明发展的前提和主体。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来考察文明，从生产活动出发来把握人，他反对把人和社会看成一种互相孤立和矛盾的存在，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文明则是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马克思的文明观揭示了人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本质，并从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来把握文明的本质内涵、基础内容和发展进程，超越了以往唯心主义者把人仅归结于人性、人的欲望等抽象的人的文明研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文明观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他始终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评价文明进步的根本尺度。他指出，文明的进步与否是以人的发展为直观呈现和决定的，人的外部生存条件愈是完善，人本身的个性、能力和社会关系愈是发展，那么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就愈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以往文明都不可及的物质财富，“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4]，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是资本主义文明始终以资本为中心，“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5]，它的发展是以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为代价的，造成了“文明的阴沟”^[6]。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文明发展的最终形态，它的存在只能是一种过渡状态，最终会被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代替。

（二）文化之魂：赓续中华文明强调民本的价值导向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没有中断并且传承下来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深植根于历来强调民本价值导向的中华文明，并对其进行继承发展，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人民性特质。自古以来，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就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导向，中华文明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把“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视为治国理念。在儒家看来，民是国家之根本。《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礼记》也表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体现了民对于政权存续的决定作用。除儒家外，道家主张的“虚君，民治”，法家提出的“民本，法也”，墨家倡导的“兼爱非攻”等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对民的重视。需要澄清的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民”，并不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与“君”“官”相对应的，是被君和官统治的“臣民”，有权贵之附属性，因此，古代的“民”与“人”从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只具有工具属性，并不具有目的属性。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民”作为价值主体，真正地实现了“为人民服务”，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为君服务”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华文

明获得了新生。

(三) 实践之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具体内涵。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还指出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8]。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指明了方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以人为本的新道路。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重视人民,注重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又是它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同志强调,人民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主体,要把人民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指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一论述将精神文明提升到了和物质文明的同一高度,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思路。江泽民同志指出“国家是人民的,人民的力量是国家前进发展的根本力量”^[9]。强调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要紧紧依靠人民,在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建设政治文明,着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它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10]。要按照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各项建设,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取得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成就。“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路径,它的创造离不开人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历史实践中的人民性内涵优良传承的深刻把握,蕴含着丰富的人民性特质。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核心要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为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依靠力量,以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价值遵循,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胸怀,彰显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性特征。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为根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12]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坚持人民立场为根本,致力于推进人的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资本现代化的全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工业革命以来就过度强调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的存在,产生了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指出:“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13]。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是严重畸形的,它虽然能在短时期内取得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是却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资本所具有的天然的独占性和扩张性不仅导致本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环境恶化、战争等威胁,给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其价值追求,将人民的主体性贯穿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始终:在物质文明建设中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将经济发展的质量放在第一位;在政治文明建设中不断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项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绿色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为依靠力量

马克思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历史活动从本质上说都是由人民实践的,历史业绩也是由人民创造的,没有了人民,历史的画卷便不会打开。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14]他的观点表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秘诀就在于发挥人民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西方列强从1840年起便开始通过各种形式侵略中国,中华文明蒙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无数仁人志士努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但均以失败告终,之所以会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没有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已经发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依靠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真正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坚持人民至上,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形塑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轮廓。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15],提出了“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判断。新时代新征程上,只要站稳人民立场,紧紧依靠人民,就一定能更好地丰富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价值遵循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内在本质,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的伟大创造,全体人民共享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本质和独特优势。一方面,全体人民共享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本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形态,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人的解放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文明形态必然导致少数人占有发展成果,背离了现代化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使其现代化陷入“文明的阴沟”。而社会主义文明就是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这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的现象”^[16]。因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本质。另一方面,全体成员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优势。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7]。指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成果归谁享有”的根本价值旨归问题,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归宿,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根本体现。当然,由于目前中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就要求解决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让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享有发展成果,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建共享局面,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胸怀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不仅体现在个人、社会和中国,更体现在世界范围,它将谋划人民美好未来的愿景从一国发展到多国,最终指向全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是胸怀天下、立己达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交往中始终执持和平发展理念,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行事准则,致力于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解决关系到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为世界贫困人口捐款捐物,积极援助遭遇战争和灾害的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普惠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在“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实践中为人民所付出的心血。中国共产党以世界胸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形态,更是世界人民的文明形态,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都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18]。换言之,中国人民愿意同全世界人民一起推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人民”的概念外延从中国人民扩展到全体人类,“人民性”的内涵也得到了拓展和升华^[19]。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前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但这种创造还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新形态’仍在发展完善过程之中”^[20]。要在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坚持和发展人民性,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政治保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既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征,又有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民性特征,更有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民性特征。而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最重要的特征和

最基本的优势,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发展的全过程。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在动荡的国际局势内保持迅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实现了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的重大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主体作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价值归属,才使得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彰显人民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实现了执政为民。从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主体力量的人民群众实践探索出来的重大成果”^[21]。在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中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二)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基本方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守正创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发展中都坚守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紧紧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必须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动力转换,体现了人民主体观,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本民族谋得生存和发展,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就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形式为推动力量,由消极创新转变为积极创新。协调发展致力于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结构调整,体现了平衡为民观,我们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22]绿色发展致力于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方式转变,突出了生态惠民观,要坚持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开放发展致力于寻求人类文明繁荣昌盛,彰显了互惠利民观,要继续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理念,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社会现代化辩证地统一起来。共享发展致力于追求人类文明新形态公平正义,聚焦于人民目标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三) 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必由之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体现在“五大文明”的具体建设中,确保“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统筹推进,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在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中全面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在经济建设上,要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的质量与效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让人民享受到物质发展成果;在政治建设上,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23],让人民享受到政治发展成果;在文化建设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建设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让人民享受到的文化建设成果;在社会建设上,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们居住、就业、养老等各方面的要求,不断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让人民享受到社会发展成果;在生态建设上,要把握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让人民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四)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4]。“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中国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是中国人民为人类整体发展利益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在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立足共同利益,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各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各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挖掘增长动能,同时跨国合作项目具有周期长、投入多、影响大的特点,各国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协调与经济合作,打破贸易壁垒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其次,开展文明对话,增进文化认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要以文明对话的形式友好处理与其他之间的关系,尊重其他国家的宗教、习俗,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开展音乐会、旅游年、艺术展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加强文化领域的合作,增强共建国家的文化认同。最后,坚

持绿色发展,助推传统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树立生态共同体意识;针对沿线部分国家依赖能源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要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共享创造成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百年发展史研究(1921—2021)”(项目编号:20&ZD017);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项目“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21CX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01).
- [2]李丽.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07):48.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7.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5.
-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31.
- [8]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 [9]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1.
-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50.
-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
-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0.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53.
- [14]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3-21(001).
- [15]郭灵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J].红旗文稿,2022(23):39.
-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3.
-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0.
- [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3.
- [19]李双套,陈茜.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民性”的把握与延伸[J].求知,2022(11):35.
- [20]丰子义.人类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30(003).
- [21]叶本乾,方素清.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鲜明特质和价值意蕴[J].社会主义研究,2022(06):30.
- [22]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求是,2019(10):9.
- [23]邸乘光.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05):40.
- [2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0.

作者:臧建业,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周师,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栗超

“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的发展展望

郭伟

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加速出海,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重庆作为老牌的汽车工业城市,2023年上半年,重庆新能源汽车出口6139辆,同比增加131.3%,增长迅猛。新能源汽车因属于危险货物,被禁止通过三峡大坝船闸,因而更多通过“公路运输+滚装运输”,即以轿运车公路运输至沿海港口广州、上海等出海。为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更好地促进重庆新能源汽车的良性发展,文中主要对“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加速“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出海”提供一定支持。

一、“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的基本情况

2022年,中国车企出口竞争力持续增强,全年累计出口超300万辆,达到311.1万辆,同比增长54.4%,新能源汽车出口67.9万辆,同比增长1.2倍。汽车出口量的快速增长也为传统重庆整车出口物流运输和通关方式带来了一些挑战。自2021年开始,滚装舱位开始紧张,严重影响到车企的出口计划。传统的重庆整车出口物流运输方式为“公路运输+滚装运输”,即以轿运车公路运输至沿海港口,如上海、广州等口岸,然后通过滚装船海运出口;或依托长江通道,采用江运滚装船的方式,到上海滚装出口。通过滚装船出口超过总量的70%。集装箱市场,因为疫情原因,前两年各大船公司争相造船造箱,并相继投入市场,现在整个集装箱海运市场价格回落,舱位和箱源充足,并且集装箱航线遍及全球各地,能够很好地满足车企的需求。因此推动“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对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解决好“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存在的问题,既可以降低物流成本,也可以提高物流时效,较大地提升了“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目前重庆出口的新能源汽车主要是纯电动汽车,运输专用名称“电池驱动的车辆”,联合国编号为“UN 3171”。混动汽车,运输专用名称“易燃液体驱动的车辆”,联合国编号为“UN 3166”,暂时未涉及。船舶运输锂电池驱动的车辆,按照《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以下简称《国际危规》)的分类属于第9类杂项危险货物;铁路运输新能源商品汽车不按危险货物管理。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可行方式为重庆经铁路运输到钦州再装船出海,或通过轿运车公路运输至钦州装船出海,但轿运车运输成本较高,本文暂不考虑。

二、“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存在的问题

(一)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重庆新能源汽车出口装车点主要在重庆鱼嘴铁路货运站和重庆无水港。鱼嘴铁路货运站毗邻长江黄金水道,与果园港通过3.7公里的铁路专用线无缝衔接。但两地的海关监管区均无危险货物堆场。海关通过设置临时监管区,用来存放等待放行的新能源汽车。根据《关于支持新能源商品汽车铁路运输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意见》规定:“托运新能源商品汽车时,托运人应当提供新能源商品汽车产品出厂合格证(出口新能源商品汽车不受此限制)。”但目前铁海联运未纳入此范畴,铁海联运铁路运输出口新能源汽车国内段仍需要按箱提供新能源商品汽车产品出厂“合格证”复印件,但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国内段则不需要提供出厂“合格证”复印件。出口新能源汽车工厂无合格证,故只能采取转关模式(转关模式下,铁海联运可免于提供合格证)。但果园港码头未获得危险货物存放资质,提空装箱后新能源汽车不能回码头监管区堆放,增加了额外成本348元/柜。

(二)铁海联运衔接存在不足

铁路和海运标准的不统一,对铁海联运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锂电新能源汽车整车、温石棉(UN 2590)和木炭(UN 1361),铁路按照普通货物运输,但是海运还是要按照危险货物进行申报。重庆是国内重要的锂电生产基地和温石棉生产基地,海铁联运的互联互通要求极高。

钦州港虽是危险品码头,但危险货物堆场较小,码头要求货物只能装船前 24 小时以内进港,进港后一旦面临检查,就会影响装船。同时,铁路已对锂电新能源整车豁免,所以不允许其集装箱在铁路运输时贴集装箱危险品标志,若提前 24 小时以内进码头,则无法完成标志张贴。新能源汽车通过集装箱运输,装箱专业技术含量高,钦州没有这方面的装箱公司,一旦在钦州发生掏箱,就会导致无法装箱。

(三) 海事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船载危险货物须向海事管理机构办理申报手续。“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审批”为行政许可事项、“危险货物安全适运报告”为行政报告事项,两者合并一同在船舶进出港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办理。危险货物集装箱装箱证明书是危险货物安全适运报告的一部分,生成流程为:监装员向钦州海事局申请人员报送从业区域—钦州海事局审核通过—监装员填报信息—提交到钦州海事局(不需审批)—生成危险货物集装箱装箱证明书。重庆集装箱监装员通过“一网通办”申请人员报送从业区域时,钦州海事局因装箱地不在钦州,无法实施监管,拒绝审核通过,故无法生成有效的装箱证明书。目前,重庆海事局与钦州海事局初步建立了监管互认机制,已经出口的两批新能源汽车的装箱证明书都是向重庆海事局提交生成的,但重庆海事局仍未获得相关法定授权。

(四) 口岸单位一体化物流保障能力不足

近几年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较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应用服务,以“总对总”方式与各口岸管理和国际贸易相关部门系统对接,实现申报人通过“单一窗口”标准版一点接入、一次性提交满足口岸管理和国际贸易相关部门要求的标准化单证和电子信息^[1]。但各口岸单位之间,担心数据泄露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进而造成各单位之间分享意愿不强,互联互通不到位,例如海关办理通关手续时或铁路起运时无法掌握船舶到港时间等,这些都导致了数据无法实现整合,制约“大通关”效率提升。

三、“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存在问题的成因

(一) 铁路和海运标准不一致原因

在海运中,除了少数禁止运输的物质,如溴酸铵、溴酸铵溶液等,其他危险货物都能使用集装箱运输;而铁路办理的集装箱货物仅 17 种,按照现行铁路规章规定,铁路危险货物集装箱仅办理《危险物品名表》中规定的品类和种类较少。

(二) 铁海联运衔接不畅原因

钦州港之所以缺少危险货物堆场且钦州港不允许货物过早进港,主要是因为“8·12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以后,部分危险品码头减小了危险货物堆场面积,普遍要求采用船边直装模式,不允许货物过早提前进港堆放。重庆港也存在这个问题,部分公司因在码头附近没有危险货物堆场,无法实现船边直装,导致放弃危险货物运输这一业务。铁水运输方面火车提前过早进港主要是因为无法较为准确掌握船舶到港或卸货时间。

《国际危规》中针对新能源汽车明确说明“本规则有关标记、标志、标牌和海洋污染物的规定不适用”,对集装箱装载新能源汽车危标进行了免除,但部分港口码头、航运公司为了与其他普货进行区分,方便管理,还是要求张贴危标,与铁路标准又不一致。

(三) 危险货物申报问题原因

《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时,铁海联运尚未兴起,危险货物装箱后异地上船较少,未对新能源汽车铁海联运这种情况进行说明,只能按照传统模式进行申报,由装船地海事管理机构核查。铁海联运国内铁路段尚不属于国际联运,主要原因是相比渝新欧铁路国际联运,国内铁海联运起步晚,发展相对落后,相关制度还未进行跟进优化。

四、“重庆造”新能源汽车搭载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的未来展望

(一)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重庆鱼嘴站和重庆无水港建设,争取设立鱼嘴铁路货运站海关监管场所,在其海关监管区内增设危险货物堆场,扩大钦州港危险货物堆场场地;开展第 8 类、9 类固态危险货物集装箱混堆安全评价,根据新版国标规定,装载 GB6944-2012 中第 8 类、9 类固态危险货物的集装箱,当所载货物无副危险性,包装类非

I、II类且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时,可与普通货物集装箱混堆。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货物调度能力,确保货物运输高效精准,减少危险货物在港时间^[2]。

(二)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通过简化、统一单证格式与数据标准,实现申报人通过“单一窗口”向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一次性申报,口岸管理相关部门通过电子口岸平台共享信息数据、实施职能管理,执法结果通过“单一窗口”反馈申报人,简化通关手续、降低通关费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服务目录》列出了“单一窗口”标准版为用户提供的所有服务类别、服务名称、服务功能事项与业务主管单位等。但部分服务项目虽在服务目录中,目前仍需要借助主管部门网站办理,例如危险货物安全适运报告,仍需要通过海事部门业务网站办理;部分项目还未列入其中,例如集装箱重量验证核查,如果将集装箱重量验证核查加入服务目录中,使货主通过“单一窗口”提交VGM,海事通过“单一窗口”核查数据,船方通过“单一窗口”获取数据,这样既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又保证了海事和船方获得的是同一份数据。通过将所有服务项目纳入单一窗口中,既可以方便操作,提升效率,也可以倒逼部门间执法流程优化,进行执法流程再造,合并执法流程,使大通关的流程更加优化,逐步由“串联执法”转为“并联执法”,实现口岸相关部门信息数据共享共用。探索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实施“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新模式,减少重复查验^[3]。

(三)加快制度创新

借鉴《关于支持新能源商品汽车铁路运输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意见》国铁运输监〔2023〕4号文件精神,将新能源汽车铁海联运国内铁路运输段纳入国际联运,可免于提供新能源商品汽车产品出厂合格证,这样不仅可以节约企业成本,还可自行选择转关或一体化通关模式,提高了便利性^[4]。结合铁海联运发展的新形势,深入调研企业在危险货物安全适运报告与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申报等项目上存在的问题,讨论完善《规定》等部门规章,探索危险货物安全适运报告与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申报分离的可行性,即危险货物安全适运报告向装箱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转关模式下)。针对铁路运输和海运规定不一致的危险货物,可增设加贴特殊专用标志,例如新能源汽车,只要可以说明在铁路运输时不作为危险货物,海运时作为危险货物就可以实现。

(四)提升一体化物流保障能力

以提升整体物流效率为抓手,做好铁转水的衔接工作,加快跨行政区域、跨部门口岸大通关建设,提高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口岸管理部门需尽快联合物流行业协会,出台规范集装箱运输新能源汽车装箱方案,使车企装箱和监管部门检查有所依据;各口岸监督管理部门加快推进联合执法,探索研究其他口岸联检单位在海关监管区内执法的可行性方案,变串联执法为并联执法;强化与通道沿线政府部门、平台公司等联动合作,优化新能源汽车出口物流方案,进行整体再设计;加快企业报关报检进度,优化车流组织,努力做到“一站式、一条龙、全天候、不间断”服务,确保铁海联运班列优先计划、优先装卸、优先挂运,提升物流效率^[5]。

参考文献:

- [1]黄兴. 重庆:新能源车夯实“出海”底气[N]. 经济参考报,2023-02-10(007).
- [2]郭四海. 基于供需匹配的集装箱铁海联运市场定位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2022.
- [3]洪晨俞. 铁水联运港口堆场混堆方式下的装卸作业优化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2021.
- [4]陈霄. 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及策略思考[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33-36+51.
- [5]楚峰. 多式联运,联出西部运输“加速度”[J]. 交通建设与管理,2020(04):40-43.

作者单位:重庆海事局

责任编辑:张波

关于推动重庆战略科技力量提质强能的建议

王宗德 郑 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系统谋划、重点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供了遵循。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是科技战略大后方,是国家科技战略安全重要基石,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瞄准创新前沿领域,打造一支承担国家任务、服务重庆发展、产生重大成果、能够应急攻坚的优势创新力量,实现科技创新基础实力和创新体系效能整体跃升,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重庆战略科技力量的短板

(一)科技基础设施和实验室缺乏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储备项目,全市仅有超瞬态实验装置1个,少于四川(10个)。国家实验室还未实现突破,少于四川(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较少、体量弱。2022年重庆市国家重点实验室10个,少于北京(136个)、上海(46个)、江苏(36个)、广东(30个)、陕西(21个)、四川(16个)、浙江(15个)、天津(14个)。重庆市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少于北京(68个)、上海(25个)、广东(24个)、湖北(19个)、四川(16个)、湖南(14个)。

(二)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体系不健全

重庆市高水平大学缺乏,高等院校仅68所,少于北京(122所)、上海(288所)、浙江(109所)、广东(160所)、江苏(167所)、四川(134所)、陕西(111所)等省市,其中,“双一流”高校2所,少于北京(34所)、上海(15所)、江苏(16所)、四川(8所)、陕西(8所)、天津(5所)。学科体系不完善,以工科为主,传统学科较多,前沿交叉学科较少,重庆市仅有6个A-学科,高校学科和科研竞争力不足。研发体系不健全,高水平科研机构不多,中央在渝科研院所仅4家,少于北京(347家)、上海(52家)、武汉(25家)、成都(30家)。全市拥有科研院所62家,仅为四川的38.1%(163家)、北京的16.2%(382家)、上海的48.4%(128家),科研机构研发与产业创新需求脱节,领域主要集中在资源环境、传统农业、传统制造、检验检测、日化、食品等,占到市级院所的90%以上,以技术应用为主,缺少原创性、开拓性的科研,高水平成果和新兴产业的生成能力不强。

(三)优质科技企业不多

2022年全市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6348家,仅为广东的13.9%、浙江的21.1%、湖北的31.4%、四川的43%、陕西的51.5%。全市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57家,少于广东(867家)、江苏(709家)、浙江(601家)、北京(588家)、上海(502家)、四川(343家),略高于天津(194家)、陕西(164家),年增长率117.8%,仅超过四川的91.60%、天津的49.23%、陕西的46.43%。全市科创板上市企业仅1家,少于广东(76家)、浙江(42家)、四川(17家)、湖北(12家)、陕西(12家)。

(四)科技人才匮乏

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数量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两院”院士数量仅18人,低于北京(887人)、上海(183人)、广东(102人)、浙江(81人)、陕西(72人)、四川(63人)。2021年,重庆市R&D人员20.25万人,低于广东(124.85万人)、江苏(108.83万人)、浙江(79.86万人)、北京(47.29万人)、上海(34.5万人)、四川(31.17万人),略高于陕西(18.79万人)、天津(10.3万人)。

二、推动重庆战略科技力量提质强能的建议

(一) 争取国家支持与加快自身培育相结合,完善科技基础设施和实验室体系

积极对接国家需求,突出重庆在国防科技领域的优势和雄厚军工基础,争取中央在重庆布局建设国防军工领域国家实验室。强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合作,对接三区的国家实验室,聚焦四大科创高地建设,争取国家支持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基地。深化重庆市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星网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中央企业的全方位合作,共建共享联合实验室。强化川渝合作,共同向上争取两地共建国家实验室及国家实验室基地。积极培育大规模分布孔径深空探测雷达、长江上游种质创制等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推动与四川大科学装置的合作,共建应用基地。推进建设金凤实验室、明月湖实验室、广阳湾实验室、嘉陵江实验室,优化重组市级重点实验室。积极推进市级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加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布局。在人工智能、数字农业等领域,谋划创建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

(二) 引进合作与自身建设相结合,打造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

加快推进在渝高校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方向转变,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布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整合引进的中科院等创新机构和重庆市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建设一批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夯实重庆市基础学科支撑。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加快培育一批新兴交叉学科与专业,吸引集聚海内外高层次跨学科研究人才团队,持续推动前沿技术突破,支撑未来产业发展。加快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一流科研院所、世界500强企业来渝设立新型研发机构。研究制定鼓励引进机构发挥作用的举措,推动引进机构与本地高校、院所和企业的结对合作,建立一批建设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新型高端研发机构,支持市属科研院所与新型高端研发机构“高位嫁接”、融合发展,共同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场景化应用示范。

(三) 突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打造优质科技企业集群

持续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发挥各类型科技企业孵化器作用,大力孵化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重点突出和梯队完善的科技中小企业培育体系,推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加快引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推动平台型企业、生态型企业和链主型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引导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通过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设研发基金、共建实验室、研发众包等方式,共享创新资源、开展协同创新。支持国有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发挥创新制胜引领作用。开展民营企业“龙头引领”行动,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创新。推动科技企业组建研发中心、研究院等研发机构,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引导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四) 强化政策引导和优质服务,打造西部科技人才高地

依托各类国家和市级科技创新基地,大力引进海内外顶尖科技人才、高层次创新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深入实施好“渝跃行动”“新重庆引才计划”,强化政策统筹支持,加大引才工作考核力度,在引进人才在科研及成果转化、政府奖励、团队建设、生活保障方面给予支持。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大幅提高青年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重大平台基地、重点攻关课题负责人的比例,支持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挑大梁、担重任”。完善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校企、校地合作,探索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完善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标准,推行用人单位自主评价、薪酬贡献评价等市场化评价方式。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持续开展减负专项行动,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讲好创新故事、宣传创新典型,营造有利于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作者:王宗德,重庆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九处副处长、重庆大学生态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洁,西南大学科学中心综合事务部部长

责任编辑:张波

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陈学彬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所在,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和具体体现。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关键性胜利并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历史任务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八次提到“共同富裕”,四次提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对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战略部署。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最庞大的群体是农民。只有实现了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和物质基础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要“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进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为共同富裕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历史演进中,共同富裕理念在充分融合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以经济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国家强盛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全面进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由理想变成现实。

(一) 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到“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再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循序渐进、扎扎实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既是对共同富裕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同时也提出了实质性的要求。从共同富裕的主体看,是全体人民。既要实现人人都能公平享有共同富裕的成果,又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积极参与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从共同富裕的实质看,“富裕”不是单一性、低水平的,而是包含物质上的高水平、精神上的高层次和环境上的高质量的统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综合体现。一是发展质量高。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根据需求侧逻辑,共同富裕应该是体现新发展理念富裕,是资源配置高效合理、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元化目标体系,是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协调、高标准建设、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结果;二是分配差距小。根据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既要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行业差别,还必须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分配格局,在关注效率与公平的同时,更加注重低收入群体,通过逐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是所涉范围广。一方面,共同富裕不只涉及经济领域,同时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共同富裕除社会成员在财富上的共同享受外,还体现在权利、地位、机会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公平和共享。

(二) 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是凭空而定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一是全国经济实力实现总体性跃升,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同步跃升,这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二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国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弥补了实施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三是已经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种先富地区和先富群体既是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更能起到辐射引领作用;四是社会制度更加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教育、医疗、卫生和基本养老保险服务实现历史性跨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和认同感得到全面提升,为共同富裕实施提供了坚强的保障;五是城乡居民整体素质显著提高,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更强,动力更足,参与共同富裕实施的能力更高。

二、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共同富裕”概念是在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针对农民提出的“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收入,争取共同富裕的生活。”同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尽管脱贫攻坚工作为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依然面临许多困境。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收入是影响居民贫富最直接的因素,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农民的收入已大幅提高。但和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差距仍旧很大。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为2.56(见表1)。

表1 近年城乡居民各项收入指标之比

收入指标	年 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72	2.71	2.69	2.64	2.56
城乡人居可支配工资性收入比	4.11	4.04	3.97	3.88	3.78
城乡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比	0.80	0.81	0.83	0.84	0.78
城乡人均可支配财产净收入比	12.03	11.90	11.78	11.65	11.04
城乡人均可支配转移净收入比	2.54	2.51	2.93	2.29	2.22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https://data.stats.gov.cn/>)

从表中不难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仍旧属于我国的中低收入群体。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依靠扶贫政策增加收入的农户,收入基础并不稳固,风险承载能力并不持续,一旦稳定增收受到威胁时,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再次拉大。

(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具体而言,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不平衡不充分,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居住环境打造,还是医疗卫生条件,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农村都远远滞后于城镇;二是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不充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需求格局也随之提高,但在资源共享、就业机会、消费体系、服务质量上,农村相差城镇太远。这种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

(三)农民致富能力相对不足

从农民自身来看,大多数愿意留在村里的农民,年龄基本在45周岁以上甚至更高,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不高、发展动力不足、致富能力有限的情况。而选择外出务工的45周岁以下农村青壮年,近年来由于疫情影响,就业呈现出太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收入受到影响,致富目标受到限制;从产业增效看,农民增收渠道单一、农业产业产值不高、附加值不大。就目前看,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普遍较低,农民很难在农业产业增收中达到共同富裕。

(四)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不健全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面临的全新课题,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经验可循,更不能全凭“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一套完整的体制机制,在力争做大“蛋糕”的同时,确保分好“蛋糕”。然而,对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与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不相符。

三、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路径探析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农村是短板,农民是重中之重,必须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加大投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提高农民增收致富能力,并调整分配制度,健全制度保障,增加农民收入,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进程。

(一)加大投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包括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利用乡村振兴契机,加大资金投入,优先保障农业农村全面高质量发展。一是积极做好乡村规划,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统筹推进,在基础设施上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要素配置,避免低水平建设。加强乡村治理,深入推进环境整治,逐步消除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瓶颈,从而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二是着力解决好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环保、社会治安等现实利益问题,加大力度,弥补短板,提高农村生活品质;三是加大乡村干部的优先配备和政策性倾斜,确保农业农村发展的人才保障。

(二)深化改革,促进要素资源流动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需要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做大农村“蛋糕”。一是让农村闲置土地“活起来”,包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大力发展优质、生态、高效农业,提高土地亩均效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二是让农村闲置房屋“忙起来”,让民房变民宿,以经营或租赁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让城乡人力资源“动起来”,促进人力资源城乡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同时,鼓励愿意回农村的城市人参与乡村建设,让更多资源资金留在农村;四是让留守老人“干起来”,发展老人产业,激发农村留守老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力所能及参与增收致富行业;五是让文旅资源“火起来”,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把山水文化特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胜势,吸引留住更多游客,让“绿水青山”转化为更多的“金山银山”。

(三)创新激励,增强农民致富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增强农民的致富能力,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等不来的,要共同奋斗,推进农民共同富裕,主体是农民。对此,必须激励农民,把握机遇,积极创造。一是帮助农民提升致富技能,确保“志”“智”双扶,这是增强农民致富本领的首要条件;二是想方设法增加农民的财政性收入,让农民成为一种有保障的人人向往的职业;三是提高农民地位和农业产业价值,带领群众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保障农民经营性收入;四是激励外出务工的“城归精英”,返乡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将资源资金留在农村;五是建立先富带后富对口联结机制,多管齐下帮助提高农村弱势群体致富能力。

(四)完善机制,健全共富保障

推进共同富裕,更需要把顶层设计摆在重要的位置,从全局规划当前和未来,以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作为直接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基层政府,需要找准定位,科学谋划。一是完善市场激励机制,促进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破制约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通过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更好推动城乡融合;二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调动农民致富积极性,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通过三次分配扶持农民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三是加快制定和完善农民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化;四是建立农村高质量发展机制,充分保障粮食安全,贯通产销链和农文旅融合,加快转化生态涵养、休闲体验功能的高端拓展。

作者:中共重庆市城口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张波

从璧山区一典型农村看破解重庆乡村振兴难题的重要路径

谢强 李红 曾永

近年来,重庆市璧山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市提出坚持“两点”定位、建设“两地”“两高”的目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科技装备为支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更好地了解重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状况,促进重庆乡村振兴,我们选取了重庆市乡村振兴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璧山区杨寺村为调查对象,开展此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状况的调研。

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城市,璧山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辐射区县之一,而杨寺村正是重庆市璧山区丁家街道下辖的行政村。杨寺村地理位置优越,毗邻九永高速,距离大学城44公里,距离重庆中心城区57公里,全村共7个生产队,共有村民3785人。该村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有观音塘湿地公园、璧山青龙湖、璧山露德堂、璧山三担湖公园、璧山大成殿等旅游景点,同时还有大路黄花、璧山葡萄、来凤鱼、渝璧玉血橙、璧山黄花菜等特色农产品。

一、璧山区杨寺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状况

为更好反映制约重庆市乡村振兴的难点,我们分别从劳动力年龄分布、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规模、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农业信息的畅通度、农村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六个方面对璧山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展开调查。

(一) 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的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的起点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人口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时代,璧山区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杨寺村全村12户贫困户如期实现脱贫,生活迈上了新台阶,全村交通也有了极大改善,已经实现乡村公路“村村通”的目标。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璧山区杨寺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难题,也是重庆市实现乡村振兴难题的缩影,针对这些制约重庆乡村振兴的难题,我们应当引起重视,并努力解决。

(二) 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

从杨寺村从事普通家庭联产承包土地耕作的主要劳动力年龄分布来看,18~30岁约占调查总数的3%,31~54岁约占调查总数的31%,55岁以上约占调查总数的66%。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年龄超过70岁仍在从事土地耕种的被调查对象约占调查总数的12%。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由此可见一斑。通过调查过程中询问杨寺村部分村民,得知杨寺村出现空心化、老龄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目前,杨寺村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缺少支柱型产业,无法为青壮年劳动力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因而青壮年人外出务工现象较为普遍;其二,青年学生通过升学离开乡村,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毕业后大多选择留在城市工作或继续升学。

(三) 耕种机械化不足,科技型人才相对缺乏

杨寺村以梯田为主,受地形限制,不便于大型机械化操作,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该村机械种植与采摘率不足11%,超过89%的农户依然采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种植技术也相对落后。通过走访当地村委会得知,杨寺村每年仅有1~2次专业农技知识宣传讲座,且全村仅有3名农技指导人员,农技人员与村民配比约为1:1262,农技专业人才配比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需求。且农技人员仅能提供一些常见的种植技术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指导,导致农户种植水平达不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需求。同时,在走访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兼有行政工作,从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农技推广工作中,这也是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四)农产品单品产量少,销售渠道单一

由于耕种机械化不足,农户的农作物种植呈现出种植品种多且分散的特点。自给自足式的种植方式,使得单品农作物种植产量远低于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正因如此,杨寺村种植的农作物亩产量较少,产出的农产品多用于农民自己食用,少量富余农作物的销售渠道也较为单一。其中,94%的调查对象将富余农作物拿到当地赶集日的场镇进行售卖,以购买其他生活用品,仅6%的调查对象知晓利用网络和客户订货销售农产品,但目前杨寺村还未与农产品收购企业形成产销对接,网络销售渠道尚不成熟。

(五)信息化水平不足,村镇公共交通较为不便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杨寺村被调查对象中了解农业信息的主要途径仍然是电视、电台以及村里的广播,其占比达73%。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被调查对象中竟无一人曾通过网络获取过农业相关资讯,这也反映出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又一难题。同时,随着璧山区“四好农村路”项目落地,已建成镇镇通公交,村村通客车的交通体系,极大地改善了农村道路条件。但是后续的公共交通建设却并不能满足村民日常的出行需求,大部分被调查对象表示目前所在地交通不太便利,公交车并未通行或是通行但班次较少。81%的被调查对象在出行时仍然主要采用摩托车、电动车或者步行。其中,部分老年群体表示,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会选择所谓的“黑车”,使得交通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

二、从璧山区一典型农村看破解重庆乡村振兴难题的重要路径

通过上述对杨寺村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对重庆市实现乡村振兴和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思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关键在“人”

通过对杨寺村被调查对象“劳动力年龄分布”部分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是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接受调查的杨寺村村民中,老年(60岁以上,含60岁)常住人口占65%,青壮年(15~60岁之间)常住人口占20%,儿童(15岁以下)常住人口占15%,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分布,比例严重失衡。如何吸引青壮年回乡建设,成为重庆市实现乡村振兴和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杨寺村被调查对象“农业生产方式”部分的数据分析和走访调查,我们发现专业技术人员不足问题凸显,无法满足村民对现代农业技术指导的需求,从而使得村民的生产效率不高。这表明重庆市要实现乡村振兴和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可持续的农村“人口红利”作为持续发展的基础,还需要有高层次农业技术人员的“人才红利”作为技术依托。

(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核心在“变”

通过对杨寺村“农业生产规模”部分的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重庆乡村的生产模式还是以家庭式生产为主,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程度较低,严重阻碍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同时,缺乏一套行之有效、使用简便的农产品分级销售制度,导致农产品的附加值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影响了农民增收。通过对杨寺村“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部分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的销售模式主要是自产自销,商品化程度较低。因此,要实现重庆乡村振兴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就需要更进一步地实现农产品的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进而延长产品的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要想实现农产品规模化、现代化生产则需要盘活村民闲置土地、用好村民存量土地、寻求增量土地资源,同时多角度、多渠道地拓宽农产品的销售,让销售方式实现现代化。

(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基础在“补”

通过对杨寺村“农业信息的畅通度”“农村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两部分的调查与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重庆市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重庆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但在乡村数字化和交通便利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农村居民拥有计算机数量较少,农村居民对计算机的掌握程度相对较低,农村网络链接方面存在技术性的短板,尤其是在网络信号覆盖方面较为突出;二是随着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的落实,乡村道路进行了一系列的硬化建设,但道路相对较窄,难以双向会车,大型货车进出转运农产品困难,且部分农村公路路面损毁后得不到及时地修护,进而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持续发展。因此,重庆市要实现乡村振兴和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亟待补齐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数字化短板和交通便利化短板。

作者单位: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思政部

责任编辑:张波

Chongqing Administration

No. 6, 2023

Main Contents

1.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 – depth Striving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for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in the New Era
..... Song Yingjun
2. Finishing the “No. 1 Project” in High Quality Striving to be the Vanguar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Wang Zhijie
3.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Striving to Create a New Zhong County in the New Journey and New Era Li Dian
4. Study on the Logical Way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Lead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Zong Chengfeng Li Zhao
5. Us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Lead the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
..... Huang Chaoyong
6.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ongqing Xiao Jun Chen Linpei
7.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Local Social Assistance with the Reform of “Digital Assistance” Feng Yongsheng
8. Exploring the Path of Social Work Intervening in Petition Work
..... Li Yunbo Zhou Ling
9.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raining Female Cadr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Li Jinbei Wu Biqing Zhang Zhiyong
10.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Farmer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Chen Xuebin



《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以晚清重庆报业（1897—1911）为中心的观察》

推荐语

《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以晚清重庆报业（1897—1911）为中心的观察》共5章，以1897—1911年之间的晚清重庆报业为核心文本，以城市、传媒与现代性为关键词，系统研究清末重庆新闻传播史，力求厘清《渝报》《广益丛报》《重庆商会公报》《华西教会新闻》《重庆日报》等清末各类报刊在推进重庆城市现代性进程中的互动过程与构建意义，是城市史与报业史研究范式的双重创新。本书秉承着一种极富开拓价值的“空间转向”研究路径，生动地展现了现代报刊在城市空间的诸多功能——传递信息、展开对话、构建网络、重塑时空，展开着对城市、民族和国家想象的叙事，绘制出晚清时期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画卷，成为重庆城市现代化转型和中国媒介现代性的样本。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8-402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1207/

定价: 每册12.00元

ISSN 1008-4029



9 771008 402233